

总 序

季羨林

多少年来，我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或者主张。我认为，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促进人类科技文化增长，加强人民与人民间、政府与政府间相互理解，增添感情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决不是我个人的凭空臆想，而是有历史事实为根据的，我的主张是能站得住的。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几千年来我们的发明创造，传出了中国，传遍了世界。其中四大发明更是辉煌无限，尽人皆知。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四大发明，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将会推迟的。至于那一些比较小的发明创造，更是难以数计。英国学者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史的名著，是许多人都熟悉的。我在这里不再重述。我只举一本大家也许还不太知道的书，说明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伊朗裔的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其中讲了许多中国的发明创造，虽不像四大发明那样辉煌，但意义并未减少。这一些看起来极其微末琐细的发明创造，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对人类生活的方便，同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且莫等闲视之。

上面说的是中华民族送出去的东西。在过去两千多年中，我们也同样拿来了很多很多的有用的东西。现在从最大的宏观上来看，在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大规模的传入共有两次：一次是汉代起印度佛教的传入，一次就是从四百年前起西方天主教，后来又加上了基督教的传入。两次传入，从表面上来看，都是宗教的传入；但从本质上来看，实际上传入的是文化，是哲学，是艺术，是技术等等。没有这两次的传入，我们今天的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决

不会是目前这个样子。这是一件事实，没有争辩的余地。

佛教在这里先不谈，这不是我要谈的题目，我只谈天主教和基督教。虽然西方信仰耶稣的宗教在中国唐代已经以景教的名义传入中国，但是影响不大。真正有影响的是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人。晋代佛教高僧道安对弟子们说过两句话：“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两句话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佛教如此，天主教亦何独不然。天主教所依的最初不是国主，而是大臣和艺术家学者，前者可以徐光启为代表，后者的代表当首推大画家吴历。到了清代康熙皇帝统治时期，这一位大皇帝并不一定为天主教义所动，然而他的目光犀利，看到了西方科技的重大意义，亲自学习西方的几何学。皇帝的榜样有力量，清代颇出了几个大数学家。到了20世纪，西方文化猛烈冲击“东方睡狮”，如暴风骤雨，惊涛骇浪，中国人民接受了这个挑战，在短短100年的时间内，从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达到了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其进步之速超过了过去的1000年。

由于种种人所共知的原因，今天的中国青年，有的产生了信仰危机，思想浮躁不安，对世间事有些茫然。有识之士慨然忧之，大家一致提出来要提高人民的，特别是青年的人文素质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我个人认为，这种想法是完全正确的，有远见卓识的，是“及时雨”。

但是，要做好这一件工作却并不容易。为之之法，其道多端。首先要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知道，中华民族对世界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今后还将做出更重大的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必须实现人生的价值，才对得起这仅有的一次生命。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加雪碧；比萨饼，加州面，卡拉OK，美容院，这样的生活，虽然也能增加一些人生乐趣，但是，天天这样，就毫无意义。我希望，我们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要认识到自己对国家和后世子孙的义务。我们都是人类进化无尽长河中的一段，承前启后；是跑接力赛中的一棒，我们这一棒跑不好，则对全局产生恶劣影响。这就

是爱国主义。但是，同时我们又必须认识到，我们对世界也负有义务，这就是国际主义。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我个人认为，人类前途还是光明的。能否真正光明，就决定于各国人民能否做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

怎样才能让中国青年认识到这一点呢？办法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让他们认识到，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不能离开别的人、别的国家、别的民族而完全独立生存。人类都是要互相帮助，互相依存。而文化交流尚矣，就连我在上面说的麦当劳、肯德基等等也是文化交流的结果。

我们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对青年进行文化交流的教育。世界上文化极多，而大别之无非东西两大文化体系，讲文化交流首先就是要讲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我从前主编过一套《东学西渐丛书》，是讲东学，主要是中国文化向西传布的历史事实的。现在王渝生研究员又主编了这一套《西学东传人物丛书》，两书正好互补。王先生这一部书以人物为主体，讲来更加生动有趣。我相信，它一定会受到青年学子的欢迎，故乐而为之序。

2000. 1. 16



利玛窦画像

目 录

总序

一、利玛窦生平与在华传教经历	(1)
出生与所受教育	(1)
进入中国	(1)
南京与北京传教	(4)
长眠中国	(11)
二、中国对外政策	(12)
朝贡政策	(12)
宗教政策	(12)
澳门政策	(14)
西方政策	(14)
日本政策	(15)
三、中国人对待西方的态度和人教障碍	(16)
对待西方的态度	(16)
中国人入教的障碍	(25)
四、利玛窦的思想	(27)
人文主义思想	(27)
关于经济的见解	(29)
史学思想	(31)
宗教、政治、文化与科技思想	(48)
对欧洲人的批评	(62)
文化优越感	(64)
五、天主教组织与利玛窦的传教策略	(66)
宗教组织	(66)

利玛窦与葡萄牙·····	(70)
利玛窦所读中国书·····	(77)
传教策略·····	(80)
对异教的态度·····	(93)
六、利玛窦传入中国的西方科技与文化 ·····	(98)
西方社会文化制度·····	(98)
中文著作问世·····	(99)
西方传入的科技·····	(103)
七、利玛窦传入西方的中国科技和地理知识 ·····	(114)
介绍中国科技·····	(114)
介绍中国地理知识·····	(117)
八、利玛窦对中国人的认识和对社会的批判 ·····	(125)
中国人的特征·····	(125)
对中国的批判·····	(127)
九、利玛窦的影响 ·····	(144)
参考文献 ·····	(147)
丛书后记 ·····	(148)

一、利玛窦生平与在华传教经历

出生与所受教育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生于意大利马尔凯省马切拉塔的一个药店老板家庭。

1561年5月,进耶稣会办的小学念书。1568年10月或11月,离开故乡,前往罗马,进耶稣会办的日耳曼公学读书。1569年年底,参加圣母报喜团。1571年8月15日,进入圣安德烈备修院。1572年9月17日,迁入罗马公学,有一年多时间由克洛德·阿夸韦瓦(以后任耶稣会总会长)指导。

1577年5月18日,离开罗马,经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前往葡萄牙。1578年3月24日,向葡萄牙国王辞行;3月29日,偕孟三德、罗明坚从里斯本出发,从海路前往印度;9月13日抵达果阿,居住至1582年,继续攻读神学,同时教文学,中间曾前往科钦,返回果阿后在攻读神学的同时学习钟表、机械、印刷技术。1581年受神父职。

进入中国

1582年4月15日利玛窦奉远东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神父之命,前往马六甲,转往中国;7月3日抵达马六甲;8月7日于病中抵达澳门,同罗明坚、巴范济在一起;在澳门学习汉语,参与撰写范礼安著《圣方济各·沙勿略传》的三章《论中国的奇迹》(全书写成于1583年6月13日)。12月31日巴范济、罗明坚由澳门前往肇庆,利玛窦留澳门等候。

1583年9月1日与罗明坚一起离开澳门；10日抵达肇庆；知府王泮促使制台郭应聘批准租与东关仙花塔附近地皮建造仙花寺（教堂）；冬与秀才们打官司，几乎被驱逐出境。1584年4月肇庆居留地房屋竣工；6月或7月开始同一秀才合作，审订罗明坚编写的《教理问答》，从口语改写为文言文。1585年8月，孟三德奉范礼安命，来肇庆主持工作。10月罗明坚携艾美达前往绍兴开辟传教工作（1586年6月被逐回肇庆）。1586年，利玛窦在肇庆广泛结交达官贵人、名流士人，通过交谈介绍西方文明并宣传天主教教义。1588年1月，罗明坚返回澳门，从此，中国传教团工作由利玛窦一人承担。1588年7月31日范礼安从果阿来澳门，居留二年，派艾美达去肇庆。1588年8~9月，利玛窦被肇庆耆宿控告与澳门葡人勾结谋叛，后顺利解决，从此有了自己名字的准许居留凭证（原为罗明坚的名义）。12月新任制台刘节斋諭示彻查肇庆神父奸细案，拟将利玛窦解回澳门或押往韶州。1589年利玛窦回澳门请示，范礼安同意将居留地迁往别处；利玛窦回肇庆后得识瞿太素。8月初，刘节斋给予60两银子，令利玛窦返回故里，利氏拒绝，被押解上船，舟行至广州，忽被召回肇庆，制台命其在广州、肇庆以外另选广东一地居留。8月15日乘船离开肇庆，24日抵达韶州南华寺，28日被送至韶州城里，在西关择得地址为居留地。10月4日或5日，韶州居留地房屋动工兴建。约在10月，瞿太素前来拜会，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和天主教教义，在韶州居住一年。年底，利玛窦在韶州与官员们交往，开始研究中国儒、释、道三教。1590年1月1日，前往英德拜会县令，受盛待，次日回韶州。7月初，孟三德被任命为澳门神学院院长、驻华传教团教长，来韶州视察三日。1591年10月，艾美达病故于韶州居留地。12月孟三德从澳门派遣裴德立前来协助利玛窦传教。1592年2月18日（阴历新年），利玛窦应瞿太素邀请前往南雄与官员、商人、士子交往。1592年6月底发生袭击韶州居留地事件，利玛窦跳窗伤足，其他多人受伤。11月往澳门见范礼安。1593年1月从澳门回韶州。秋天，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返故里海南岛，途经韶州，接见利玛窦，交谈一天一夜，从此成为天主教会

的保护人。10月5日，裴德立病故于韶州。1594年7月7日，郭居静奉派抵达韶州。利玛窦勤奋研习中文典籍，用拉丁文意译《四书》并予注释，并用文言作文。1595年，誊清拉丁文意译《四书》手稿，以后利氏对新来传教士讲解《五经》，停止散发在肇庆刊印的《教理问答初阶》，拟另编写。这时的利玛窦俨若中国“读书人”，“穿着打扮悉随乡俗”。利氏引见郭居静，谢姓知府按秀才礼仪对待。

同年4月，北京兵部侍郎石星（以后为兵部尚书）由原籍返回北京，为治其子病，同意带利玛窦北上。4月18日，利玛窦随石星乘船至南雄，改走旱路，至赣州又乘船，覆舟遇险得救，石星劝其留居南昌，韶州首途后22日过安庆。5月31日，抵应天府（南京）。6月16日请求定居南京，被拒绝；次日乘船回南昌；6月28日抵南昌，在南昌被称为“举人”，对士大夫显露其过目成诵本领，拜会显宦、皇亲、名流，结识大儒章斗津，得见总督，获面允留居南昌（7月底或8月初）。8月晋见建安王，以后多次拜谒，互有馈赠，以后乐安王也予接见，弋阳王未得见。10月刊印《交友论》。12月24日，苏如汉抵南昌，协助传教（罗如望则去韶州同郭居静在一起）。1596年6月28日，利玛窦等在南昌迁入所购新居。利玛窦于10月13日写道：在南昌这个人文荟萃之地有了新的居留地，“在帝国的两个地点有了四位神父和两位修士”，（南昌为利玛窦和苏如汉，在韶州为罗如望和郭居静）。在章斗津主持的豫章学院，多次辩论，利用儒家学说，证明基督教教义符合中国古代一切优秀传统。10月13日后建安王印制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10月写道：在此开始阶段不宜开设教堂和小堂，只像书院那样设立讲堂。1596年7月，万历帝以东西用兵及营造宫室，经费支绌，遣官开矿，以太监督税，遂开矿税之弊；以后各种税监分赴各地。1597年5月，万人来南昌应乡试，12月有四千人来应会试，拜会利玛窦者不可胜数。7月20日，范礼安由日本抵澳门视察（逗留至次年初），任命利玛窦接替年老体弱的孟三德为来华传教团教长，任命李玛诺为澳门神学院院长。10月12日，利玛窦认为：谋求机会直诣万历帝的条件已经具备。15日写道：“花了十四五年的工夫，（受洗的中国）人数超过一

百并不算多”，认为在中国传教有六大困难。12月28日，龙华民奉范礼安之命由澳门来韶州，担任韶州居留地教长。

南京与北京传教

1598年6月25日，利玛窦离开南昌，携郭居静，随王忠铭首次晋京，抵达南京后结识总督赵可怀。8月底沿运河北上，9月7日抵通州起岸，未得进入京城。11月5日只得赁舟南返，往返途中利玛窦确定所经各大城市纬度，辨明《马可·波罗游记》所说Cathay究竟是不是中国，编制汉语拉丁拼音表。1599年阴历年，利玛窦过镇江，在知府王应麟府邸过年，有许多高人雅士作陪。后乘王知府官舟去南京，2月6日从接近大运河的一道城门步行入南京城，寄寓承恩寺。10日，在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府邸欢度元宵节，南京国公、五军提督、太监头等竞相邀请；与南京礼部侍郎叶向高（后为首揆）结成友谊，相与还有户部尚书张孟男等。经多人挽留，决定定居南京，买房子安顿后结识名士李贽。8月15日以后，编写《二十五箴言》。祭孔日前夕，被王忠铭带往南京天坛目睹次日祭孔典礼预习。进一步研究儒家学说，传授西方数学；观赏郭守敬制造的天文仪器；以官费刊印《坤輿万国全图》，广为散布，并被翻印；结识大儒厉汝进；与和尚三槐辩论；王肯堂刊印利玛窦所讲科学与伦理学。1600年初，郭居静、庞迪我乘船抵南京；徐光启路过南京，会晤利玛窦。

该年5月18日或20日，利玛窦、庞迪我偕两名修士、四名仆人，乘太监官舟二次北上晋京；过济宁，再次会晤李贽并受到仓运督办款待。7月3日，抵临清，受阻于税监马堂，18日始得再启程前往天津。23日或24日抵达天津。10月底前后，圣旨下，诏命“另本上奏，前本语焉不详”，马堂趁机勒索，又由于阉党与清流之争，至冬未见礼部答复；马堂迁利氏等至城区；马堂欲逼交礼物，搜查传教士所带行李物品，发现耶稣死难十字架，斥为妖术，认为利玛窦等行蛊，再加害皇帝。



图1 天主教传入中国史,由金尼阁从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在罗马出版,左为圣方济·沙勿略,右为利玛窦

1601年1月9日,“天津贡税监马堂奏远夷利玛窦所携方物及随身行李,铎审已明,封记题知,上令方物进,利玛窦伴送入京”,24日,利玛窦和庞迪我等经官道驰抵京城,下榻南城外。25日或28日,利玛窦打点好贡物,开列礼单并附表章上奏;25日(或28日),马堂携贡物诣皇帝,呈献皇上。1月底至2月,二位神父多次应召入宫调自鸣钟,皇上数次派太监询问欧洲事并命造一钟楼装大自鸣钟(可能在交泰殿),庞迪我教四太监习西琴,后利玛窦编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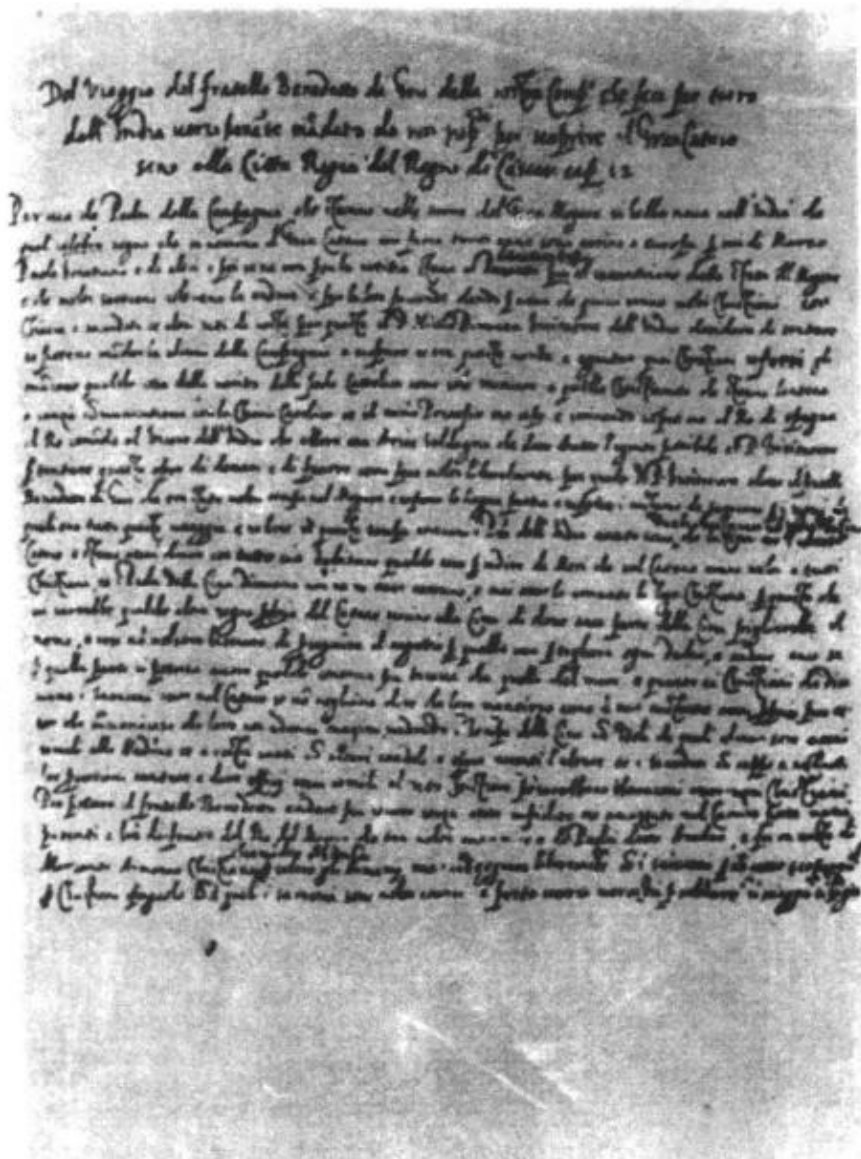


图2 利玛窦手迹：《天主教传入中国史》片断

“西琴八典”。月底，神父表示定居北京的愿望，结交祁光宗和其他士大夫，再与李贽来往。3月2日，礼部主客司蔡郎中下令逮捕利玛窦、庞迪我等，审问明白后于中旬送进四夷馆居住。下旬，奉召在午门外“参拜龙座”，然后，利玛窦、庞迪我拜谒代署尚书事的礼部侍郎，礼部表奏认为不宜留居京都，请遣其去广州，再押解登舟回国，然留中不发。5月28日，迁出四夷馆，租赁民房居住，从此皇家给予实物供应。后去狱中探望与竖党斗争的冯应京(慕岗)，遂成莫逆之交，冯为利氏著作写序称他为“利进士”，狱中书信往返(1604

年出狱后,病故前受洗)。6月至9月,各衙各署官长前来拜会,武英殿大学士沈一贯予以接见,互有馈赠,交往的还有礼部尚书冯琦、尚书李戴、萧尚书、王侍郎等显宦;与南京工部主事、居住于北京的李之藻交往频繁。1602年年初,李玛诺由澳门来韶州,代利玛窦管理华中、华南三居留地。是年,利玛窦在北京继续广泛交往。8月10日,李玛诺从韶州抵京,同利玛窦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讨论传教组织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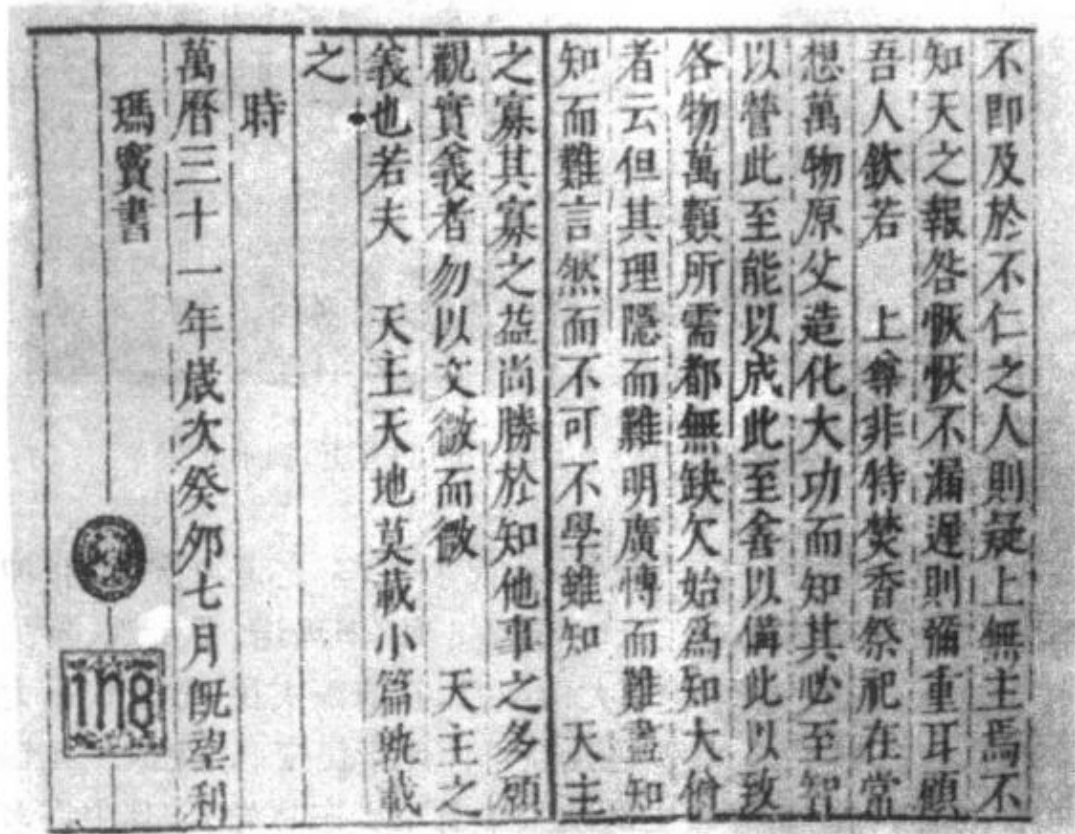


图3 利玛窦亲撰《天主实义》序言末段,万历三十一年撰于北京

1603年2月,范礼安来澳门,命利玛窦留任驻华传教团教长,批准李玛诺代管其他三居留地;翰林院编修黄辉、吏部尚书李戴、礼部蔡郎中批驳利玛窦天主教学说,神父们闭门不出。1604年4月,徐光启中进士,在京期间同利玛窦交往密切,从此不断利用闲暇时间协助传教士撰写中文著作,年底徐返回上海。利玛窦的《二十五箴言》,由徐光启和冯应京作序。是年,利玛窦刊印《天主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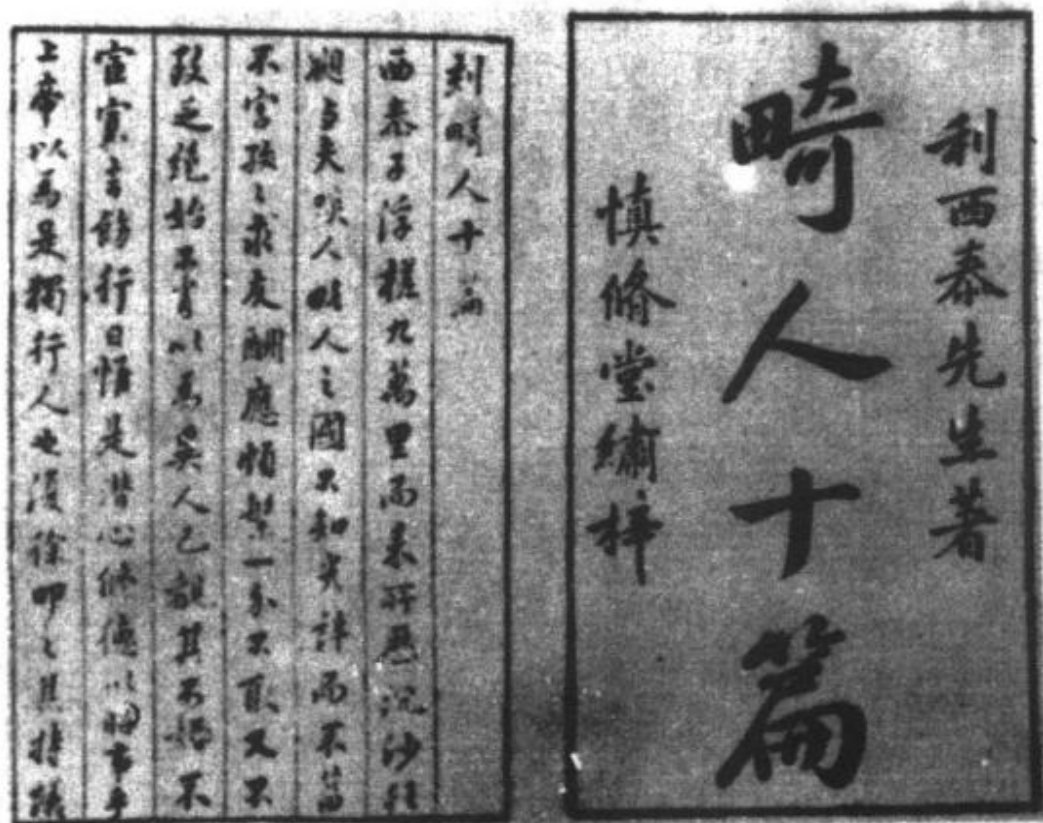


图4 利玛窦伦理之作《畸人十篇》首页，撰于北京

义》，《交友论》再版；冯应京刊印利氏著作，李之藻再次印刷《坤輿万国全图》（有三种版本在京流传）。8月，李玛诺、费奇观、黎贝罗三教士抵京。本年夏天，北京大雨两月，官府赈灾民，教士们出力救济。9月，武昌“楚宗之乱”，巡抚赵可怀死于民变。顾宪成于无锡成立东林书院，利玛窦等教士的友人中有不少东林党人，其中许多是猛烈抨击基督教的。1605年5月12日利氏写信要求耶稣会总会“派数学家并随身带科学书来北京”。7月致函总会长：“皇帝想要我们做官，我们上表力辞。……不过，官员待遇还是保留了。……皇上的意思是要我们留在京城。”6月，犹太裔中国人艾田进士拜会利玛窦，从此利氏便着手探索中国犹太人来源和基督教（及犹太教）更早时代传入中国情况。1606年，利玛窦发表《畸人十篇》，手稿为士大夫传抄（于次年刊印）。1月20日，范礼安正拟来内地，突然病故于澳门，未得与利玛窦面商中国传教事宜。8月27日，利玛窦迁入所购北京宣武门前房屋一处，有大小房间40多间（即今南

堂)。9月起,徐光启每天来此三四小时,与利玛窦合作,干了一年多,于次年5月24日以后译完克拉韦乌斯神父选编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1607年,费奇观离京前往南昌创办备修院,熊三拔来京协助利玛窦工作;8月,苏如汉在澳门病故。鄂本笃(4月11日)死于肃州后,10月利玛窦接收到他的笔记,整理为《中



图5 利玛窦墓碑
(在今北京行政学院内)

国札记》中的三章,这些材料对认识中亚细亚非常重要。是年,潮州知府郭子章将《坤輿万国全图》翻印成书;李之藻把所译克拉韦乌斯关于测象仪的著作付梓。1608年3月,利玛窦开始考虑撤销韶州居留地(利氏逝世后二年实现)。8月22日的信中说,有一天忽被皇上传召入宫,由太监降旨命献六轴十二幅绸印《坤輿万国全图》;另外写道,随时可进宫调钟或干其他工作。某日,获准在太监和官员陪同下在城墙上行走。8月写信再次强调数学和天文学的



图6 利玛窦墓碑铭文,汉文与拉丁文并列

特殊重要性；在《中国札记》中盛赞中国印书既方便又自由，“每年出版的新书比任何国家都多得多”，因此，介绍“我们的宗教和科学”的书出了很多。8月23日信中又说：这些书“词句都是满怀敬意的”。1609年2月15日，利玛窦汇报来华传教团情况，指出满怀希望的八个原因，主要提到：学问极受敬重，“很容易讲道理来证明我们信仰的真理”，儒教虽不关心超自然的事情，但伦理观点“完全与我们一致”，但同一封信又说：要争取皇上恩准永久居留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谁也见不着万历帝，“洋人上本皇帝，那就更不许可”。9月，开始编写逐年大事记（即《中国札记》），其中汇编各居留地汇报和他自己的笔记，于逝世前夕写完最后一行，12月，说北京已收400多基督教徒（全国有2000多）。1610年，李之藻等根据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所传西法奏请修历。

长眠中国

1610年5月3日，利玛窦病起；10日，谶妄；11日上午七时去世（终年58岁）；15日至18日举丧；11月1日，灵柩下穴于御赐二里沟（栅栏）坟茔地（今北京行政学院内）。

二、中国对外政策

明朝的对外政策包括诸多方面，此处所写仅根据利玛窦所记。

朝贡政策

按中国当时的法律，只有三种人许可入境。第一种是从邻国每年自愿前来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人。中国人对此并不在意或担心，因为中国并不想征服别国。第二种人不希望被看作是来进贡的，但慑于中国的幅员广阔，就来向皇帝致敬，尊他为万王之中的首领和最伟大的一个。这些人都是来寻求财富的，但佯称他们是被本国的君主派来的。他们就是经常不断从西方来的阿拉伯商人。第三种人是羡慕这个伟大帝国的声名而来此定居的，中国人认为他们是受了中国人的道德名望吸引。

《广舆图》中列举东方有三国，西方有 53 个以上的国家、南方有 55 个以上国家以及北方有三国，都向帝国朝贡。事实是即使继续纳贡的，在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对于纳贡与否全不在意。

按照中国和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 72 名商人进入中国。

宗教政策

明朝的始祖洪武皇帝规定为了国家的好处，应该保留儒教、佛教和道教这三大教。他这样做是为了调解每一教派的信徒。然而，在为保持这三大教香火不断而立法时，他从法律上规定儒家的教派应优先于其他两种，只有儒家才能委以管理公众事务的行政权。

这样,就没有哪种教可以消灭另一种。统治者的作法是培养所有这三大教的忠诚,当需要时就根据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加以利用并逐一地安抚他们,给他们整修旧庙或另建新庙。

在中国受过一点教育的人中间最普遍为人接受的意见是,三大教实际已合为一套信条,它们可以而且应该全都相信。当然,由于这样的评价,他们就把自己和别人引入了令人无所适从的错误境地,竟相信谈论宗教问题的方式越不同,对公众就越有好处。实际上,他们最终得到的东西与他们所预期的完全不同。他们相信他们能同时尊奉所有三种教派,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因为他们并不真心遵循其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大多数公开承认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在佯装相信宗教借以欺骗自己时,他们实际相信的是无神论。

佛教政策 明朝一位皇帝曾对礼部尚书所作的奏章回答如下:倘若官员们愿意作偶像的奴隶,那么他们穿上官袍时应该感到羞愧。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就让他们都到沙漠里去,那里有和尚居住的寺院。皇帝的这道谕旨,使那位礼部尚书更加大胆了,他在和部阁商议过后,就为全国的整体利益而颁发了一道法令:凡是参加文字竞赛或者科举考试的人,如果提到偶像崇拜,就不能获得任何学衔。这个规定一公布,皇宫和全国都发生了变化。偶像信奉者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失望和悲伤。其中有一些受不了这种耻辱,便退休回家,闭门不出。

回教政策 在中国的回民并没有做任何努力把他们的教义传给别人。除了他们不吃猪肉外,他们遵守中国的法律而不知道自己的礼俗。他们被当作本地人对待,而不像别的外国人那样受到怀疑。他们不受歧视地可以念书,可以获得学位,甚至可以作官。大多数获得中国学位的回民除不吃猪肉这一教诫外,抛弃了他们祖先的全部规定。

大约在1548年左右,两个伊斯兰教徒,从陆路来到北京。他们带来一只狮子,这是中国人经常听说却很少见过的一种动物,他们把它作为礼献给中国皇帝,因而受到皇帝的殷勤接待,并授给他们

每个人官职和皇家国库的俸禄作为家产世袭下去；只要他们在狮子活着时照管狮子，而没有返回本国向中国人发动战争。

在南京有许多阿拉伯人，他们从蒙古人统治时期就住在这里了，已被认为是本地人。

在肃州，中国人住在一个城区，而来此经商的喀什噶尔王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阿拉伯人则住在另一区。这些商人中有很多已在此娶妻，成家立业；因此他们被视为土著，再也不回他们的本土。每天晚上，他们都被关闭在他们那部分地区的城墙里面；除此外，他们的待遇一如土著，并在一切事情上都服从中国官员。根据法律，在那里居住了九年的人就不得返回他自己的本乡。

澳门政策

广东省总督何士晋听到澳门修筑工事的情况，就发布命令征集全省的水陆军队。然后，他下令拆除广州城墙之外多达一千幢以上的房屋。与葡萄牙人的一切生意全部被禁止。不允许任何人把粮食带进澳门。广州城墙朝澳门方向的城门都用石块封闭。城上白天和黑夜的警卫也大大增加。张贴了大字告示严刑禁止任何人家中接待从澳门来的人。这个告示特别禁止接待外国教士，广东省会里到处宣扬着打仗的谈论，皇帝也接到了报告动乱的奏章，指控那些曾批准修建碉堡和城墙的人。

西方政策

政府官员大多数人都宁愿与传教士打交道，唯恐由于里通外国而失宠。

万历皇帝不想看到传教士们离去，但又不愿违法把他们留下来，除非是朝臣们要求把他们留下来。奉命管理自鸣钟的太监们也打算把神父们留下，怕的是如果有一座自鸣钟出点毛病，没有人修理。

日本政策

明万历年间,日本人在武装侵犯中国的邻国朝鲜中越过国界。保卫朝鲜要花费大量金钱,而且还没有希望能阻止日本的进攻。因此明廷通过一项新法律,严禁任何人窝藏一个衣服或容貌有嫌疑的人。

在这个非常时期,战争就在墙外进行着,朝鲜的战争谣传日益增多,许多人死于战争,日本正准备侵犯中国。中国人对外国人不加分辨,认为他们全都相同,或者几乎相同,可能把传教士们当作日本人。

三、中国人对待西方的态度和入教障碍

利玛窦细致地观察和透彻地分析了中国人对待西方的态度以及他们入教的障碍。他的记录也成为我们分析明朝历史的宝贵史料。

对待西方的态度

1. 对待基督教的态度

明代对于基督教大致有两种态度，一是赞成(或可以接受)，一是反对。

赞成 明兵部尚书石星有一个儿子，约 20 岁；他因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得了神经抑郁症。父亲想尽方法使孩子恢复正常，但没有效果。他认为信奉天主的传教士们也许能用祷告和陪伴的方法使孩子恢复健康。南礼部尚书王弘海听说上帝的仆人一来妖魔鬼怪就逃之夭夭，便对神的威力和保佑大加赞扬。

当万历皇帝看到耶稣受难十字架时，他惊奇地站在那里高声说道：“这才是活神仙。”传教士因此而被称为给皇帝带来了活神仙的人。皇帝亲自向雕像表示致敬，并让人在它们面前焚香和燃其它香料。皇帝自己保留一个最小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把它放在他的房间里。

姚安知府李贽认为，基督之道是唯一真正的生命之道。

吏部给事中曹于汴访问利玛窦离去时，利玛窦问他为什么来访问，他答道：“因为我从某些途径听说你是一位模范人物，传播一种教导人们如何正当生活的教义。”

大学士沈一贯听取传教士们谈论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特别

是关于基督教风俗的讲解。利玛窦告诉他，基督教的婚姻只是缔结于两个人之间，即使是皇室也是这样；沈氏说：“在一个婚姻是如此圣洁的国度里，别的事看来就不用再问了。仅此就足以说明其他一切都是规范得多么得当。”

吏部尚书李戴经常邀请利玛窦去他府中，并喜欢谈论来世的畏惧和希望的事情。后来，利玛窦把和他们谈话记录下来，作为《畸人十篇》中的两章。

湖广金事冯应京在湖广听说利玛窦在南昌和南京享有盛名，而且所有他的活动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当时他就派他的一个学生去请教利玛窦，但恰好他们准备北京之行；于是这个学生刘元珍一无所获，回去见他的老师，告诉他说利玛窦正在赴首都的途中。老师仍然想念着公共的福利，在他即将被械送入狱的时候，就把他的学生带到北京去见利玛窦；当传教士们从四夷馆的拘留中一获释，这个学生就去找他们，说明他来访的原委。经过常礼和赠礼后，他就选利玛窦为他的老师。

冯应京对《四十二章经》（内含利玛窦的《二十五箴言》）评价极高，建议受过教育的阶级都来一读，然后在有迷信色彩的伪善和来源于基督教的德行二者之间作出判断，再决定哪一个更对个人有好处以及对一般的公众更有用。

有一位被请来合作评论利玛窦著作的人，比较客气，他赞同利玛窦书中的许多论点，甚至于称赞作者。

北京有一位官员，读了《畸人十篇》印象非常深刻，他主动上门拜访京城里的传教士们。他在利玛窦身旁落座之后，拿出此书说道：“你就是本书的作者吗？”利玛窦承认他曾在这上面花了很多时间，于是客人接着说：“这样一部书的作者必定是位圣人，我从来不习惯也从不希望对圣人抱有敌意。因此我必须请你原谅我过去的冷淡，我希望用我今后的友谊来加以弥补。”结束时谈道：“有不少人经常断言他们并不怕像你们这样的外国人，因为信奉你们这种教义的人是不可能有益于公共福利的。”

有一位 80 老翁，他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士大夫，他从传教士那

里学到许多基督教原理。为了吸引儒生们的注意，他从书中搜集了数量惊人的有利于基督教的见证。

河漕总督刘东星曾向利玛窦发出正式邀请，派出轿子，把他接进府来。他们热情接待了他，然后听他谈了一些欧洲的情况以及自己十分关心的有关来生来世的问题。当他后来要告辞时，总督对他说：“我也想上天堂”，表明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财富和尘世的荣誉，而是自己的永恒得救。

参军李应试的仆人在主人的慈爱之中渐渐被软化了，主人不仅怜抚和溺爱他，实际还在乞求上帝拯救他的仆人时，进行了自我责罚和鞭黥自身。在他的帮助之下，慢慢地取得了成功，仆人和他的妻子最后都被争取过来。

徐光启认为基督教律法的基础是“易佛补儒”，即是说它是破除偶像并完善了士大夫的律法。瞿太素很赞赏基督教，使得他在大庭广众的场合总是要加以颂扬。

反对 韶州通判吕良佐深信除了自己的教义以外，别无他教，除了中国人知道的文字以外，世上再没有其他文字。他保卫这个信念，坚决到怎么都无法说服他的地步。

太监马堂认为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是个魔物，它谋害皇帝。他说：“毫无疑问谁都能看出来，制造这种东西就是专门要用害人的巫术使人中邪。”

编修黄辉不满于利玛窦用中文所写的书籍；他着手批判其中的教旨。他从会同馆长官蔡献臣那里得到几本这类书，要和利玛窦开会辩论，他蔑视利玛窦的逻辑，嘲笑他的推论。他写出了一系列对利玛窦解说的评论。在涉及佛教崇拜的教派时，他猛烈抨击利玛窦以及整个欧洲。他们特别反对神和人不是一回事的观点，他还认为太阳大于地球这一说法是错误的。被视为宫廷中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李戴，听说传教士们谴责迷信偶像，并且对他们所谈的提出证明时，他勃然大怒，他说如果上帝在天上有权势，那么他们的偶像也能在地上干很多事。一提到中文的基督教教义问答《天主教要》时，不少中国人就说：泰西的律法尽收在四小页书中，那证明它

是蛮夷之言，而佛教的巨帙著作则词句精美，还有祈祷之方和驱邪的严格指导。谁会愚蠢到要选择那本小书呢？

有些演员从澳门来到韶州，在市集的日子里，绘制广告，演戏挖苦葡萄牙人的每一样东西。他们画人在教堂里数着念珠、皮带上挂着短刀。还有一幅漫画：仅屈一膝来跪拜上帝的人、互相斗殴的人、男女混杂的聚会等。他们演戏的基调是：凡是他们认为可以嘲笑基督教的都应有尽有。

有人向高官显贵控诉，说他们读到传教士撰写的某些东西毁谤了偶像。传教士正以他们的布道或许是企图扰乱治安，通过一根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纽带煽动很多人造反。文人学士中间一些旧儒对基督教的日益流行感到不满。在南昌每月月初，官员和文人一起在孔庙里举行一次公众集会。在一次集会时，有一人向在场的最高官员布政司王佐讲话说：“我们想告诫你，这座皇城里有几个外国教士，他们宣讲本国从未听说过的教义，并在他们的住所聚集大批群众。”提学于是就命他呈上一份书面材料，并保证说他要以他全部的权威支持它，努力把外国教士赶走。市长和提学收下这份诉状；主审官就向传教士李玛诺问道：“为什么你们惹起学士们的仇恨之后还不离开这个城市？你们传播的是什么教义？你们犯的这种罪是什么？为什么你们禁止百姓敬奉祖先？你们拜的是什么邪神？你们买这些房子的钱是哪里来的？”有几名起诉人到新信徒的家里去搜寻救世主的画像，把两三幅画像撕碎了。

佛教高僧憨山决定运用他的权威阻止传教士们传播天主教的危险，决定访问龙华民，抱着要来会见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人的想法。传教士们著作中对他的猛烈抨击使他难以忍受，他威胁着要进行报复。寺院里的和尚认为：基督徒数目的增长就意味着他们自己信徒的数目相应减少，而更加严重的则是他们的收入也在下降。

曾有一个小官吏说无需询问基督教教义是真是伪，它是由外国人来说教的，这一事实就应成为镇压它的充分理由。

2. 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

明朝时官员和百姓对待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态度不一，但好奇者居多。

有几位官员到达韶州，声称他们想看看欧洲人和他们所带来的器物。一个年轻的贵族听说从欧洲带进来某些珍奇，因此急于先睹为快。展览皇帝礼物的消息一传开，客人成群地来观看。礼物的新奇超过他们的预料，很多人连连赞叹，他们不知疲倦地观赏和议论。一传十，十传百，直到参观变得不堪忍受，传教士不得不关闭门户。但参观者不愿被拒之门外，他们甚至准备破门而入。他们大夸欧洲的艺术和宗教。太监邀请他的朋友们到船上来鉴赏献给皇帝的礼品，一些人听说来自欧洲的新奇事物，出于好奇，也来观看。

在一次旅行期间，利玛窦多次登上石星号的船，他们长时交谈，双方均感满意，内容涉及欧洲的风俗习惯、科学进步和基督教的法律。

张养默被他的教师——医学家王肯堂派来向利玛窦学习，王氏是翰林院的翰林，翰林院是由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最出色的人组成的，能被挑选进来被认为是一种殊荣。

《畸人十篇》书里有几篇批评家撰写的序言，它们不仅赞颂这本书的出版，而且高度赞扬欧洲人的才能、数不胜数的书籍以及基督教的信仰。

在皇帝面前演奏的四名太监奉皇帝之命来见神父，请求教他们演奏古翼琴。

3. 对待西方科学的态度

西方科学是不同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在它最初传入时，不少学者是怀着浓厚的兴趣来学习它的。

瞿太素运用他从利玛窦那里所学到的知识写出一系列精细的注释，当他把这些注释呈献给他的朋友们时，他和他的老师利玛窦都赢得普遍的、令人艳羡的声誉。瞿太素对传教士经常是滔滔不绝

加以赞美,还说明他们带给中国的科学知识以及他是怎样开阔了知识的眼界的。有些人想做利玛窦的学生,他们为他的学识所吸引,并受到瞿太素的诱发,瞿太素已从一个学者成长为一个导师。

王弘海到教堂去拜访传教士,跟他们差不多谈了一整天,最使他高兴的是对一些数学问题的解法,他在北京时就已听说了不少。离别前,他答应在他回北京时,把利玛窦带到京城去校正中国历法中的错误,因为钦天监的天文学家不知怎样加以补救。他想作为这样一件重要工作的发起人定会提高他的声誉。

一位医生告诉江西巡抚陆万垓:传教士有数学机械可以表明一天的时刻和黄道十二宫以及别的很多事物,分毫不爽。他也谈到玻璃三棱镜的奇妙、欧洲书籍中的神奇及其他很多惊人的表现。听了这一切之后,总督想要为自己做一只钟,他要看看玻璃棱镜,也让他的家人看看。

在南京利玛窦与赵可怀讨论了数学问题并谈到欧洲的一般情况,总督极感兴趣,以致把客人强行留下了10天。还想请他制造历算仪器,但当知道他要动身前往北京,便同意他启程。学者李心斋害怕他儿子的名誉可能被作为数学家的利玛窦的声望所危害,便把他自己的两个精于中国天文学的学生带来拜利玛窦为师。

王肯堂经过长时期的研究之后,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中国数学体系;他试图建立一个体系,但最后放弃了这种努力。于是他把他的学生张养默派来,带有一封给利玛窦的推荐信,请他收下这个学生代替他自己教导。这个学生性情有点傲慢,但不久就变得谦恭近人。张养默自学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第一卷,并不断向利玛窦请教几何学问题。

吴中明要求利玛窦修订一下他原来在广东省绘制的世界舆图——《山海舆地全图》,给它增加一些更详尽的注释。他说他想挂一份在他的官邸,并放在一个地方供公众观赏。利玛窦非常乐于从事这项工作,他大规模重新绘制了他的舆图,轮廓鲜明,便于检查。他加以增订并改正了错误,毫不迟疑地修订了整个作品。官员们对这个新舆图感到非常高兴。吴氏雇了专门刻工,用公费镌石复制,并

刻上了一篇高度赞扬世界舆图及其作者的序文。有一位学者说，他前来会见最著名的数学家利玛窦是为了奠定他自己作为数学家的名气。

朝廷官员祝石林曾报答传教士们所送给他的几件欧洲礼物，他最欣赏的是那个玻璃三棱镜，认为这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那些要学习使用钟的人属于特定的等级，传教士们住在历算家的家里，日夜教这些人。按规定，跟官员说话要跪着说，但会同馆的主管官经常要传教士们就座免礼，甚至邀他们和他一起用饭。也请他们为他做点数学仪器之类。刑部侍郎王汝训是利玛窦的朋友，志在成为一个知名的数学家。在北京，很多人到教堂来参观西文书籍，他们对印刷和装订大感惊异，他们认为：毫无疑问，人们用这样的工艺如此精致地刊印这些书，其中所包含的教义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几何原本》，有很多人到利玛窦那里，也有很多人到徐光启那里求学；在老师的指导之下，他们和欧洲人一样很快就接受了欧洲的科学方法，对于较为精致的演证表现出一种心智的敏捷。

皇宫一位太监听说传教士们能把水银变成真银，这似乎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使他高兴。他说他知道这也是皇帝最感兴趣的，然而当他的奴仆听说传教士们并没有掌握这种魔力时，他就对传教士上的请求撒手不管了。

4. 对待外国人的态度

中国人对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的态度有接近与友好、疏远和憎恨两种。

接近与友好 肇庆知府郑一麟说，他有意要一位传教士陪他去北京，他手下有人则劝告他说带一位外国人去首都可能不安全，因为这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都聚集在那里。后来他改变了主意说：如果他们愿意去他的本省浙江，是没有问题的。官员想拜访传教士时，往往以教堂为借口。因为访问普通市民、特别是访问外国人，被认为有失他们职位的体面。李心斋与瞿太素都反对说南京府

是害怕和猜疑外国人的。瞿太素说：“苏州是一个港口，离海不远。那里税捐繁重，因而倾向是革命的。它随时可能爆发叛乱。南京则相反，过去几个月内战争的恐惧已经大大减轻了，所以和平和安宁有了保障。”起初南京钦天监的官员并不重视利玛窦，害怕他会有损他们的声誉，不久他们放心了，便作为朋友来访问他并向他学习。中国人认为一位来自一直被视为蛮类民族的外国人能够如此熟练地论述如此微妙的问题实在是难以置信，他们都要求复印他的文章。

南昌城里住有一位长期担任大阁老的绅士张位。当一些人向他谈到李玛诺，抱怨他所宣讲的教义时，阁老说：那是圣教，是由一位圣人在宣讲的，它丝毫不违反中国士大夫的教义。他们抗辩说他是外国人，他答道：“那又有什么？本城有一个外国人，你们怕什么？在两座皇城，不是有好几千阿拉伯人平安地住着，他们不是还可以按时得到学位吗？”

疏远与憎恨 传教士访问浙江的事件以及王洋的亲属的信件，使得传教士从前热心的保护人王洋逐渐撤销他的友谊，最后完全断绝了。他甚至通知传教士取消在新月节对他的例行访问，并命令把他的名字从他赠送的那两块光荣匾上抹掉，还叫抹掉他为利玛窦绘制的地图的署名。最后，当他在公众场合遇到一个神父时，他不像以前那样亲切相迎而是绷起脸，但还没有采取影响到他们居处的行动或措施。广州官员声称他们担心教团的出现会给国家带来大祸。另外，还有百姓的憎恨；百姓不满的是那本属于他们工作的修塔功劳却错误地归美于外国人，而他们则首先付出了劳动，还花了钱。在写给岭西道黄时雨的一封信中，两广总督刘继文声称：一些时间以来，澳门的几个外国教士住在城里，他们把打听到的有关中国的一切事情都通报给葡萄牙人。他们继续耍弄新的花招和手段来勾引无知百姓，利用谈话和书籍以达到那个目的，他们甚至把一个不用人接触就能报时的金属钟拿出来公开展览。中国人有一种忧虑：掌握了中国那么多情况并且被如此轻率撵去的那些外国人，可能利用所了解的情况去损害或者甚至毁灭中国。韶州

的一些人，共同发誓要把欧洲人驱逐出韶州。他们为此目的拟了一份诉状，指控传教士们违反中国法令，通过澳门和肇庆不断和外国接触。他们在这里修建堡垒，其中窝藏有 40 多名来自澳门的外国人组成的一支成军，还通过官员把无辜的当地人施以重刑。出自维护公益的愿望，他们提议并请求把这些外国人驱逐出境。

在百姓中传播各种谣言，并且发生了一种恐惧，认为由于洋人，公益可能受到损害。中国人相信：城里的祸乱都是由传教士郭居静引起的，他住在那里，穿着中国衣服到处走动，他计划接管中华帝国并且自立为暴君。葡萄牙人因为他熟悉中国的路径又到过两个京城，就拥戴他为领袖。他们正等待不久有一支舰队从印度以及从日本到来，而且郭居静的同伴们遍布中国各个地方，都纠集有一批追随者，已做好准备等待着一场暴乱。一群文人们刊布了一本小册子，文中说：他们不是出自任何个人考虑才起来反对外国人的，他们的动机是基于保全国家的完整，维护祖先法制。百姓要牢记，由于和外国人交通，中华帝国从其开始就遭受了大的灾难。根据国家的法制和规则，这样的人应该监禁在堡垒和牢狱里，而不许像本国人一样到处游逛，更不许骑在百姓头上，挑起恶意。传教士们吹嘘他们自己的国家比中国还要伟大，并且说他们和其他的外国人不一样，他们拒不承认中国领土的辽阔。这些外国人模仿中国人称“大明”而把他们的欧洲称为“大西”，同时因为中国皇帝称作“天子”，遂把他们的神叫做“天主”，从而把跟他们有关的一切事物都置于中国事物之上，犹如父或主之高踞于儿子之上一样。欧洲人计算他们的年代是从某个为人所不知的时间开始的，从某个并非中国皇帝的人而定纪元的；而且他们为他们信徒家中所书写的防范鬼神的文字，形状象是弓箭和斧头以及其他武器，这本身就是凶兆。把这些人留在中国当中是危险的事，要清除本省的毒害，正如古代文人经常所做的那样，大家不应对此感到惊奇。聪明的法子是从一开始就疗恶疾，而不是在后来疾病有了足够的力量抗拒治疗时，再去医治它。

中国人入教的障碍

利玛窦经过多年的传教实践,总结出中国人入教的多重障碍。

多妻制 瞿太素信服了天主教,表示愿意接受它;但是传教士还不能接纳他入教,因为他妻子死后,没有留下子女,他就和一个妾生活在一起,而又因为两人社会地位不同,他不能收她为正房。过了些天之后,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他把这个女人娶为合法妻子,并成为一名基督徒。工部员外郎李之藻受过传教士充分的教导,渴望领洗,他也存在着多妻制的障碍,他在另一个家里安置有姬妾。华仁未被接受入教,因为他同样受着多妻制枷锁的束缚。他没有子女,这在中国被看作是一件大不幸,在最初的会晤中传教士无法说服他为了永恒的得救而放弃传宗接代的希望。路加除了他的合法的妻子而外,他还养着一个妾;当她听说他不会再去见她时,便大发雷霆,把千诅万咒都倾泄在传教士们头上。她甚至威胁要在自己的家门口上吊自杀。

祖先崇拜 基督教的律法规定,凡是基督教的信徒都必须把自己祖先的偶像烧毁。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大不敬,这种事在他们的眼里要比在欧洲人看来严重得多。

偶像崇拜 要中国人把天主当作至高的神明来崇拜虽则是容易的,但同样困难的却是劝说他们把佛像全部都从宝座上撤下去。

灶王爷 中国人家里都有灶王爷,它陪伴着他们出生和长大,并且被尊为他们的保护神。若把它从神龛上撤除,这看来似乎是给予了粗暴的待遇。人们不忍看见偶像落到烟火里去,尤其是家里的炉火里。

择吉 许胥臣对办事要选择吉日,感到极其惶惑。他过去习惯于请教术士预卜未来,现在他很难与这种习惯决裂。

隐私 天主教的赎罪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人既惊奇又赞美,把自己最隐蔽的思想坦白给另一个人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

灵魂不朽 士大夫们特别期望知道有关生长和灵魂不朽的确

切知识,中国人中无论哪个教派都不完全否定这种不朽。

飞扬跋扈 对教会发展的障碍是,很多皇亲国戚是一个富有而无所事事的阶层,他们的跋扈是人们啧啧的。

高傲性格 斯蒂芬(姓彭,此为教名)入教的思想障碍之一是来源于他本人的高傲性格。他不能同意选择一位外国人作老师,而且还要按照中国风俗低三下四地贬低自己。

长生不老思想 许胥臣入教障碍之一是他努力要寻求一切可能延长现世生命的办法。

男女授受不亲 在中国古代,妇女被隔离而不能随便与男人相见。有位夫人自己家里从丘良厚修士那里接受教诲,从不见他的面,他向她讲话是隔着-一个挂了帘的门。

四、利玛窦的思想

人文主义思想

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出生和接受教育的利玛窦，也具有不少人文主义思想。

民族平等 虽然传教士有某种民族优越感，但利玛窦更多表现的是民族平等精神，这从他对中华民族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写道：我希望由于保留这样的记录（《中国札记》）而使我们耶稣会进入中国这个闭关多少世代的辽阔领土以及这个高尚民族所采摘的第一批基督教果实的故事不致湮没。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在鞭策着我进行这项工作，那就是，如果或迟或早上帝降恩从这最初播下的福音种子获得丰收，使天主教会的仓廩充实，那么日后的信徒便可以知道，过去为了使这些可敬的人民皈依上帝所做的值得赞美的工作应该归功于谁的媒介。

艺术鉴赏 利玛窦在他的作品中描述道：日本区主教柯罗特送给教堂一幅非常有益的大幅基督画像，这是真正的艺术品，由尼古拉绘制，他是第一位教导日本人和中国人学会欧洲画法的大师。菲律宾群岛某教派的一位牧师送来一幅精美的圣母画像，她怀抱婴儿耶稣，施洗者约翰虔诚礼拜地跪在他们面前。这幅在西班牙画成的画，绘制美丽，观赏悦目，因为它熟练地调用本色，人物栩栩如生。书法这种艺术在中国比在欧洲更为人重视，只要他写几个字就可以在南京以高价出售，几年以后，这种手稿的价值更大为增高。举行这种典礼的皇家庙宇是值得注意的。它不论从规模来说，还是从建筑的宏伟来说，都是真正的皇家气派。寺院本身气象雄伟，建筑在群山的最美丽之处，一条大溪把充足的清水供给它；寺院设计

美观，构造别致；在高原上，寺院和屋舍与馆宅相接，据他们说有1000名和尚。

一位尚书邀请利玛窦到他府里呆几天。他说他渴望邀利玛窦和他们一起看本年第一个灯节，由他的家人在晚上所作的奇妙烟火表演以及他们为几个晚上发排的精巧的灯笼演出。这种非凡的表演是公众庆祝活动常有的，其中并没有迷信的痕迹，邀请被愉快地接受了，拒绝将是不礼貌的。尚书家从对他非常礼貌的接待和他所观看的景象，使他感到惊异，超出预料之外。在烟火制造技术的表演这一科学方面，南京超过了全国其他地区，或者也超过全世界的其他地区。

主张公正 利玛窦申明：如果受理案件的法官不是一个公认为执法不阿的人，不是一个正义的严格捍卫者，那就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和麻烦。他声明，在一个法纪严明的公堂上，他和他的同伴将轻易地辨明对他们所加的指控，这是预见得到的结论。然后他请求对起诉严加调查，并把结果如实上报给检查官。很多人为了让人在官员面前说上几句好话就给他馈赠，而他穷得不知羞耻，便去接受它们。有些中国人就靠这种方法谋生和发达，很少或根本不顾及公道或法律。

利玛窦曾说：冯应京任职极为廉洁，毫无贪婪之念，一心为公，执法如山，特别是在审判案情牵涉到孤寡贫弱的时候。一次，冯应京发现自己的权力不足以扼止宦官陈奉，就写了三道弹劾他的有真凭实据的奏章。但陈奉毫不迟疑地进行反击。他仅写了一份文件，指控冯叛国，称他违抗圣旨；结果是他被罢职，械送北京。到了北京，这位非凡的人依旨受了毒打，被投进狭窄的牢房，不得与友人交通。他以极大的耐性忍受皇帝的这种暴怒，这倒使他更孚众望，他的名字更受尊敬。湖广省当时毫不迟疑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颂扬了它的捍卫者的名字。它刊行了许多纪念他的德政的书籍，印行他的画像，尽量把他画得逼真，并在全省散发，让百姓私下把他作为值得崇敬的人物来膜拜。修建了几座供奉他的祠堂，把他的塑像放在其中的祭坛上，前面香烛焚烧不绝。所有这些充分表现了

人们的称颂和爱戴。

友谊 利玛窦认为,有人说“当你发迹时,就会有許多朋友”,这话确实是真理。所有过去那些抛弃他们友谊的人,现在又都来极力拉拢友谊,全城之中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很难怀疑,上帝已为传播福音的广阔天地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入口。利玛窦用中文写成的《交友论》,其中像西塞罗在他的《莱里乌斯》(LeLius)中一样,是皇帝向利玛窦询问了欧洲人对友谊的看法。在这篇并不太长的对话里,作者从哲学家、教父和其他公认的作家那里收集了有关这个题目的材料。这本书为人们阅读和称羨,并受到读过它的人的推荐。就在它付印后不久,赣州有一位知县把它加以重印,流传于各省,包括北京和浙江。它到处受到知识阶层的赞许,并往往被权威作家在其他表述中引用。事实上,在一个短得可惊的时期之内,这部书被当作标准本读物为人们所接受。

关于经济的见解

利玛窦对经济,尤其是贸易,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下面的论述见于他的《中国札记》。

香精 中国人似乎对于花的形状和色要比香味更为喜欢,在他们开始与欧洲人贸易往来之前,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从花草里提取香精的技术。

马 马和其他驮兽的个头或样子都比不上欧洲的,但在数量、价钱便宜和负载能力方面都胜过了欧洲的,在遇不到河流的地区就用它们来驮运东西。

棉纺 棉籽传入中国只是40年前的事,因为土地肥沃,生长得很好,以致中国可以生长的棉花足够供应全世界。缫丝业规模如此之大,很容易与欧洲产品竞争,虽然后者或许质量要好一些。他们也用丝掺以棉织成一种大马土革式的料子,并且他们模仿欧洲产品现在又织一种金丝的料子。他们的其他纺织品也在欧洲找到一个现成的市场,他们产品所要的价钱大约是在西方所付同类产

品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他们用大麻纤维和其他植物制做一种粗布供夏季穿用。

银币 银被用作货币,无论是论重量或做成货币,都是一切商业来往中的法币。这当然会造成困难,例如银价的浮动,就必须在兑付银票时时常加以考虑,而且易于造假,造假是常见的事。在很多地方、买卖较小时就使用一种小铜钱,它是官办的造币厂里铸造出来的,在很富的人当中银元宝甚至金元宝都在使用,但比在欧洲用得少。

瓷器 中国人常用的餐具是陶器。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西方叫它瓷器。无论从材料本身或从它又薄又脆的结构来说,欧洲陶器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最细的瓷器是用江西(景德镇)所产黏土制成,人们把它们用船不仅运到中国各地而且还运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在那里它们受到那些欣赏宴席上的风雅有甚于夸耀豪华的人们所珍爱。这种瓷器还可以耐受热食的热度而不破,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如果破了,再用铜丝缝起来,就是盛河水也不会漏。

煤 木头、芦苇和稻草等等用于烧炉火,还用一种和比利时的利奥弟安斯(Leodienses)主教区采掘出来的煤相似的东西。他们叫它煤,凡是我们用煤的地方他们都用它,烧起来并不发生带臭味的烟。老天对北方人更宽厚一些,北方的这种煤藏很多,质量也好。人们把煤从地下采掘出来后,广泛运往全国各地,价钱很低,这里的煤很充足,即使最穷的人也可能用它做饭和烧澡水。

药材 中国的药草丰富,而在别处则只有进口才行。大黄和麝香最初是阿拉伯人从西方带进来的,在传遍到整个亚洲以后,又以几乎难以置信的利润出口到欧洲。在这里买一磅大黄只要一角钱,而在欧洲却要花六七倍之多的金块。在这里还可以找到葡萄牙人叫做中国木而别人则叫做圣木的那种能治多种疾病的著名的药。它不用栽种,野生在荒地上,只要花点采掘它所必需的人工钱就能买到,但却以高价出口。

茶 这种灌木(茶)叶子分不同等级,按质量可买一个或两甚至三个金锭一磅。在日本,最好的可卖到10个或甚至12个金锭一

磅。

漆 出口这种特殊树脂产品(漆)很可能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但迄今好像没有人想到这种可能性。

胡椒 胡椒、坚果、和其他这类物产是由附近的摩鹿加群岛(Moluccas)或其他地方进口的,但越来越不受欢迎,随着进口多了价格也在下跌。

史学思想

利玛窦的史学思想包括历史观、史学精神和方法三个方面。

1. 历史观

利玛窦的历史观基本上是神学历史观,他认为一切事件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上帝的意旨和安排,成功于天助、天恩。这些思想在《中国札记》中有比较全面的反映。

天助 范礼安认识到中国传教团已较预期的取得了更多进展并且趋昌盛。他特别把这件事归之于上天的帮助和那些比较了解中国情况的人的谨慎和勤奋。

利玛窦和他的朋友吏部尚书王弘海十分担心留在临清过多的传教士们会落入这些凶徒的魔掌。在王尚书看来,宦官们不可能放过传教士们的宝贵行囊的,但是利玛窦却掩饰起自己的担心并安慰他说,上帝会证明他是怎样小心翼翼要保护自己的事业的。

看起来似乎是上天一直在等待着传教士们放弃一切人类的援助的希望,而把他们的计划完全托付于上帝之手。的确,一旦他们这样作的时候,天意马上就来帮助他们了。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仿佛是回答了很多人在多个地方请求上天保佑这次远征成功的祈祷。他们相信是手里掌握着皇帝的心灵的上帝以他自己神秘的方式造成了这场突然的变化,以便拯救这些灵魂。

万历皇帝对传教士留京传教的请求没有做正式书面批复,而是口头表示了决定,大太监把它转告给传教士们。它通告他们可以

放心住在京城里，他不愿再听有关让他们回到南方或回本国的话。传教士们听到这话犹如接到正式的答复。他们为天主而欢乐，由于天意的帮助他们终于战胜了反对并克服了一切阻碍。他们不仅被允许留下，而且公家还拨款津贴他们，每四个月发一次，每个月相当八个金币，这在这个国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在欧洲看来也是这样。

利玛窦说，由于上帝的保佑以及一些朋友的庇护，传教士们胜利地挫败了他们的对手们的故意活动。并说由于上天援手的及时干预才消除了一次阴险的恫吓。

从利玛窦记述的以下几件事可以进一步看出他的“天助”观。

当时广东省的情势如此，以致整个入华传教团的形势从没有比这更加危险过，但神意的支援是不会长期缺乏的。它就随着一位道里级的大员从北京返回而到来了，此人把普遍秩序恢复到这种程度，连首当其冲的龙华民也习惯把他称为天遣使者以重建基督教的地位。

传教士鄂本笃在来华路上失掉了马匹，他便呼唤耶稣的名字，那匹马便立即转身回来。从看来是不幸的事件中获救，所以鄂本笃热诚地感谢所受到的上帝的保佑。

鄂本笃到宫廷后，就应邀和回教律法的博士们进行辩论，并得到上帝启示如下的话：“你要说的话，到时候会告诉你的。”他用那么有力的论证来捍卫基督教的真理，以致博士们羞愧无言。

有很多人都说圣教宣场者是生活在天主的保护之下，也蒙受官员人们的荫护，他们就仿佛是天主的副手。看来明显的是，超过了他们的腐儒对手的印象，官员对神父是更为了解的。从前，那里的人完全不知道北京的神父们和朝廷里大官之间的关系，那以后这还是通常谈论的话题。

广东省传播的诬陷远还没有到达南昌城，这真是天意保护的一个不小的证明。如果知道了有一个神父，即郭居静，被指名为澳门叛乱的首领，那么这里的不满分子就会无疑地更加大胆，而教团朋友的忠实性也会随之减少的。

有份抨击传教士的书刚刚刊布后不久,看来像是上天作出了昭雪,它的两名作者突然暴死。三名作者之中有两名几乎同时死去,而且两人都是士大夫法规的宣讲者,他们确实配不上他们所佯装在实践着的那种宣言。当他们被认为和神父们交好时,他们实际上正在给激烈反对神父们的诉状煽风点火。另外有几个人则受到各种病痛和灾难的折磨,使信徒有机会认识到上帝之手是在实施公道,这确实似乎是落到这些诬告者头上的雪冤霹雳。

李之藻允许他全家人和下属都成为基督徒,甚至于规劝他们信教。他有两个年轻的亲戚,都是有学衔的人,成了异常虔诚的信徒。推动他们信教的,是他们自己的智能、神恩的帮助以及毫无疑问地也有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影响,他总是在谈基督教的教义,而且他坚持说除它之外,便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找到得救。但他仍然是那些既把真理捧上天却又并不接受它的人们中间的一个。

葡萄牙人马六甲的特伊蒂阿总督的罪行已把自己置于惩罚临头的地步。确实,这一点沙勿略是太清楚了,以致他公开宣布此人的贪婪和野心将会马上使他得到应有的制裁,影响到他的财产、他的人品以及人身,这预言很快就实现了。阿尔瓦列斯·特伊蒂阿害了麻风痛,公开被控犯有种种罪行,并由于藐视果阿总督的职权(因为他有权授权给沙勿略)而被逮捕,被定为叛逆罪,带着铐链被送往果阿,又从那里转送葡萄牙在国王面前受审。他被判决剥夺财产,当众受辱;他似乎真正遭到天惩,死于可怕的疾病,为社会所唾弃。

上帝保佑,耶稣会的会友凡是献身于在这个民族中的传道工作的,都经过不懈的努力而学会了说他们的语言。

天恩 利玛窦说,还有一个原因在鞭策着他进行这项工作,那就是,如果或迟或早上帝降恩从这最初播下的福音种子获得丰收,使天主教会的仓廩充实,那么后日的信徒便可以知道,过去为了使这些可敬的人民皈依上帝所做的值得赞美的工作应该归功于谁的媒介。另一方面,如果情形是,由于上帝的隐蔽的判断,预期的丰收并未得以实现,那么至少后代可以知道这个小小的耶稣会曾经付

出多少劳动和经历多少艰辛去驱散不信教的深厚的阴影,以及他们怎样抱着耕耘这片新土地的崇高希望而在热情和勤奋地工作。他说,有谁能怀疑他们的这次远征不是在神意的指引之下进行的呢?因为它完全献身于把福音之光带给人们的灵魂。如果蒙上帝恩宠,将来他的一些同伴们能把福音之光带到更西边的地方,而且在这些旅行中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宽度作出更准确的测量,而与他所肯定的数字不同,那么他敢说差异也将会很小。

利玛窦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他们全心依赖着上帝的仁恩,在这种情况下,神父们始终把个人安全和教团的胜利委之于上帝的特别保护下。这一次,上天的关切仿佛格外明显,当地的百姓竟无法和他们自己的审判官一起来侵犯两个完全是异邦人的外国教士的人身。

利玛窦为他同伴的死深感悲痛,对于应否继续旅行,他深深感到疑问。然而,他鼓起勇气,信赖神恩所赐的美好前景,仍决定实现计划。参议徐大任在南京的消息使利玛窦喜出望外,他赶紧告诉了总督的儿子。他觉得好像是上帝赐他的恩福,那是他每天作弥撒时都在祈祷的,是长期都在希望着的。文件和告示都盖有他的官印,感谢天主的恩典,靠了官印的权威,神父们终于悄悄地和牢固地建立起他们永久性的中心了。

由于了解在中国法律和习俗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所以耶稣会远东地区视察员和耶稣会的其他人都确信,在短短几年内就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乃是上帝保佑的结果。因此他们感谢上帝,这不仅因为神恩的光已经突破了几个世纪的黑暗,而且因为有很多人竞相参与这个特殊葡萄园劳动。

天意 利玛窦将许多事情的发生都归于天意,他说:确实,看来就好像是上帝宁可高兴为了一桩差不多要完成的工作而奖赏他的仆人方济各(Francis),却不愿意他把这个工作胜利结束似的。也许这个帝国还没有好播散福音的种子,或许更合适的是把它们保留给那些后来的人。是否为了他巨大的功绩,最好是奖给这位英雄以一顶天上的永恒王冠,而不是让他去开辟另一条鞠躬尽瘁的

事业的道路呢？

虔诚的、富有品德和学识的方济各和多明我两派教士，在沙勿略死后极力促成基督教远征中国之行。他们当中有的随葡萄牙人来自印度，另一些则随西班牙人来自远西；可是尽管他们有着非凡的热诚，却未获得持久的成功。天意可能发现他们的劳动在别的土地上更有收获。

自从澳门最早有人居住以来，驻留在那里的耶稣会士几次试图进入中国，但都未获成功。他们可能为了实际入境而遇到许多有待克服的困难的阻挠，但更可能是他们在日本获得巨大成功的传教事业太忙而不太顾得上中国。这样，中国好像庄稼尚未成熟，还得留待未来的岁月。最后，当按他的神意去安排大事的上帝高兴时，那盼望已久的事就终于实现了。

中国第一个公开信仰基督教的人来自最低层的百姓。上帝显然选择了地上微小的东西来挫败巨大的东西。

按照上帝的安排，对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候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人民关心基督教。

有一次在宣讲洗礼结束时，有 18 个人领洗，有时看来好像上帝在用特殊的事件来开启人们的灵魂。

当利玛窦等被逐去肇庆时，万事都像是天意安排，总督命令副长官准备一艘快艇，配备足够的水手，全速出发追回旅途中的外国人；并且当他们回来时，要想方设法让他们收下所偿付给他们的那 60 金币。在耶稣会视察员看来，按照上天的正常安排，经过在肇庆的劳动和失败之后，未来必定会有更丰硕的收获，麻烦也会更少。深切地察觉到这次经验和使他们受到教训的类似的过去经验，他们在短期内就做出了长足的进步，以致得出结论说他们离开肇庆并没有任何损失。事实上，他们还高兴地发现他们因迁徙而得到好处。看来上帝为了他的名字的更大的光荣，为了基督传教团有更大好处，才允许过去饱经艰辛。

在离开肇庆去韶州以后，他们又遇到一些困难，利玛窦想：天意的规定没有让这种和平和安宁继续下去。似乎是这个初生的教

会会植下更深的根，倘若它能经历一系列困难的考验和折磨的话。

当利玛窦第一次到北京传教失败时，他的感受是：接待一个外国人竟是如此可怕，以至即使他们呈上尚书写的推荐他们事业的信，也没有任何影响。最后，他们的努力看来绝望了。他们的结论是，福音的光辉照亮北京城的时刻还未到来。全部计划被搁置在一旁，他们决定回到南京去。看起来把这个努力推迟到另一个时间较好；因为现在有战争恐慌，很可能有使已完成的工作遭受危险的不幸，或者会造成将来再加来的障碍。

利玛窦在进入南京城时突然觉得：这一次他一进城，就认出这是天主在他梦中向他指示的地方，他仿佛曾在这里无拘无束地行走过。现在他对除去在梦中外他从前所未见过的街道和宫殿感到惊奇。他感觉到这决不止于是一个梦，或者是一个幻觉而已，就像是一个人当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一个唯一的愿望上时，所可能体验到的那种。他意识到人们对他的巨大变化是上帝带来的，所以他决定住在南京，任何地方都不去，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尽管也有各种人事的考虑。

多少世纪以来，上帝表现了不止用一种方法把人们吸引到他身边。垂钓人类的渔人以自己特殊的方法吸引人们的灵魂落入他的网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任何可能认为伦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在教会工作中并不重要的人，都是不知道中国人的品味的，他们缓慢地服用有益的精神药物，除非它有知识的佐料增添味道。

看起来似乎十分明显，天意正在这个大国奠定一个坚实的希望基础。因此，如果回顾一下为了达到这一日的所使用的某些特殊的方法，那将是十分合宜的。

利玛窦还多次谈到天意的作用，他说：也是天意的引导，那位称藩王的人给苏如望的通知一直没有送到，受托送信的人根本没露面。又给神父发出了其他的信件，但信件直到天意把一切事情都另做了安排之后才送到。神父们开始懂得太监们的策略了，他们决定这样重大的事情不能交托给这种不讲信义的特殊家伙。利玛窦向那位名分上的藩王表示感谢，并通过他通知了收税审的头子，他

已经从另一条渠道开始谈判，谈判目前尚未完成。

中国大多数人都不愿与神父打交道，唯恐由于里通外国而失宠。也许上帝允许发生这样的事，以便向他们表明人世的关系是多么地不稳定。他们完全察觉到这一点，并为此感谢上帝，他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他们是多么完全依靠着天意。

那个大胆声称上帝只有在天堂有权力的人——吏部尚书李戴，通过惨痛的经验明白了上帝也主宰着人世。

看起来似乎天意要选定徐光启在北京成为基督教的保卫者，因为完全超出了他最大的希望，他被留在北京，并被委派了一个显职。

与其说天意是传教的动力，还不如说是传教士的信念，每每论述传教遇阻，后又解决时，利玛窦都想到是天意。他说：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上帝允许要发生的，不仅是由于异教民族的缺点，而且也由于这些伟大的灵魂可以在天上他的宝座之前作为求情者，他在天上也一定会同样关心基督教的传播而且更加有力地推进它。

在肇庆，收到状子的每名官吏都声称，如果市长在听审本案并通告外国人之后认为可行的话，那就该禁止传布基督教，把教士从城里驱逐出去。那些对中国办事的方法一无所知的人，都很相信神父们至少要被赶出省城；结果是神父们的许多朋友在看来是一场绝望的案子中，迟疑着不给他们以援助。但神父们本身倒不太烦恼，他们把信心放在天意上，在遇到其他这类危难时，它始终是出来给他们帮助的。

至于天意所允许的一般迫害，一旦骚乱平息下来，它们都会更有助于基督教的传播，胜过无穷尽的持续不断的和平时期。教会的敌人力图把神父们从南昌赶走，结果却是他们在那里立身比过去更加巩固。

如果一个外国人没有正式国书进入中国，官员就会对他用刑，或甚至处死，或者把他监禁起来，终生服奴役。这一切对沙勿略说来都不是新东西。事实上，他已估计到比这里所提到的更加严重的危险，甚而已经写信把这些告诉了他的耶稣会同道。他回答他的朋

友说,如果由于恐惧感就从他根据神意而进行的使命中退却,那看来就是对上帝的旨意失掉信心。他又怎样能解释福音书所说的“凡为我丧失生命的必将获得生命”呢?最后,如果他已着手这件事,现在又退缩,那就会认为自己不配进天国。

2. 史学精神

此节及下面的“史学方法”,直接取自利玛窦著述,各段前的黑体字是作者标的。

实事求是 我们力图如实叙述而不愿以溢美之词把它呈献给读者。在本书中,我丝毫无意贬低我们的年鉴或我们同伴们的私人信件,只要它们确实可信并以权威为依据,而且当然它们应该是这样的,除非是它们之间偶尔有矛盾的地方。再者,我也无意在这样一本史书中叙述每一个细节或评论其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因为确实有许多别的事情是十分值得加以记录的。

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有丝绸,以至不仅那个国度的居民无论贫富都穿丝着绸,而且还大量地出口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葡萄牙人最乐于装船的大宗商品莫过于中国丝绸了;他们把丝绸运到日本和印度,发现那里是现成的市场。住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国丝绸装上他们的商船,出口到新西班牙和世界的其他地方。在中华帝国的编年史上,我发现早在基督诞生前 2636 年就提到绢绸工艺,看来这种工艺知识从中华帝国传到亚洲其他各地,传到欧洲,甚至传到非洲。

尊重历史 为了对这次传教的创始者和发起人以及对这次远征的本身公正起见,我们的叙述必须从方济各·沙勿略这个名字开始。最初的想法和实现它的最早的努力都是他的,他的死亡和葬礼导致了传教的最后成功,这一情况证明他对创造者和奠基者的称当之无愧的。我们深信,当他向他的同道打开中国的大门时,他从他在天国的地位所成就的事业,远超过他在人间奋斗一生中出于热忱而产生的影响。沙勿略发觉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无数百姓

是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资质的，他是第一个决心在他们当中传播信仰的耶稣会士。

记述这种每半年一次的市集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为福音的信徒们深入中国内地提供了最早的、唯一的通道。为此，我们要感激葡萄牙人的勤勉、好意和宗教精神，凡有他们出现的地方都可以听到他们的赞诵并感到他们的宗教影响。

客观公允 中国人是个好思考的民族，他们不无道理地常常要对自己宗教信仰中的许多荒谬抱有怀疑。我们把圣诫用中文印发给需要他们的人。很多得到圣诫的人说，他们将来要按这些圣诫生活，因为他们声称圣诫完全符合良知和自然律。

在教堂接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全图。有学识的中国人啧啧称羨它；当他们得知它是整个世界的全图和说明时，他们很愿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标准的同样的图。当他们听说中国仅仅是大东方的一部分时，他们认为这种想法和他们的大不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求能够加以研读，以便作出更好的判断。

当中国人头一次看见我们的世界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但更有教育的人却不一样，特别是当他们研究了相应于南北回归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时。再者，他们得知五大地区的对称，读到很多不同民族的风俗，看到许多地名和他们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致，这时候他们承认那张地图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从此之后，他们对欧洲的教育制度有了更高的评价。

不避忌讳 澳门行政当局认为提出西班牙使团的主要原因是 在同一省内要打开和中国人的贸易关系，而这是他们自己已在该省进行的。这就意味着一定会使他们的生意和殖民地遭到破坏。菲律宾群岛有大量银子，那是每年从新西班牙和秘鲁省送来的；但是葡萄牙人估计，如果这笔钱用来购买广东省的中国货物，那就会破坏贸易市场。以后葡萄牙人就不得不用更高的价格购买这些货物，并被迫用低价把它们在海外售出。

因此，在一份正式通知中神父们被告诫不要再推动那项拟议

的计划,因为它意味着殖民地的灾难,而他们自己正靠这个殖民地得到许多好处。通知中复述,澳门的人民确信传教士不愿给他们造成不幸,而且他们还说,让西班牙获得遣使中国皇帝之荣乃是不合时宜的。这一荣誉应属于葡萄牙人,当有关与中国贸易的问题提了出来在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国王之间作出决定时,教皇亚历山大第六早就把它判归葡萄牙人了。

贬褒得宜 在我们记述的这几年时期当中,东方的海上经常有荷兰海盗出没。曾有几年他们横行一时,因为那时的葡萄牙船队虽然有足够的武装可以击退东方人或土著人的船支的进攻,但不足以抵抗欧洲的枪炮。有时候东印度人也乘他们的小船干海盗勾当,但是他们不敢冒险进袭比较大的葡萄牙商船。事实上,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印度各国就失去了海上控制权,几乎在东方到处都习惯于在启航前先从外国总督或其部下那里取得港口出入证。他们的商船实际没有武装,如果一旦落入荷兰或英国海盗之手,就会轻而易举被俘获并被洗劫一空。后来他们也用欧洲枪炮弹药武装他们的船队,情况就改观了,他们也常常把敌人击溃或消灭。

荷兰海盗们被自己的成功冲昏了头脑,竟决定要侵占马六甲和莫三鼻给的葡萄牙殖民地。

荷兰人入侵中国的努力并不成功。他们明显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弱点或者是在他们当中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即拿得太多,就难以保住。他们试图在福建这个东南沿海省份登陆,对那里的人民许下各种各样的愿,那就是,他们会让当地人做生意发财,他们会把日本人和葡萄牙人赶出澳门以及把西班牙人赶出菲律宾,就好像中华帝国的威力还需要他们的船队来帮忙似的。当他们看到中国人对他们的许诺置之不理时,他们就改为威胁,放了几炮想要吓唬他们,竟好像他们是孩子一般。但是,他们的威胁并不比他们的许诺更有效果。他们才明白他们的嘘声恫吓是不能希望得到什么的,于是他们放弃了武装远征并征服中国的想法,转道马六甲到了巴他拿(Patana)皇家港口,继续干海盗的老行业。他们主要的埋伏地点是在新加坡外面的海峡,他们在那里等候着满载中国出口货物的

葡萄牙船从中国返回印度。

就是这伙海盗以前曾威胁说要攻打澳门的，因为他们以为澳门是块肥肉。这座城原没有防护设备，所以就在这时人民正开始修建一座墙作为碉堡之用。这座碉堡或墙建造在山上，离耶稣会神学院和教堂都很近，教堂不慎被毁于火，现在正在重修。居民中的中国人倾向于不要同时修建教堂和墙这两座建筑。虽然他们抗议，教堂还是竣工了，但修墙的工程当对海盗的恐惧平静下来时，就停了工。

传教士以撒在返回印度的途中，他乘坐的船只在新加坡海峡被荷兰海盗俘虏，他的一点财物被洗劫，他本人被夷为贱奴。后来他被满刺加的葡萄牙人赎回，继续前往印度。

至于肯定地说在契丹的，意即指在中国的基督徒人数，阿拉伯的目击者要么是信口开河，正如他们那里所常见的那样，要么是他们被外表所迷惑，把仅仅是想象的说成为真实。他们自己从不礼拜任何一种偶像，而当他们看见中国庙里有无数的偶像，有时候有点类似圣母或圣徒像，他们就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是同一个。或许他们还看见祭坛上的灯和蜡烛，异教祭司们穿的法衣有似于我们礼拜书中所记载的僧袍或长袍，因为把礼拜者的外表形象给弄混了。也可能是他们听见寺院里的咏唱听起来好像我们教堂中格雷高里的圣咏。所有这些，他们都可能看见过和听见过，也还有魔鬼传入异教典礼中的其他模仿形式，这是对圣物的拙劣模仿，企图窃取属于上帝的荣誉。这类证据的积累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许多商人，特别是阿拉伯的商人，误认这个民族信仰基督教。

因为中国人对于宗教的事从不采用武力或强制，对外人尤其如此。在这方面他们容许有完全的自由，或者说，这种宗教自由来源于他们当中的宗教派别极其混乱。而在某种方式上，这个事实对于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也帮助不小。

有一天，吏部给事中曹于汴来到管外国人馆舍的官员或者说主事那里，斥责他没有让神父们离开这座牢房进城去。这位馆舍官员的级别要低于同类的许多人，担心可能发生的事，便派人通知利

玛竇,叫他尽快交一份禀帖,说由于健康不好而使节馆舍内又缺乏医药和其他必需品,所以要求允许他本人和他的同伴迁居城内。这位官员写了一份文件,允许他们有充分权力自赁房屋,在城内他们愿意的任何地区居住。他派了四名差役,每五天给神父们送去同样定量的为他们所习惯接受的食物。它们包括米、肉、盐、酒、蔬菜和薪火。他们还派一个差役供他们经常使用。自然,神父们对这种解决他们问题的办法非常高兴,他们感谢上帝把他们从监禁的境况中释放了出来。即使他们由于在这种地方受到拘留,名誉受了损害,但因允许他们自由,所以尽管有现行的法律,他们的名誉还是完全恢复了。

经过日复一日的勤奋学习和长时间听利玛竇讲述,徐光启进步很大,他已用优美的中国文字写出他所学到的一切东西;一年之内,他们就用清晰而优美的中文体裁出版了一套很像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这里也可以指出,中文当中并不缺乏成语和词汇来恰当地表述我们所有的科学术语。

在《《几何原本》》第二篇序言里,徐光启对欧洲的科学和学术文艺写了一篇真正出色的赞颂。这本书大受中国人的推崇而且对于他们修订历法起了重大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本书,有很多人都到利玛竇那里,也有很多到徐光启那里求学;在老师的指导之下,他们如欧洲人一样很快就接受了欧洲的科学方法,对于较为精致的演证表现出一种心智的敏捷。

真难说清徐光启对于基督教事业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他把很多别的人领入教门,虽然他自己忙于做其他的事情。

神父们显然还不了解中国的法律,而是按欧洲的习惯来判断事物的。罗明坚没有得到这位皇子的接待。反之,有命令要他先去见总督,然后见其他官员,申请批准他的访问。

范礼安作为宗教领导人的长期经验,使他能够用适合情况的命令和教诫去处理和控制形势。他得到了顺利开端的消息即成功地进入中国、长期定居、新盖屋舍,还有福音和福音传播者所赢得的巨大威望,这时他首先禁不住要感谢上帝这位恩惠的源泉,然后

就要为教团的进一步巩固作出安排。

历史感 我希望由于保留这样的记录(《中国札记》)而使我们耶稣会进入中国这个闭关多少世代的辽阔领土以及从这个高尚民族所采摘的第一批基督教果实的故事不致湮没,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在鞭策着我进行这项工作,那就是,如果或迟或早上帝降恩从这最初播下的福音种子获得丰收,使天主教会的仓廩充实,那么日后的信徒便可以知道,过去为了使这些可敬的人民皈依上帝听做的值得赞美的的工作应该归功于谁的媒介。

3. 史学方法

背景分析 因为本书(《中国札记》)是为欧洲人撰写的,我认为有必要在开始记录我们在华经历这项主要任务之前,简略地述说一下这个国家的位置、它的风俗、法律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读者不致因经常碰到那些否则就不得不插入的解释性的段落而多次中断日记中的故事线索,感到厌烦。然而,有关要处理的题材,我将坚持只涉及那些与我们自己的习俗不同的东西,从而这将给读者提示一些历史上的新东西。

实地调查 现在,我们十分高兴地提供一引起关于基督教遗迹的证据,我们相信这一定是我们欧洲朋友们特别感兴趣的。这些见证有些是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来访者那里得到的,有些则是由过去几年中观察到的一些迹象推论出来的。我在肯定了那位中国硕士朋友确实是古希伯莱教的教徒之后,就决定寻找比此前所搜集到的更为确切的关于基督教在中国遗迹的证明。

实物证明 既然我们正在谈论中国人有十字架的证据,我们或许不应该遗漏这样一件事,它也是说明有十字架存在的另一个迹象。有一天,我们的一位神父看见一个串街走巷的古董商人卖一座铸作精美的钟。钟顶上的雕刻表现着一座庙宇或教堂,在它前面则是一个十字架,四周有希腊文的铭文。

文献考察 利玛窦要求开封的那位兄弟把犹太教堂中所有书籍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抄录下来,结果发现和我们的《旧约》头五卷

完全相同,所用的字体也一样,除了古人不用标点而已。利玛窦后来又派这位兄弟再次去到那里,这次携有一封信去见犹太教堂的主持人,告诉他利玛窦在北京家中有全套的《旧约全书》以及一部《新约》,《新约》内容是叙述弥赛亚的生平和工作,他肯定弥赛亚已经出现过了。犹太教堂的主持人对这最后一点表示异议,并回答说弥赛亚要再过一万年才会降临。

鉴于我们从马拉巴(Malabar)地区,从迦勒底文圣经抄本中所收集到的资料,我们还可以把基督教在这些地区的起源追溯到更早的时候,而这个抄本甚至最挑剔的反对者也难以否认就是使徒多默(Apostle thomas)所宣扬的。这些资料里说得很清楚,是圣多默本人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他确实在这个国家修建了教堂。为了防止阅读这些文件时有怀疑,我们将提供迦勒底文手稿的译文是由约翰·玛丽亚·坎波里神父(Father John Maria Compori)逐字逐句译成拉丁文的,那位耶稣会士曾在那个特殊的葡萄园里劳动过多年,是使用迦勒底语言的专家。

经济因素分析 与其说澳门是个半岛,还不如说它是块突出的岩石;但它很快不仅有葡萄牙人居住,而且还有来自附近海岸的各种人聚集,都忙于跟从欧洲、印度和摩鹿加群岛运来的各色商品进行交易。迅速发财的展望引诱中国商人到这个岛上来居住,于是在几年之中这个贸易点开始出现了城市规模。当葡萄牙人和中国人通婚时,修建了许多房屋,不久那块岩石地点就发展成一个可观的港口和著名的市场。

类比分析 范礼安认为:中华帝国幅员辽阔,它的百姓品格高尚,事实上他们已经和平地生活了若干世纪,从这些来判断,可以肯定,他们行政制度的智慧和他们官员那种著名的精明似乎会支持拟议中的这次远征的。人们不难相信,一个聪明的有成就的、献身于艺术研究的民族,是可以被说服同意让一些同样以学识和品德而出名的外国人来到他们中间居住的,特别是假如他们的客人精通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话。看来还有希望的是,这个民族有一天会乐于接受基督教的,假使他们看到对于他们的政体,基督教可以作

为一种帮助而非一种损害的话,也可以教育中国人以良好的人生观和对永恒幸福的愿望来代替他们的浮华。

如果对一个欧洲人来说,这种自封的管辖权似乎有点奇怪的话,那么就请他想一想,如果中国人听说我们也有很多统治者在并不管辖中国的广大领域的同时却给自己加上同样的头衔,他们一定会同样感到惊奇不已的。

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孔子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地理形势分析 广东省的总督被认为是他的同级中极有势力的一个。他的省份位于中国的边境,远离都城北京,被漫长的海域所包围。它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结果是,道路上盗匪充斥,海道上也有海盗,大多是日本人。为了补救这种局势,他还受命管辖邻省广西,这就使他在需要的时候能调动一支大军。因为有这些难题,他的政府所在地不是本省的省会,像别的地区那样,而是在他所治理的两省交界处的肇庆。

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任何交往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所有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百姓所共有的这种恶感,在广东省居民中间来到特别明显,这里的文化不如别的省份先进。事实上,广东省是帝国的附庸,甚至今天还被其他省份当作蛮夷之邦,其他省份在文化教养方面比它强得多,授与的学位更多,提供的高官显宦也更多。这些百姓的不快心情只能因下面的事实而加深:他们的省份海陆两面都暴露在外国人面前,陆上强盗和海盗的抢劫使他们经常遭受重大的损失。近来他们又大受葡萄牙人到来的骚扰,特别因为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而变得格外严重,那是由于国库和某些有势力的商人从葡萄牙商人那里得到很大的好处所致。且不提国库或来自他省的商人,他们抱怨说对外贸易抬高了所有商品的价钱,由此得利的只是洋人。为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这个名字在广东人中仍

然在通用。

肇庆市民有自己的特殊理由仇视外国人。他们害怕葡萄牙商人会随传教士深入内地，而这种恐惧是不无根据的。神父们常去澳门城，他们和长官越来越亲密，这已经引起他们的反感。

梅岭山屹立在两河之间，标志着两省的分界线。越过它要花一整天时间，翻山的道路也许是全国最有名的山路。从山的南麓起，南雄江开始可以通航，由此流经广东省城，南入于海。山的正面，在南安城，有另一条大河流经江西和南京，途经很多其他城镇，东注于海。许多省份的大量商货抵达这里，越山南运；同样地，也从另一侧越过山岭，运往相反的方向。运进广东的外国货物，也经由同一条道输往内地。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否则用驮兽或挑夫运送，他们好像是不计其数，队伍每天不绝于途。这种不断的交通的结果使山两侧的两座城市真正成为工业中心，而且秩序井然，使大批的人连同无穷无尽的行装，在短时间内都得到输送。

辩证方法 对这一事实的原因经常加以思索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一切事件，即使是后来获得巨大规模的事件，在开始时都是如此之微不足道，以致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希望会在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事情。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那些可以说是从小就培养来做这些事件的人都不使自己劳神费力把当时似乎并没有重大意义的事实铭记在心。或许还有人可以偏爱这样的解释：这些事业开始时就被那么多、那么大的困难所干扰，以致我们有理由假定参加这些活动人都绞尽心力去完成他们的任务，再没有什么时间也没有有什么余力来记录所发生的事件了。

中国人本身对财富是那样的盼望，以至他们不能完全约束自己对贸易的渴求。国家资金收入和从贸易中私人企业所得的利益，大到连地方官也都很快地把猜疑心撇在一边。他们从未完全禁止贸易。事实上他们允许增加贸易，但不能太快，而且始终附有这样的条件：即贸易时期结束后，葡萄牙人就要带着他们全部的财物立即返回印度。这种交往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中国人的疑惧逐渐消失，于是他们把邻近岛屿的一块地方划给来访的商人作为一个贸

易点。

基督教所获得的崇高尊重，不仅建立在它教义的真理上和它的教士的圣洁生活上，而且有时也基于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例如，在传教书库的许多书籍中有两大卷教会法，有学识的中国人很称赞它们印刷精美和封面制作优良。封面是烫金的。中国人既读不懂这些书，也不知道它们讲的是什么，然而他们判断这两部书的不惜装订工本，内容必定很重要。再者，他们断定，科学和文化在欧洲必定很受重视；在这方面欧洲人既有这些书，所以必定不仅超别的国家，甚至也超过中国人自己。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证据，他们是决不会这样承认的。

原因分析 在讨论这个了不起的帝国的政府问题之前，简略地介绍一下中国人在文学和科学上所取得的进步以及他们所习惯的授予学位的性质，将是有益的。中国的政府的整个性质都与这些特殊的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的政府的形式与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不同。虽然帝国并不由知识阶级即“哲人”在进行管理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必须承认他们对帝国的统治者有着广泛的影响。

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为了使他们不必需学会那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

我认为中国语言含糊不清的性质，乃是因为自古以来他们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书面语的发展上，而不大关心口语。就是现在，他们的辩才也只见之于他们的写作而不在于口语，在这方面他们有点像以写作的辩才而在希腊人当中享有盛名的伊索格拉底(Isocrates)。结果有时候甚至是住在同一城市而且离得很近的朋友，也是书信往返，而不见面谈话。

中国人的饮料可能是酒或水或叫作茶的饮料，都是热饮，盛夏也是如此。这个习惯背后的想法似乎是它对肚子有好处，一般说来中国人比欧洲人寿命长，直到七八十岁仍然保持他们的体力。这种

习惯可能说明他们为什么从来不得胆石病，那在喜欢冷饮的西方人中是十分常见的。

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于是沙勿略决定必须尽早地访问中国，使中国人能从迷信之中皈依。做到了这一点，他就更容易争取日本人，并把福音从中国带给他们了。

在过去的岁月里，葡萄牙人曾渡过浩瀚无际的海域，使自己来到已知的极东地区，他们最后驻足于中国海滨。他们熟知这个国家的财富，想尽各种办法诱使它的百姓进行贸易交往。然而这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因为中国人远甚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民族，对外国人是猜疑的。自从他们失去整个国土并在鞑靼征服者的枷锁之下服役以来，这一点就对他们来得格外真实。葡萄牙船只的规模，他们的异乎寻常的装备，他们的大炮的轰鸣，都只能增加中国人内心的恐惧；而广东省的为数众多的回教徒也说服他们相信，他们的恐惧是有根据的。

确实，宣传一种新宗教特别使中国人反感，因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早已知道，在传布新宗教的借口之下，纠聚起一批反叛祸国的阴谋分子曾经造成了内乱和骚动。

宗教、政治、文化与科技思想

为了客观地分析利玛窦的思想，这里以他的《中国札记》为依据，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在今天看来，他的某些思想，尤其是宗教神学的观点应受到批判，这一点必须指出。

宗教观 利玛窦在临终弥留之际，还常常谈到教徒，谈到他正在修建的教堂，谈到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甚至还谈到使皇上皈

依。他说：“我为现在法国宫廷里的彼得·考顿神父(Peter Cotton)而深爱天主。虽然他不认识我,我还是决定今年要给他写信,祝贺他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做了那么多的事。我还要告诉他我们在中国努力做的事。现在是太晚了,不能写这封信了,我要问你们是否仁慈地愿意请求他原谅我。”

当太监马堂在临清拿走圣餐杯后,利玛窦坚持要回来。他告诉马堂,那是用来祭祀天和地的上帝的,基督徒们认为它是如此神圣,以至于除了经过特别的仪式就任圣职、可以献祭的人之外,没有人可以摸一摸它。

利玛窦对鄂本笃的牺牲精神较为赞赏,他在《中国札记》中记叙道:鄂本笃的朋友力图劝他回家。但鄂本笃拒绝了,说他从来还没有因为怕死就回避去履行应该服从的职责,现在在一次可以大大增添上帝光荣的使命上,就更不会如此。此外他坚持说,因为怕死,而毁灭很多人的希望,并浪费果阿主教和总督支援的钱财,那将是很不恰当的。在一直保佑着他成功的上帝的帮助下,他仍然希望完成这次探险,无论如何,他宁愿冒生命之危去进行这项伟大的事业,而不愿意从已进行的工作之中退却。

恩怨观 利玛窦认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并不以怨报怨;他的教义教导他说,如有必要,甚至要去帮助并救援那些伤害过他的人。抢劫的首犯被处死刑,其他的人按参与罪行的情况或罚充船奴,或发配皇家为奴。这些判决带给利玛窦无穷无尽的忧伤,他们确实感到,对当地公民加以这样的刑罚,外国人是很有惋惜的;再者,把这些人的家庭变成敌人,危险也不小;使河这一边的百姓得到一种另一边的人都是强盗的印象,也没有任何好处。此外,神父们随着被告从一个衙门到另一衙门,于教团也并无帮助。

幸福观 利玛窦认为:为人们设想的最大的幸福就是接受基督教。

正义观 中国有一项固定而古老的习惯,允许大臣不经过法律程序和审判,就可以随意鞭打任何人。有时候,被告给大臣一笔巨款,就可以买得活命。利玛窦认为这是违反法律和正义的。他还

在下面的记述中表达了他的正义观：

有一个信徒被诬告杀人和其他几项罪名。据说审理本案的法官接受了原告的钱和礼物的贿赂。被告的亲属看到其他的基督徒都来帮助他们的同胞信徒的那种方式，十分惊讶。贿赂对法官来说要比那人的清白无辜更有份量。结果是判决他有罪。在所有恢复正义的希望显然都已落空的情况下，看来似乎是天主决定了要求挽救他的忠实的信徒。

孝敬观 利玛窦宣称：按照神圣的律法，继上帝而后首先要敬拜的就是父母。

谎言观 利玛窦说：如果一个人要有德行，他就必须严格避免说谎话。基督的教义不仅禁止说伤害别人的谎言，而且禁止说那种奉承或玩笑的假话。这条戒律在欧洲是对人人都有效的，对信教的和那些教导别人的尤其如此；谎话和身居显要地位的人更应是水火不容。

牧师观 作为灵魂的牧师，最使利玛窦等伤心的莫如被迫把他们费尽心力挽救和培养的羊群丢给四周的狂暴狼群了。大群的新入教者像孩子给父母送葬那样哭哭啼啼地聚在神父身旁，这只有增加他们离别的哀伤。他们也悲泣地想到，他们正在把他们的宗教孩子丢下，没有老师来教导他们信仰的真理，也没有牧师供给他们圣礼的精神食粮。利玛窦对于牧师有很高的赞誉，他说牧师是上帝葡萄园中伟大劳动者。牧师的记录是上帝的奴仆为了争取完美而不懈奋斗的公开证据。利玛窦在记述传教上的生平和事迹中渗透了自己牧师观：石方西来自罗马近郊福尔萨(Forsa)教区修道院。他在童年就被送进罗马耶稣会学院求学，他在那里过着高尚有德的生活，是圣母会的成员。朋友和外国都高度评价他的精神品和他处事的老成涵养。

利玛窦在对传教士的赞誉之中，体现了他的牧师观。他记述道：孟三德，青年时候加入了耶稣会，多年以来直到老年，他的智力天才和其他方面的秉赋表明他是一个有学问的教授、一个卓越的宣教士，特别是作为一个宗教监督而受到国内外每一个人的爱戴。

鄂本笃是葡萄牙人，入耶稣会后不久就志愿参加莫卧儿传教团，被派到那里去。作为神父们的得力助手，他在那里工作了多年，按照耶稣会中他那个等级的规矩，教导阿拉伯人、异教徒和新入教者。由于他许多天赋的和学来的可贵品质，而受到人人的爱戴。

苏如望与世长辞时年仅 41 岁，为耶稣会极有价值地服务了 23 年。他被安置在南昌的驻地达 10 余年，在那里他以全部精力来传布基督教。他是个模范教士，被公认为是个非常圣洁的人。多年来他只身在异教徒中间工作，完成了许多事业，忍受过许多困难。有时候恶意的邻居使他的教堂陷入悲惨的困境，他本人也陷入危机，但他耐心地忍受这一切，除每年发给他的俸金而外从不多要钱。

有一位神父问利玛窦是否愿意告诉他们如何报答他们对他们的热爱。“那就是要对从欧洲来的神父始终关心和仁爱”，他说，“不仅像你平常的那种关心，而是要特别爱护，使他们从你们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他们在国内时从教友相聚中所得到的那种安慰。”

翻译观 翻译的标准是什么，利玛窦并未明说，但从下段记述中可知他们把“信”放在第一位。为了使权威的观念和上帝之名配合起来，传教士们不说上帝而总是使用天主这个称呼，意思是上天之主。他们难以找到一种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因为在中国语言中没有辅音 D，在他们看来选个特殊名称有一种庄严和神圣的意味。为扩大影响和理解得更清楚起见，还使用了其他几个名字。最常用的称呼有：万物的最高指导和万物的原动力。圣贞女被称作为光荣的圣母。如果不通过译员进行翻译，会因语言不通而变得很麻烦，那迫使传教士只能讲他们会说的东西，却说不出他们所要说的东西。

真理观 利玛窦像所有传教士一样，奉基督教义为真理，他说：基督教所获得的崇高尊重，不仅建立在它教义的真理上和它的教士的圣洁生活上，而且有时也基于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上。

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守人们达到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

基督教的真理。

中国人说过基督福音书中所包含的真理，受到感动而发生兴趣，想要接触它并向西方学习；这并不是超出可能范围以外的事。

中国人的领袖们不轻易改信新的宗教，但他们大都崇信真理，一旦知道了之后就毫不迟疑地加以公布。再者，他们说真理并不显露自己，而是通过宣讲它的人所过的修道生活才为人所知；同时中国人不仅是真理的热心探索者，也是圣经的热情崇拜者。

大家都知道了传教士到中国来是为传播基督信仰的；中国显贵们当中有些比较大胆的人毫不迟疑地探讨这些外国人教义中的真理。

到利玛窦这里来的学生，不仅教以文化而且还有基督教教义。他把十字架放在教室里，教学生们尊敬十字架；虽然他们并没有都成为信徒，至少他们学到了关于基督教主要真理的解说。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里，真理传播得越广，人们也就认为这个真理越发神圣。

不管佛教教义中可以有怎样的真理之光，但不幸却都被有害的谎言所混淆了。他们对天和地的观念以及说天地是惩恶奖善的地方等等，都是十分混乱的；他们无论在天上或地上，都从不寻求死者灵魂的永生。

民族观 利玛窦虽然有一种文化优越感，但在对待世界上其他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还是比较公正的，他多次赞誉中华民族；只要提一下在这些工艺中中国人的作法看来与我国工匠的作法最为不同的一些方面，就足以说明他们的多才多艺了。从房屋的风格和耐久性看，中国建筑在各方面都逊于欧洲。事实上，这两者中哪个更善一些，还很难说。在他们着手建造时，他们似乎是用人生一世的久暂来衡量事物的，是为自己盖房而不是为子孙后代。而欧洲人则遵循他们的文明的要求，似乎力求永世不朽。中国印刷工人刻木版的技术非常熟练，制作一个所花的时间不比我们一个印刷工人排版和做出必要校正所需的时间更多。这种刻制木版的办法极适合中国字既大又复杂的特点，但我不认为它能适用于我们欧洲

的字型,我们的字型太小很难刻在木头上。中国人在其他方面确实是很聪明,在天赋上一点也不低于世界上任何别的民族。在手工艺的实践中,中国人肯定地与所有别的民族都不相同;但是他们在其他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实践却与我们自己的十分相近,虽然他们与我们的文明相距很远。

自然观 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由上帝创造的。但从利玛窦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有一种唯物色彩。他说,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在单独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可以发现有这么多种的动植物。中国气候条件的广大幅度,可以生长种类繁多的蔬菜,有些最宜于生长在热带国度,有些则生长在北极区,还有的却生长在温带。花草之丰盛确实令人不能再有什么奢求了,中国人有很多种花是我们从不知道的,它深深打动人们的美感,并显示出造物者慷慨的恩赐。这里青山四面环绕,山上除天然美景外还有人工安排的果园,景色极其迷人。由于气候温和,寒暖适度,当地从来感觉不到冬季的严寒,山峦从不脱绿装。平原上盛产大米和其他蔬菜。格外有幸的是有一条常年不息的河流流过平地的中央,灌溉着该地区。韶州城坐落在两条通航的河流之间,两河既在此处汇合。一条流经南雄城的东面,另一条来自湖广省,从它西面流过。筑有围墙的城镇,连同它的许多屋舍,建立在两河中间的平原上。地势如此,所以城镇本身无法扩展,于是他们向两方跨河扩大居民区。西岸人口更稠密,有舟桥把它和岛镇连接起来。镇上大约有5000户人家。它那肥沃的土地盛产稻米和果树,肉、鱼、新鲜蔬菜也很充足,但气候不良,天气总是很坏。每年从8月中到12月,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居民都染上三期热症(瘴病或疟病),病势猛烈使很多人丧生。恢复过来的人也苍白憔悴,表明病情严重。这种气候对外国人比对当地人更危险,有些到这儿来作买卖的人几天之内就病死了。

科学观 在传教士眼里,基督教义比科学更为崇高,而在科学方面,他们将数学、天文学命之曰严肃、高尚的科学,而将炼金术等视为伪科学(邪术)。许胥臣曾很严肃地称赞科学研究,传教士王丰

肃则说：“先生，到目前为止你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比起信仰的奇迹来，全是微不足道的。信奉上帝是比观看星象更加崇高的科学；任何人都同意，在天上建立一个永恒的家要比观看上天、谈论天上更重要得多。”利玛窦与瞿太素之间每天交往的结果是使他放弃了这种邪术——炼金术，而把他的天才用于严肃的和高尚的科学研究。

生活观 利玛窦认为，与其荒唐放纵，虚度年华，不如学点知识。他说：在中国，以文为业的人们从小到老都要埋头学习他们的这些符号。毫无疑问这种钻研要花去大量的时间，那本来是可以用来获得更有用的知识的。不过就其可以减少年轻人不顾一切的、荒唐放纵的危险而言，尤其是对于那些大有闲暇而无所事事的人，那么即使是这样分散精力也有其好处。

理性观 利玛窦也崇尚理性，他认为中国的《四书》具有理性；《四书》汇编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教诫，但并没有特殊的编排。它主要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

友谊观 利玛窦比较重视友谊，他不仅撰有《交友论》，而且称赞中国文人之间的那种友谊。在中国科举考试的过程中，确实有某些值得称道的东西，那就是在同年的候选人之间发展起来的关系。那些在争取更高学位当中被命运带到了一起的人们，在此后的一生中都彼此以兄弟相待。他们之间相互有着和谐和同情，以各种可能的方法互相帮助，甚至惠及亲属。他们与主考官的情谊有如父子，或者有如师徒。即使有时候学生所享的荣誉会超过他以前的老师，他们依然对老师表示尊崇和敬意。

政体观 在西方有君主、贵族、民主、富豪等不同政体制度，但利玛窦比较赞赏君主制和贵族制。这从他对中国政体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中国的皇权是父传子或传给其他皇室近亲，和我们自己的一样。据说古代有两三位帝王把王位不是传给他们

认为不宜掌权的儿子,而是传给皇帝以外的继承人。然而,不止一次人民对无能的统治者感到厌恶,剥夺了他的权力,以某一个性格坚强和有勇气的人取而代之,从此以后他们就把他当作他们合法的君主。我们可以赞美中国人说,通常他们宁愿光荣赴死而不肯效忠于一个篡位的君主。事实上,他们的哲学家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格言:“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虽然我们曾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虽然所有由大臣制订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力,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

监察观 利玛窦极为欣赏中国的监察制度,他说:中国有两个我们的人民所未听说的等级。他们是科里和道里,各有60位以上经过挑选的哲学家,都是谨慎可靠的人,而且已显示不平凡的证明是忠于皇上和国家的。这两种官员是皇帝专门为处理朝廷及各省的重大事项而设立的,皇帝委以他们重大的责任,他们因此受到尊敬并有很大的权威。他们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因为他们在认为有需要时经常向皇上报告全国各地的违反事件。没有人逃得过他们的监视,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因为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但是他们如此之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钦佩,并且是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他们触怒皇上到了使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所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

名声观 利玛窦认为一个人的真正名声是来自他为社会所做的贡献。他说:实际上,那时在社会生活中很少有像赵可怀总督那样有声望的人。他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和对公共事务的卓越管理到处都受到极高的赞扬,这种名声经常归功于他对公共事务的处理,那是真正的,而一点不像通常的名气那样往往是虚假的。

梦观 利玛窦的梦观是神学梦观,上帝经常在梦中出现。有一

次利玛窦做了一个梦，梦见他遇到一个陌生的人向他说：“你就这样在这个庞大的国家中游，而想象着你能把那古老的宗教连根拔掉并代之以一种新宗教吗？”原来，自从他进入中国时起，他始终是把他的最终打算当作绝密加以保守的。所以他说道：“你必定要么是魔鬼，要么是上帝自己，才知道我从未向人吐露的秘密。”他听到回答说：“根本不是魔鬼，倒是上帝。”看来好像他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了，他跪在这个神秘的人的足下，含泪请求他：“主啊，既然你知道我的想法，为什么不在这困难的事业中助我一臂之力？”说完这话，他趴在地下哭，泣不成声。到最后他听见保证的话时才感到一阵安慰：“我将要在两座皇城向你启祥。”这和上帝曾在罗马答应帮助圣依纳爵的话完全一样。他仍在梦里，恍惚进了皇城，完全自由而安全，没有人反对他的到来。他醒来眼里噙着泪花，说了他的梦来安慰他的同伴，因为同伴也和他本人一样灰心丧气，也因为他真正以为其中有神灵。

利玛窦记载别人的梦也大都与上帝圣母等的出现有关。利氏记载：当利玛窦见到吕良佐时，他有点手足无措，半天没有说一句话。恢复了镇静之后，他说：“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就在昨晚我作梦看见了几个奇异的神，和我们庙里常见的不同。我深信这些外国教士就是我梦里见到的人。”然后他转向利玛窦，客客气气跟他说话；从这以后，每逢有事，他总是很慎重地处理他们在韶州的事情。

死前不几天，石方西和一位教友助手谈到坚持圣职的事，他说他听到圣母的声音对他说：“鼓起勇气，继续在我主耶稣的会中工作，坚守你的圣职。”他转身寻找声音的来源，就立刻看见了圣母的肖像。他自言自语说这件事，在他最后病重期间，他要求把一首赞美圣母的诗放在他的床上，使他好经常诵读。

徐光启于1600年在南京遇见利玛窦，跟他谈及过去所曾听说过一涉及基督教的梦。这仅是一次短暂的相会，因为徐光启正匆匆赶回家去，当时他可能只获知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万物的根本原理。然而，好像是上帝要保留这个人使他自我启明。圣三位一体的神异以某种方式在梦中呈现于他。他在一座庙里看见三间教

堂。在第一间里，他看见一个的形状，有人称他是圣父。第二间里，他看见另一人形，戴着皇冠，他听人称为圣子，他听见有一个声音叫他向这些形像礼拜。在第三间教堂里，他一无所见，也没有敬礼。可能上帝不愿把圣灵用我们常见的鸽子形状来显示给一个异教徒，免得触犯一个还是异端的人，因为中国人不管属于哪个教派，是决不礼拜任何神明的，除非神灵以人的形式呈现。后来，在南京当向他解释有关圣三位一体的教义时，他记起了这个梦，但没有说什么，因为另外一次他曾听一个神父说过我们不应相信梦境。再一次，后来很久在北京的时候，他听利玛窦说，上帝在过去把很多事情在梦中显现给他的仆人。这时他问神父可不可以相信一些梦，并且很兴奋地讲述刚才提到的梦。

魔鬼观 利玛窦站在基督教的立场，把异教的神统统斥为魔鬼，还说这些魔鬼是惧怕基督和基督徒的。利玛窦曾记述在肇庆传教时，在河的对岸，住着一个得了—种惊恐病的人，或者有魔鬼附体，晚上他就在坟墓四周游荡。他肯定是像一个鬼魅那样在行动。他的父母请来偶像教士，以解脱他这种邪魔和缠身的精灵，因此崇拜偶像的教士就尽量施展邪教的驱魔手法，在屋里挂满了怪模怪样的神像，这是他们习惯的仪式。但一个魔鬼并不能被另一个所赶走，这或许是天意注定要使基督教发扬光大。

利氏又记述：南京工部员外郎刘冠南听说利玛窦在找房子要奠定一个永久性的寓所，利玛窦对他说确有其事，于是客人就讲了一个真正惊人的故事。他说：“不久以前，我用公款为我的同僚们盖了一座官邸。房屋落成刚刚交付给他们，妖魔鬼怪就占据了它。谁在那里住，都要受到伤害。我想廉价卖掉它，可是找不到人肯和鬼怪住在一起。”他继续说：“你素有圣洁的名声。如果你不怕鬼的话，你可以买；不争价钱，悉听尊便。”利玛窦认为这是天主教在援手相助；他说：“我信奉唯一的天主，他掌管天地；魔鬼和万物都听命于他。”他接着解释说，他对神恩的信心保证他就连魔鬼也对他奈何不得，除非天主允许那样做。他还说，他有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圣像，魔鬼一见就要退避三舍；如果这座府邸适合他的需要，那他对那些

在府中作祟的魔鬼一点也不怕。在他们迁居的第一天夜里，神父们的主厅里建了一座神坛，并在坛前咏诵有关的祷告词，他们手持十字架，走遍整个建筑物，到处洒圣水。从那时起，由于神恩赞助在中国传播信仰，妖魔鬼怪们就再也没有出现了。管辖万物的天主当初之所以允许精灵们在这所房屋居住，是为了准备好这所房屋等候他的仆人们到来。他的仆人们来了以后，精灵们就被赶走了。

还有一回，一位教徒有一个邻居，他的妻子离家出走了，丈夫找到一个算命先生想问问她回不回来。她像那个算命先生所预言的那样回来了，但她的丈夫一看见她，就认为她被魔鬼附了体。她心神错乱并且发狂，已不是一个家中主妇而是仇敌了。于是丈夫采用了各种异教礼节来驱除恶鬼，但是毫无结果。这时，那位教徒进行了干预。首先他背诵了圣母的玫瑰经，然后以他全部的信仰，大声咒骂那个恶鬼胆敢进到离他家这么近的人家里来，而他家里供着基督受难的十字架的。然后，他朝着妇人划十字，用严厉的语言命令恶鬼走开。这时那个着了魔的人变得安静了，嘤嘤不休的恶鬼也安静了。

一个小女孩被鬼迷住了，鬼顽固地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她面前，企图使她放弃贞操的道路，有时候他会以一个商人或一个寺院长老的面目出现，一会儿是老头，一会儿又是青年，但总是引诱她犯可耻的罪，而且说只有小孩子的血才能使他满意。从异教的寺庙请来了法师，但是恶鬼只是嘲弄了他们的法术，一点也不害怕，而且还打翻了偶像、神坛上的灯和蜡烛。附近有一位基督教徒是个手工工人，他偶然听说了这件事，当他和几个异教徒谈话时，他向他们解释说上帝不但有能力管人而且也有能力管鬼。他们说“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帮那女孩子点忙？她是你的邻居。”他说：“当然可以。上帝有权力治鬼，如果他显示一下权力，鬼就会被轰走。”于是他们就一同去看望那女孩的父母，问他们愿意不愿意把她从折磨之下解救出来；如果他们愿意，那么他们就应该开始信奉真正的上帝。他们同意这样做，有一位世俗兄弟给他们拿来了基督像，教给他们呼唤耶稣的名字。他们把所有的偶像都从家里神坛上撤下来，而且全家

都开始接受一系列基督教教义的教诲。从那天起，他们家里就没有鬼怪的踪影了，虽然还听得到院子里有恐吓的叫声。在这里人领了洗时，他们的灾难就结束了。

一位年轻的新娘受到魔鬼的折磨，不能吃也不能睡，并且使她说各式各样难听的话。一位邻居新信徒就劝她祷告上帝，并且建议她入教。他同意了，刚一学会划十字的时刻，鬼就再也不来捣乱了，吃饭睡觉也没有任何困难了。后来她领了洗，成为这个地区的一个女教徒。

有一位信徒在领洗之前把所有的偶像都焚烧掉了；魔鬼就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报复他的焚烧。只要他想煮饭，米就不见了，光剩下一锅水，颜色黑得像墨一样。他来请教传教士，传教士给他一个十字架放在他家里，从此厨房里就不闹鬼了。

死亡观 从现代科学来看，不存在脱离肉体的灵魂。“人死如灯灭”，这在现代人思想中已是最普通的常识。但利玛窦认为基督徒死亡就是到天堂去见上帝，是一种永生。利玛窦这样描写中国第一个受洗的人。当他做了充分准备之后，他成为这个大帝国中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人。确实，好像是为了保持他的纯洁无辜，仁慈的上帝在他归信后仅仅几天就让他到天堂去见上帝了。

神父们作为宗教人士，是献身于服侍上帝的，认为自己对于现世已经是死了，并不在乎尘世上的死亡，只是把它当作通向一种更高生活的入门。例如：

就在对强盗们开庭审理的期间，1593年11月5日，石方西蒙召获得永生的酬奖。短短几天功夫他就因高烧而去世了。

范礼安在1606年1月底逝世。在过了69年的圣洁而勤劳的一生之后，他去接受给他的酬报了。

黄明沙修士被抬回监狱，中途死去。他去世时身边没有人照料，但很可能蒙上帝的恩佑进入天堂。他是在1605年3月的最后一天死去的，时辰正和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辰相同。他是一个养成了不停祷告习惯的人，人们很乐于相信他经历过这场使他致死的严酷的洗涤，已经立即就享受极乐世界之福了。

利玛窦在临终前的几个月中,曾好几次说:“亲爱的神父们,在我仔细想过我要努力确定做什么才能最后推进中国教会的工作时,我得出结论是对它的进展最有利的事莫过于我寿终之日到来。”他们都表示反对,并劝说为了这一目的,似乎他还必须再活若干年。他问他们反对的原因,并举出了他自己论断的各种理由,其中之一就是:他在天上将推进中国的传教工作,他在天上将更强烈地希望着并且更有力量可以这样做。

疾病观 利玛窦为了抬高天主的地位,为了让更多的人信仰基督教,便把疾病的形成说成鬼怪作用的结果,而病体的痊愈则是天主的功劳。他认为有些疾病用药物是可以治疗好的,而有的病必须得到上帝的治疗才能痊愈,利玛窦记载了多种事例。

麦安东害了一场重病,确实是那样危险,以致利玛窦决定把他送往澳门,好让副主教兄弟们加以照顾。他希望那里的欧洲医药和食品,会使他迅速康复。

病人的父亲听一名新信徒说,欧洲教士的布道对这类鬼怪十分有效。他请来一位神父,要求他为他那已无痊愈之望的儿子做点好事。被请去的神父迟迟不肯相信病人真被恶魔缠身,所以他没有采取教会的驱魔法。相反地,他叫他们取下所有挂在墙上的凶神像,付之一炬。然后他背诵几句祈祷文并把一个装有圣骨的小匣子挂在病人脖子上,便走开了。他刚一离开屋子,这人就似乎解脱了痛苦,完全痊愈了。

有一个姓梁的小官吏,婚后多年无子女,但渴望着有一后人,便听从一个神父的话,为此而向上帝作热诚的祈祷。他的祈祷及时被听到了,他成为一对孪生男孩子的父亲。

两名传教士患了严重的疾病,得不到供养,也没有人给予痊愈的必需的帮助。他们都在等死,一心想念着他们工作的目的和目标。这时候,完全意想不到,为保存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靠上帝的神圣旨意,除上天而外别无他助,他们双双恢复了健康。

在南京城外,有一个全身患病躺了整整六年的人。传教士罗如望碰巧在附近拜访几个新信徒,病人派人找他,声称愿意成为一个

教徒。神父赶到了他身旁，在离开时留给他一本基督教教义纲要。病人学习它，接受教诲，最后受了洗。超度的圣水既涤清了他的灵魂，也涤清了他的肉体，他逐渐痊愈了。该城区没有人不把他的康复看作是某种奇迹。

在教会驻地旁边住着一家异教徒，有一天这家的父亲把他刚出生的婴儿送出领洗。他把孩子放在圣坛上，给他洒了圣水，取名如望。不久之后，这家人从这里搬走了，以为这孩子已经入了基督教。七年之后，那父亲又带着孩子来到教会驻地，感谢上帝奇迹般地让这孩子出乎意外地由重病恢复了健康。这孩子一度昏迷不醒人事，他们已经认为他回生无望；他后来告诉他们，这时他觉得自己看到圣母向他走来，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他的名字叫了几次，他好像是从梦中醒来，从那一刻起他就痊愈了而且很强健。家里的仆人没有一个丝毫怀疑，那孩子所看到的妇女就是他们自己常在教会驻地所看到过图像里的那一个；而那孩子也证实了他们的信念。当有人给他看两种圣母像时，他就指出据说是福音书作者圣路加所给的那幅原像的复制品。

洒圣水也可以治病。某村有一个妇女得了病，就请教士用圣水来为她祈福使她重新有希望活下去。教士和那个妇女所希望的事情实现了。在祝福她之后，她的身体和灵魂都恢复了健康。

十字架同样可治病。有一个新信徒和他的儿子同时生了一种间歇性发烧的病。他请郭居静给他一个十字架，当十字架被拿进他的房里时，他们立刻就痊愈了。

徐光启有一个仆人突然生了病，传教士郭居静去看他，给他上了一堂教诲课，从他一领洗起他就很快康复起来。几天之内，他就能起床活动，完全恢复了健康。有很多异教徒瞻仰十字架并答应愿意成为基督徒，他们身上的病痛就都好了。

一位做父亲的得了病，一天夜里他觉得自己看见了上帝，他的儿子是习惯于在上帝面前祷告的。他觉得自己听到上帝说：“我乐于帮助你。”从那时起他的体力就开始恢复。

有一天，弥格从学校回家，被雷火击昏了或者是吓昏了，躺在

路上失去了知觉。他醒来时，在他躺在地上时他看见了很多天使簇拥着上帝说“现在我要饶他的命。”他被送回家，休息了一阵之后，他请校长到他家来；校长来了，给他诵读了“我们的父”和“福哉玛利亚”，这孩子就完全恢复了健康。

一个信徒，由于极度抑郁而得了很危险的病。他请求一位神父听他忏悔，他告诉神父说他看到过一位庄严的女人，全身缟素，怀抱着一个婴儿。在教堂里没有一张像和他所看到的景色相符，但他说他确信那是圣母和他的孩子耶稣，他还说那位女人说“这个人的病可以用发汗的办法治疗，我希望把他治好。”他接受了这种治疗，几乎立刻出了死亡的大门，很快就恢复了。

上帝观 利玛窦在一篇短文中说：只有一个上帝，他创造了和治理着万物。所以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和调节者。

对欧洲人的批评

在利玛窦之前或同时，欧洲流传着不少关于中国的传闻，利玛窦采用一种审视的态度对待它们，对其中不实的地方，予以了批评。但不一定都批评得正确。

中国幅员 虽然这个国家确实幅员辽阔，但它从南到北的长度却远比我们同时代作家们一般所说它的距离要短几乎三分之一，这些作家们照例把北部边界定在略高于北纬 53 度的地方。

公立学院 与我们某些作者所说的情况相反，这里并没有教授或讲解这几部书（《四书》、《五经》）的学校或公立学院。每个学生都选择自己的老师，在家里自费向他学习。

府、州、县 在这里似乎应该适时说明和纠正一下某些文章中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错误，那就是，因为地方长官和他的官府用了他们所在地的那个城市的名称，例如说在南昌城整个地区和地方长官和他的官府就叫做南昌府；所以有些作者就得出结论说，这个名称就只限于这几个与府相关的城市，其他城市则叫做州或县，即镇或乡。这是一个十分错误的观念，因为府这个词尾不是由城市大小

或人口多少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行政的方法。事实上，全地区首长所住的那个城市本身仍被称为县，它可以有自己的主管官，叫做知县；知县也像在别的城市一样有他的几名助理。这个地方官在这个特定城市里的权力并不比他在他那个地区的其他地来得更大。但是法律允许由知州或知县审理的案件向上级上诉时第一次就上诉到他这里。

势力扩张 这一论断似乎与一些作者就这个帝国的最初创立所作的论断有某些关系，他们断言中国人不仅征服了邻国而且把势力扩张到远及印度。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 4000 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正相反，我常常就这一论断问中国博学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答复始终如一，即情形不是这样的，而且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姑不论作出这种错误记载的作者声誉如何，错误之所以出现很可能是因为曾发现有中国人到过中国国境以外的证明。例如，人们可以引证菲律宾群岛，中国人曾打入那里的私人企业，但不是官方正式委派的。

契丹 看来很显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是在鞑靼人占领时期来到这个国家的。他甚至可能是和鞑靼人来的，根据他解说，中华帝国是以鞑靼人所用名称而为欧洲所知，鞑靼人称中国为 Cafai，称首都为 Cambalu。神父们从这些阿拉伯人身上肯定了中华帝国就是他们所知的契丹，皇都就是他们的汗八里，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国家是他们所知道的契丹了。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父们早就寄书给印度和欧洲，建议那里的人修改他们的地图，这些地图上是把契丹置于中国北部长城之外的。如果这与马可波罗所说的汗八里城中的无数桥梁有矛盾的话，或许这座都城现在比他那时要小一些，但即使现在，人们还会在都城里数出上万座桥；有些是河上雄伟壮观的桥，有些是溪流、湖泊上的桥和那些隐匿在四散的街衢中间的小运河上的桥。

学中文 我们这里有意要谈到这个问题，从而使后代可以知道懂得中文会得到多大好处，并使读到本书的欧洲人可以明白神

父们对中国民族的天分感兴趣是很有道理的。

文化优越感

利玛窦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他认为欧洲文化在诸多方面超过中国，欧洲人（当然也包括他们传教士）比中国人更有学识，一旦他们被中国人所认识，中国人便会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书中记述道：

神父们并不满足于欧洲的知识，正在夜以继日地钻研中国学术典籍。事实上，他们以高薪聘请了一位有声望的中国学者，住在他们家里当老师，而他们的书库有着丰富的中国书籍的收藏。有教养的中国人肯定认为这些欧洲人是富有理论和学识的名望的。

中国人断定，科学和文化在欧洲必定很受重视；在这方面欧洲人既有这些书，所以必定不仅超过别的国家，也超过中国人自己。

中国官员发现欧洲教士在学术和文化比他想象的更为先进，所以决定赐给他们一种中国人很重视的恩宠。

所修教堂本身很小，但很中看。中国人一看到它就感到很惬意，这是座欧洲式的建筑物，和他们自己的不同，因为它多出一层楼并有砖饰，也因为它的美丽的轮廓有整齐的窗户排列作为修饰。房屋的地点和安置也增添了它的美丽。那是当地出名的美景又加以欧洲新奇的装束，每个人都想一开眼界。

所有这些的影响以及神父们始终是得体的谈话和议论，看来使中国人逐渐对欧洲形成一个总的好印象。中国人发觉，欧洲的科学从根本上比他们的更坚实，而且总的说来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直到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这样他们终于开始明白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真正区别。

传教士带来的书，尽管是用中国人所不懂得的语言印的，却大受称羨，因为书的装订不同寻常，而且镀金美观，在中国完全是新东西。把附有描绘性地图的书或者用图表和草图说明的建筑模型

拿给他们看时，他们都感到高兴和惊诧。整个国家连同城市、宫殿、高塔、拱门、桥梁、教堂等等在一本书中一览无遗，这种概念他们简直惊奇不已。他们对能够目睹这些分散那么广而彼此相距那么远的光辉事物，而且能够在自己家里饱览它们，真是惊叹不已。

中国人也羡慕欧洲的乐器，他们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结构的新颖。

五、天主教组织与利玛窦的传教策略

宗教组织

利玛窦来华传教,不是个人行为。他是一名耶稣会士,受耶稣会的派遣和领导;而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个派别,直属教皇领导。因此,要想比较清楚地了解利玛窦来华的所作所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组织。

1. 教皇

基督教有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派别。天主教有一位至高无上的领导,那就是教皇(亦称教宗),教内大事均由教皇管理,他具有绝对权威,如果获得他的授权,在教内可以畅通无阻。如第一次来华的耶稣会士沙勿略想组团进入中国内地而受到马六甲总督阿尔瓦列斯的阻拦,虽经多方调解、劝说仍无效,沙勿略不得不使用最后一招。他行使他作为教皇使节的正式职权,并有权把任何顽固阻挠他进行传教活动的人逐出教门。

中国不是教宗国,也不信奉基督教,耶稣会士一心想在中国传教,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的居留得到中国皇帝认可,这就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得不到,那就既没有把握也不能持久。最可行的方法是由一位传教士安排一个教皇使节去见中国皇帝,有了教皇的信件为凭,再带着礼物,或许能够取得在中国永久居留的权利。

教皇派出的视察员,必须经常汇报工作,有时候视察员得写几封信,致教皇的、致天主教国王的、致耶稣会会长的,还有致他认为可能促进事业发展的其他人的。

2. 葡萄牙国王

公元4世纪末,罗马皇帝立基督教为国教。后来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逐渐使教会团体遍布欧洲、西亚和北非,基督教也成为许多国家的国教。取得国教地位后,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权利越来越大。许多国家的国王也得听从教皇或与教皇合作,如葡萄牙和西班牙。葡萄牙国王在一封信中说,他派沙勿略到印度去,是要他向整个东方传播福音。

由于葡萄牙传教士尼古拉·皮门塔的请求,葡萄牙国王给他的总督阿里亚斯·撒尔达格纳(Arias Saldagha)下令,命他用金钱和他的努力支持视察员所提议的工作。他就这样做了,而且很慷慨,因为他忠于耶稣会。

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受托返回欧洲,请求教皇遣使到中国见皇帝,西班牙国王毅然使用他的权力,和教皇一道促进这次遣使,同意亲自对中国的事业给予及时的援助。在罗马,由于两三位教皇的相继去世,整个事情被大大推迟了,结果是罗明坚操劳过度心力交瘁。

3. 耶稣会

天主教有多种修会:隐修会(如本笃会)、托钵修会(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斯定会 and 加尔默罗会)和耶稣会等。耶稣会于1534年创于巴黎,1540年经教皇正式批准。该会仿效军队编制,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总会长为终身制。利玛窦时代会长为阿瓜维瓦。

天主教实行教阶制,基本为神职教阶和治权教阶两类。神职教阶含大品三级:主教、司铎、助祭;小品四级:侍从、驱魔、诵读、司门。治权教阶以教皇居首,以下是枢机主教、宗主教、牧首主教、省区大主教、都主教、大主教、教区主教等。

意大利的耶稣会士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o)被耶稣会会长委派为整个印度传教团的视察员。他从欧洲动身,先视察了恒河以近的地区,然后,他来到恒河以远的地区,后又抵澳门,去日

本。当耶稣会上进入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传教点后,耶稣会迅速宣布举行庆祝会应在规定的条件下举行。会长致函教团,表示他的关切和爱护。范礼安认为利玛窦关于尽快努力开辟另一个驻地的请求非常合理,一一予以批准,并且亲自负责把每项请求都详细报告给会长,也报告给教皇。后来,范礼安奉会长之命,不再负责印度的教团,而以教会视察员的名义,仅仅管理日本和中国的教团。

视察员范礼安特别向新监督建议,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一个居留点;在他看来,除非有某个人被皇帝欣然接待,否则长期居留在中国就没有任何保证。范礼安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想在他的工作结束之前看到中国传教团是建立在尽可能巩固的基础之上。他当前的计划是到中国此地出巡一次,访问各个传教中心,亲自看看他从收到的信中所读到的一切。

正在进行这一切的准备的时候,而且当传教团的神父们准备热烈欢迎他的时候,他病倒了,这场病很快就结束了他的生命,也结束了他的希望。他在1606年1月底逝世。他的逝世对于日本的和中国的传教团都是一个打击。他是前者的发起人,是后者的奠基人。在利玛窦那时以后,又发生了同样的事,另一位教廷视察员巴范济于1612年逝世,也是正在他准备要去访问中国教团的时候。

中国传教事务由澳门神学院具体管理。院长换几届,他们先后是:

卡普莱勒 澳门神学院院长卡普莱勒写信给肇庆的神父们,劝他们以不致损害他们自身传教事业的方式来办事情。解除了某些顾虑后,卡普莱勒决定访问肇庆的驻地,以便把第一手的消息向印度耶稣会视察员和在罗马的耶稣会会长报告。

孟三德 范礼安指定孟三德为澳门神学院院长,因为他非常熟悉中国教团的事情,当时教团是在澳门监督的管辖之下。而且,他是最宜于管理、宜于选出接济和促进中国事业的人选。

李玛诺 李玛诺(Emanuele Dias)曾几度任印度传教团的监察,他具有管理本会的必需品质,对中国特别有兴趣,视察员任命他为澳门神学院院长,该院被认为是日本和中国两大传教团的共

同进修院。在经济窘迫情况下,李玛诺挺身而出,大发善心,也可说是对支持中国传教会显示了他慷慨仁慈的精神。他处处筹节钱财,最后凑足了款项,使大家得以度过难关。他还再添上了一些给他的朋友人们。

卡尔瓦罗 耶稣会视察员任命卡尔瓦罗(Valentine Carvalho)神父为澳门神学院院长,接替前院长李玛诺。

4. 在中国内陆的传教组织

中国传教使团 “伟大的希望” 第一次组建中国传教团是从沙勿略开始的。沙勿略遇到一位老朋友叫作迪埃郭·皮来拉(Diego Pereira),他是一个富有的、勤勉的商人,也是一个有经验的航海家,沙勿略把他想到中国去并拜访皇帝的计划告诉了皮来拉,并且规划了他想加以实现的方式:返回印度为果阿的总督和主教组织一个赴中国朝廷的使团。那时他本人就能附属于这个使团,并且一旦他获准进入中国,参见皇帝之后,他就可以向中国人宣传福音了;如获允许的话,就公开传道,否则就秘密进行。皮来拉对这次冒险很热心,并认为使团如果携带些礼品,将会是有帮助的,他把他的船以及财货都交给了沙勿略使用,还送给沙勿略三万金币,派一名仆人陪他到果阿。在皮来拉的帮助下,他们组织了一支赴中国的使团,而作为这个使团的一员,沙勿略将有办法进入严密封锁的中国。使团按计划组成,因为皮来拉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并同情沙勿略的意见,他就被任命为使团的团长。这次组团因原马六甲总督的阻挠、沙勿略的去世而宣告失败。

第二次组团是从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来到澳门开始的。这一次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尤以利玛窦的工作为代表。中国传教团正式名称叫做“伟大的希望”。

耶稣圣名团 范礼安在赴罗马途中,借在澳门停留等待驶往印度的时机,抓紧时间促进中国传教的事务。他在耶稣会的居留地创立了一个团体,叫做耶稣圣名团,制定的规则特别适用于入教者的精神发展。为了促进它前进,这个团体只为中国人、日本人以及

其他国家的新入教者而设,但它的迅速进展使它在该地产生巨大的精神作用。根据他的荐举,这个兄弟会团体由一位受命到中国来传教的传教士负责,在这职位上,他不仅照料他们的精神需要,也照料他们改善生活。

传教团监督 范礼安认为传教团监督应当是一个一直在中国内地生活和亲身在场的人。澳门神学院院长孟三德已经老了,不能要求他去中国内地。在那些深入中国大陆人之中,利玛窦年龄最大,对中国人最有经验,因为他曾长期在他们当中居留。因此,利玛窦被任命为整个传教团监督,由他断定对传教会有益与否,他有全权指挥教团并在最有成功希望的地方开辟一个新中心,作为监督他有同教务视察员相同的权力。

为了保证中间教会在行政管理上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公认对中国事务最有经验的利玛窦就被置于负责的位置,作为不受澳门神学院院长管辖的一个传教团。

在中国传教团四处驻地工作的几名神父,人手不足,难以胜任工作。教团监督利玛窦必须留在皇城中,距其他几处驻地十分遥远;既然他无法访问这些中心,有关教团的许多问题必然不能决定。苏如望在南昌病倒,病势逐渐沉重,因此李玛诺奉命巡视南方的三个教堂,这次巡视是在教团监督利玛窦的管辖下进行的,没有他的同意就不能作出决定。视察结束后,李玛诺和苏如望一起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李玛诺在北京呆了两月,其间他和利玛窦为整个教团拟定了详细的计划。他在那里又到南方的各个驻地。

庞迪我曾代理监督,熊三拔(Father Sabatine de Ursis)则负责内部事务。在中国传教团内还分为多个支部。

利玛窦与葡萄牙

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是受葡萄牙国王支持,作为耶稣会的一员,利玛窦与葡萄牙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他在书中大量记述了葡

萄牙与中国的贸易及其对传教士来东方传教的支持。

葡国与中国的贸易 葡萄牙最乐于装船的大宗商品莫过于中国丝绸了，他们把丝绸运到日本和印度。全国上下都不得与外国人打交道，除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例如澳门半岛，在那里从1557年起建立了一个与葡萄牙人通商的商场。在澳门城兴建以前，上川岛是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贸易地点。上川是一个离中国海岸约30海里的荒芜岛屿。当时它是葡萄牙人和中国人贸易点的所在，只有一片用树枝和稻草胡乱搭成的茅屋。

葡萄牙人曾渡过浩瀚无际的海滨，来到极东地区，他们最后驻足于中国海滨。他们熟知中国的财富，想尽多种办法诱使它的百姓进行贸易交往。一葡萄牙船只的规模、他们的异乎寻常的装备，他们的大炮的轰鸣，都只能增加中国人内心的恐怕，而广东省的回教徒说服他们相信的恐惧是有根据的。

葡萄牙人首先抵达中国南方的海岸，那里的居民把他们叫做佛朗机，他们听说，欧洲人以贸易为借口，征服了马六甲和印度。因此一当接到葡萄牙使节的申请时，他们马上禁止葡萄牙使节入境；但他们本身对财富是那样的盼望，以致他们不能完全约束自己对贸易的渴求。事实上他们允许增加贸易，但不能太快，而且始终附有条件；即贸易时期结束后，葡萄牙人就要带着他们全部的财物立即返回印度。这种交往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中国人的疑惧逐渐消失，于是他们把邻近岛屿的一块地方划给来访的商人作为一个贸易点。这个地方叫澳门，在阿妈湾内。与其说它是个半岛，还不如说它是块突出的岩石；但它很快不仅有葡萄牙人居住，而且还有来自附近海岸的各种人聚集；都忙于跟从欧洲、印度和摩鹿加群岛运来的各色商品进行交易。迅速发财的愿望引诱中国商人到这个岛上来居住，于是在几年之中这个贸易点开始出现了城市规模。当葡萄牙人和中国人通婚时，修建了许多房屋，不久那块岩石地点就发展成一个可观的港口和著名的市场。航海追求财富的愿望，把这些海上商人带到这个已知世界的边缘。

葡萄牙商人已经有了一年举行两次大宗贸易的习惯，一次是

在一月，展销从印度来的船只所携来的货物，另一次是在六月末，销售从日本运来的商品。这些市集不再像从前那样在澳门港或半岛上举行，而是在省城举行。由于官员的特别允许，葡萄牙人获准溯河而上至广东省省会作两天旅行。这种公开市场的时间一般规定为两个月，但常常加以延长。

广东人大受葡萄牙人到来的骚扰，特别因为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而变得格外严重，而某些有势力的商人则从葡萄牙商人那里得到很大的好处。人们抱怨说对外贸易抬高了所有商品的价钱，由此得利的只是洋人。为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

菲律宾群岛有大量银子，那是每年从新西班牙和秘鲁省送来的，但是葡萄牙人估计，如果这笔钱用来购买广东省的中国货物，那就会破坏贸易市场，以后葡萄牙人就不得不用更高的价格购买这些货物，并被迫用低价把它们在海外售出。

让西班牙获得遣使中国皇帝之荣乃是不合时宜的。这一荣誉应属于葡萄牙人，当有关与中国贸易的问题提了出来在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国王之间作出决定时，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早就把它判归葡萄牙人了。尽管这两个王国现在是同在一位国王之下，天主教国王仍然愿意两国各自进行自己的事，禁止一国干涉另一国的权利和过去的特权。

澳门的葡萄牙殖民地政府负责人要求对澳门停止粮食禁运，特别是因为海盗有可能利用他们没有保护的情况而发动进攻。他们说任何人指控他们阴谋叛乱都是无法置信的，他们已在这里平平安安地居住了这么多年，而且正在这时候由于三年多来一直没有给养船从印度到来，城市已经沦于贫困而且几乎人口绝迹。

中国许多小孩被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带出国外为奴。这类少数人至少有成为基督徒的机会，因而摆脱撒旦的奴役。这种买卖小孩的做法唯一的好处就是，大批必须劳苦终日汗流满面才能勉强度悲惨生活的极端贫困的人可以减少。

葡国与东方传教 沙勿略亲自带着葡萄牙国王的信去见马六

甲总督,国王在信中说,他派沙勿略到印度去,是要他向整个东方传播福音。阿尔瓦列斯·特伊蒂阿公开被控犯有种种罪行,并由于藐视果阿总督的职权而被逮捕,被定为叛逆罪,带着铐链被送往果阿,又从那里转送葡萄牙在国王面前受审。一个葡萄牙人发现沙勿略躺在旷野上,发着高烧,并且为他可怜的状况而感动,所以就把病人送到自己的小屋,在自己的贫困所允许的范围内照顾他。沙勿略根本就没有食物,只有葡萄牙海员带来的一点杏仁。

随着葡萄牙商人,罗明坚决定动身去进行他自己的那种与中国人的交易。他特别留心的是,他或许可能遇到某一位官员,可以被劝说允许他在他那个省份内居住。刚在不久之前有一位陪同葡萄牙商人的传教士在市集上给他们做弥撒,感化了当地和尚的一名信徒,并把他携回澳门。罗明坚的诚实和有学识的名声有助于发展这种友谊,他被认为是葡萄牙人中间的一名教士,并且是一名不断攻读中国文献的教师这一事实,更加增进了友谊。每当他随葡萄牙同伴去拜会海道时,他就由主人之命,被安置在一旁,免除他叩拜之礼。后来在专用的馆邸中还给他留了一个住处。在礼拜日和节日,葡萄牙人到他隐居的地方去作弥撒,接受圣礼。

当新入教者的人数开始增加时,虔诚的葡萄牙人的捐赠,使得神父们能够创立一所学校。它建在教学后面的一座山上,叫做圣马丁的圣乐堂。在这里,罗明坚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教导当地人,这并不干扰主要居住所的秩序,后者主要是供葡萄牙人进行精神修行之用的。

传教士们为照顾葡萄牙人的需要,要尽许多责任,以致罗明坚神父必须分担一部分;这样一来,就要牺牲他很多学习中文的时间。

澳门有个葡萄牙商人名叫维嘉斯(Guspar Viegas),他施舍钱财和创造钱财一样有名。从一开始他就对这次远征很有兴趣,即使殖民地处在最困难的境况也不愿放弃它。他的捐赠足够准备全部所需之用。为了公正地评价维嘉斯,当正式谈到他和远征的关系时还应该提到他在果阿兴建了修道院并捐赠给它一笔手金。他死前

不久要求参加耶稣会，他的请求得到批准。

罗明坚抵达澳门时，他发现该城实际是荒凉的，正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和金融的挫折。为当地全部繁荣所依赖的商人，尚未从日本返回，葡萄牙人担心着他们的商船不平凡的拖延，而修道院直迄当时还没有固定的岁入。

期望已久的商船从日本驶进澳门港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这就结束了罗明坚神父缺钱用的窘境，葡萄牙人慷慨施舍使他得到大量支援。政府和其他好心的人给教会送来了钱和各种礼物，足以偿还债务，完成建筑，充分添置家俱。

当葡萄牙商人获允进入广州时，大市集正在进行，于是再也忍耐不下的麦安东便随他们一起前来，看看他能否为在中国居留找到什么办法。

葡萄牙商船队一般在八月份抵达澳门，旅客中有几位耶稣会士是被派赴当地的团体或赴日本传教的。利玛窦奉召也从印度和他们一起到来，以便协助该项工作。

王洋有位兄弟，携带大量盛产于浙江省的丝绸和其他各种衣料到广州的市集来。他原打算把衣料卖完，马上回家，但因得不到他所定的价钱，他在广州停留的时间不得不比原定的更长。最后，葡萄牙商人按他的要价购下了他的货物，只要是有助于宗教事业，葡萄牙人从不吝惜花钱，或者怕所得减少。

河上经常满布成队的船只，很便于传教士半年一度的广州之行，他们必需一年两次到那里去领取澳门神学院发给教团的财政津贴。进行这种旅行是在葡萄牙商人获允运货赶集的时候。同时，他们便从遥远的欧洲各地推来了邮件和礼物。

肇庆的教团对澳门也是一大帮助。从澳门前来跟总督商谈的葡萄牙人，在进行业多交易时常常得到传教士们的支援。他们不止一次地救助沉船的欧洲人，有时也救援从澳门逃亡的奴隶。每年都有一些奴隶挣脱了奴役的枷锁，到中国人中间去寻求自由。这些逃亡者一般都被军事长官拘捕，这批人比正规士兵更勇敢、更善于使用武器，因为他们跟葡萄牙人有联系。

有几个在北京朝廷的官员写信给王洋，要他向葡萄牙商人购买紫色绸缎送到北京去。地方官员选择了利玛窦而不是选择中国商人，去跟葡萄牙商人进行这笔贸易；他很受他们的欢迎，在他们当中很有威望。他到达澳门时举行了欢迎仪式，因为百姓知道他和他的同伴们完成了什么功绩以及他们遭到过艰辛的考验。

中国和日本两个传教会有一个代理人，或称司库。他管理天主教国王捐赠的补助和其他人捐赠的救济金。澳门的葡萄牙人对这两个传教会经常给予慷慨捐赠的。

葡萄牙国王原先命令付给教团的津贴，常常由于国家的需要而挪作他用。

一艘已经装好货物并准备驶往日本的班轮，被出没在海上的荷兰海盗俘获并洗劫一空。这次惊人的损失使澳门全城深受震动。澳门的希望和富足全装载在这些船只上。全城几乎没有人不受此次不幸的触动，而由于供应日本传教团的全部物资都已装上了船，东面的耶稣会士们所受损失更属罕见。

在澳门遭受的经济损失太大而又太频繁，以致耶稣会的视察员神父虽然很乐于、但却很难以把北京这个中心置于一个巩固的财政基础之上。

对葡人的评价 利玛窦说：葡萄牙人孟三德(Eduardo Sande)是个老成持重并且有其他可贵品质的人。他的助手葡萄牙人麦安东(Antonio Almeida)是个年轻人，有才能和品德，虔诚而热心于拯救灵魂。葡萄牙人麦蒂(Fernando Martinez)被视为圣人，特别热衷于在中国的布道，从不失掉一个机会去协助传教士们在上帝的那个葡萄牙园里工作。麦安东是葡萄牙人，生于法郎哥撒(Francosa)，仅活了35岁，大半生都在耶稣会中度过。从望道期起他就是虔诚和德行的典范，他圣洁的声名凡他所驻的地方都四处传播。李玛诺(Emanuele Dias)曾几度任印度传教团的监察，他具有管理本会的必需品质，对中国特别有兴趣，所以视察员任命他为澳门神学院院长，该院被认为是日本和中国两大传教团的共同进修院。

来源于葡萄牙人的知识 中国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是

葡萄牙人起的。葡萄牙人在大规模海上探险之后到达这个王国，并且直到今天仍在东南部的广东省进行贸易。交趾人和暹罗人都称中国为 Cin，从他们那里葡萄牙人学会了称这个帝国为 China。葡萄牙人把这个国家的名声传遍全欧洲。

植物 有一种水果叫做中国无花果，很甜很好吃，葡萄牙人叫它 Sucusina。这种特殊的水果只有制成干果后才能吃，因此葡萄牙人又叫它无花果。但它与真正的无花果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很像大波斯苹果，只不过它是红色的，没有软茸毛和核。中国人有一种木头要远比橡木耐用，这是一种很硬而不会朽烂的木头，颜色很像铁，因而葡萄牙人称之为铁木。中国生长一种普通的芦苇类植物，葡萄牙人称之为竹，形状像圆柱体，几乎坚硬如铁。它长成以后，用双手也难以握过来；虽然竹是空心的，而且像是一节节接起来的，但它的茎节和接合处却很有劲，所以常常被用作小房子的支柱。

药材 在中国可以找到葡萄牙人叫作中国木而别人则叫作圣木的那种能治多种病的著名的药。它不用栽种，野生在荒地上，只要花点采撷它所必需的人工钱就能买到，但却以高价出口。

漆 一种值得详细记述的东西是一种特殊的树脂，是从某种树干挤出来的，它的外观和奶一样，但粘度和胶差不多。中国人用这种东西制备一种山达脂或颜料，他们称之为漆，葡萄牙人则叫作 Ciaco。

职官 葡萄牙人称中国官员为 Mandarin，可能是由 Mandando 或 Mando Mandare 而来，即指挥或命令，欧洲都知道中国官吏的这个头衔。

地名 中国人把省城叫做广州，但葡萄牙人弄混了省的名字，也叫它广东。因为澳门港是在郭应聘的管辖之下，他就再致函葡萄牙人称之为 Ansam 即中文的香山知县。有座都城叫做南京，但葡萄牙人是从福建省居民那里得知这座神奇城市的名字的，所以把该城叫做 Lankin；因为该省的人总把“N”读成是“L”。

利玛窦所读中国书

利玛窦的住地里展示有图画、钟表、玻璃器皿等新奇的东西。特别藏有欧洲的和中国的书籍。工余之暇，在译员的帮助下，神父们博览中国书籍，极有收获。

四书五经 利玛窦认为中国圣哲之师的孔子，把更古的哲学家的著作汇编成四部书，他自己又撰写了五部。他给这五部书题名为“经”，内容包括过正当生活的伦理原则，指导政治行为的教诫、习俗、古人的榜样、他们的礼仪和祭祀以及甚至他们诗歌的样品和其他这类的题材。在这五部书之外，还有一部汇编了这位大哲学家和他的弟子们的教诫，但并没有特殊的编排。它主要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他还认为：四书五经为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别的书都是由其中发展出来的。

礼书 关于中国的丧礼，有一厚本专书。当有人死去时，负责丧事的生存者就查阅这本书以保证遵循正当的仪式并确有相称的排场。这本书不仅包含上述的习俗，而且对于遗体的衣服、鞋帽、腰带和其他服饰都有专门的说明。

编年史(正史) 利玛窦说他在中华帝国的编年史上，发现早在基督出生前 2636 年就提到织绸工艺，这种工艺知识从中华帝国传到亚洲其他地方、传到欧洲，甚至传到非洲。利玛窦还读到，中国在一个时候称为唐，意思是广阔；另一时候则称为虞，意思是宁静，还有夏，等于西方“伟大”这个词。后来它又称为商，这个字表示壮丽。以后则称为周，也就是完美；还有汉，那意思是银河。在多个时期，还有过很多别的称号。利玛窦曾说：说到中国的版图，各个时代的作家们都在它的名字之前冠以一个“大”字，这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就其领土漫长的伸延和边界而言，它超过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合在一起，并且，在以往所有的时候里，它都是超过它们的。正如编年史所载，因为前朝统治者的家族和亲属由于旷日持久的内讧已被

剥夺了皇族的特权，又因为政府的管制已发生重大变化，朱元璋便规定此后皇族一律不得担任文武官职。中国古代编年史中还记载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位皇帝也醉心于寻求长生不老，而在力求长生不老的时候却给自己的寿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位古代皇帝按照某些骗子的处方为自己配制了一付秘药，认为只要把它一喝下去，就可以使他免于死亡。就在他要喝药的时候，他的顾问们忠言相谏已不能阻止他实现他的既定方针。

政书 有一次会晤博得了总督的欢心，这位大官拿出一包书送给利玛窦，作为友好的表示。这些书包括总督剿平海寇和其他叛乱的战争史。另一位总督刘继文送给利玛窦几本他写的书。利玛窦还记述：有五六大本全国政府官员花名册，刊载有两等中的每一个大臣的名字。这种花名册在全国都有出售。它们在不断修订，在皇都北京每月订正两次，由于印刷是用特制的活版，修订并不困难。全书内容只包括整个政府各部官员的姓名、地址和品级。利玛窦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一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作的决定。受到惩罚的人绝不是少数或低级官员。在1607年举行的那次普查之后，还看到对四千名官员作出了判决；之所以说“看到”，是因为所涉及的人的名单刊为单行本发行全国。

黄历 皇家的占星术家每年要编撰两本黄历，由官方公开发行。这种历书大量出售，每家都有一本。除这种正规的历书外，还有其他许多同类的书，内容更复杂。

地志 利玛窦在一本撰于1579年、题为《中华帝国概述》（即《广舆图》）的中文书里发现这一段话：“在中华帝国有两个王室直隶区——南京即南部省和北京即北部省。除此两省外，还有十三个省份。这十五个省份”——“都很可以称为王国”——“进一步分为一百五十八个区或小省份，中国人称之为府，大多数府包括有十二至十五个大城市，还有小一些的城镇、城寨、乡村和田地。在这些区域中，有二百四十七个大城市被定名为州，虽然它们大部分与其他大城市的区别更在于它们的尊严和重要性，而不在于大小。还有一千一百五十二个普通城市，被称为县。”中国人自己在他们的地理书

籍中详细叙述了各省的富饶及其物产种类。中国还有指南，上面列出城里的每个地区、街道和集市。

户籍册 人民当中普遍都有一种手写的户籍册，里面包括按街、按户记载城中每一家的情况。

天文历法书 中国人把天空分成几个星座，其方式与西方所采用的有所不同。中国的星数比西方天文学家的计算整整多 400 个，因为中国把很多并非经常可以看到的弱星也包括在内。阿拉伯人留给中国的大部分是一些规则的表格，中国人用作标准日历并按表格归纳他们对行星以及一般天体运动的计算。

档案 传教士们对照中国档案中月亮盈亏的数据并特别研究天体图来检验他们的结果，在中国档案中对新月和满月都有精确的描述。

佛经 利玛窦认为他还不清楚为什么日本佛教徒断言释迦或阿弥陀佛是由暹罗王国传入日本的，并且说此教源出于暹罗。佛教徒的著作中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国人非常熟悉暹罗，绝不会在这类问题上把它误为遥远的天竺。利玛窦读到，佛教最初出现时很受人欢迎，主要是因为它宣扬灵魂不朽和来世的幸福。佛教的书籍无论是由西方传入的或是在中国编撰的，都一直在增多，成为维持它广泛流行的热情之燃料；看来它似乎是不大可能消灭的。由于这类著作的种类和数目繁多，结果是在它里面学说和荒谬无稽混杂在一起，即使是号称信教的人也不能解释清楚。

道教书 利玛窦记述：据说老子出生之前的怀胎期曾长达 80 年，因此叫他作老子，即老人哲学家。他没有留下阐述他的学说的著作，而且好像他也没有想要建立独立的新教派。然而在他死后，某些叫做道士的教士把他称作他们那个教派的首领，并且从其他宗教汇编了各种书籍和注疏，都是用很华美的文体写成的。道教的书籍叙说着各种胡言乱语，只举一个例就可以使人明白其余的都是什么样子。目前有极大量炼丹术类的书籍在流行，讨论炼银、炼丹的学问，有些是印本，有些则是手稿，但是人们更愿意得到手稿，因为手稿更有权威性。

传教策略

利玛窦在华传教，有一系列的策略，这些策略有的来自他的前任，但更多的是他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而制定的。

寻找共同点 传教士们一直努力强调如下事实：基督的教旨完全符合良心的内在光明。早在偶像出现前多少世纪，中国最早期的学者由于同样的良心之光在他们的著述中已经触及这个同样的基督教教义。他们自己并不抹杀自然法则，而是给它补充所缺少的东西，即那个使自身成为人的上帝所教导的超自然的东西。这一切似乎是更多地受到喝采而不是赞同。培养对基督教世界的友好态度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神父们所写的一切东西上都习惯加上一些简短的道德箴言。中国人喜欢这个习惯，往往收集这些警句，写在自己的扇子上，或抄在纸上，从而可以贴在墙上阅读。《天主实义》里包含摘自古代中国作家的一些合用的引语，这些段落并非仅仅作为装饰，而是用以促使读别的中文书籍的好奇读者接受这部作品。传教士们习惯于利用儒教的权威，他们只评论孔子时代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争取赢得博学之名 传教士努力赢得博学的声誉，他们认为这不是一种虚荣，而是着眼于到这里来的目标，即促进基督教的事业。所以在一切场合他们都有意地把这点交织在谈话之中。因为中国人不轻易改信新的宗教，但他们大都崇信真理，一旦知道了之后就毫不迟疑地加以公布。他们说真理并不显露自己，而是通过宣讲它的人所过的修道生活才为人所知；同时中国人不仅是真理的热心探索者，也是圣德的热情崇拜者。

展示学识 为努力赢得前来访问传教士的当地许多居民，利玛窦要向他们解答一些数学问题，有时他为他们拼制日晷作为消遣并向他们表演它是怎样计时的。对所有的人有求必应，为的是争取他们都皈依基督。利玛窦经常表演他非凡的记忆力，他还写了一份记忆训练法的说明即《西国记法》，用事物和地点作为揭示，这份

说明后来传遍了全国。利玛窦用对中国人来说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整个中国哲学界,以充分的逻辑的推理证明它的新颖的真理。传教士有关科学知识的叙述,都成为未来丰收的种子,也成为中国新生教会的基础。

满足好奇心 小心翼翼地满足中国人的好奇心;因为他们生来就敌视外人,传教士们就对他们极尽殷勤,行事时力求赢得他们的好感和友谊。称之为无价宝石的玻璃三棱镜,凡是要看的都让看,还有书籍、圣母像和其他的欧洲产品,都由于新奇而被认为是漂亮非凡。

展示实物 在利玛窦所建教堂接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全图。有学识的中国人啧啧称羨它;当他们得知它是整个世界的全图和说明时,他们很愿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标注的同样的图。他们要求能够加以研读,以便作出更好的判断。因此王洋跟利玛窦商量,表示要请他在译员的帮助下,把他的地图译为中文,并向他保证这件工作会使他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大家的赞许。

投其所好 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中国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西方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利玛窦因此不得不改变他的设计,他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这更符合中国人的想法,使得他们十分高兴而且满意。

建西式教堂 房屋本身很小,但很中看。中国人一看它就感到很惬意;这是座欧洲式的建筑物,来访的高官络绎不绝,其中不仅有来自本城的,还有从其他省份来见总督的官员。这不仅无损于教会的名声,而且有助于帮助中国人逐步增加对基督教理解的愿望。

制作仪器 利玛窦用铜和铁制作天球仪和地球仪,用以表明天文并指出地球的形状。他还在家里绘制日晷或者把日晷刻在铜版上,把它们送给各个官员,包括总督在内。当把这些不同的器械展览出来,把它们的目的解说清楚,指出太阳的位置、星球的轨道

和地球的中心位置,这时它们的设计者和制作者就被看成是世界上的大天文学家。

写浅近的书藉 在中国,读书人很容易相信他们闲暇时所读的东西,而不太相信一位还不精通他们的语言的传教士所说的东西。他们为书藉所吸引,并把他们在书中所发现的思想在私人交谈中传播开来。由于这种普遍的习惯,有时候就会有某个人在家里读了一本书,碰到一些有关基督教的段落,他记住了,以后又讲给他的亲友们听。这一点使传教士们很感兴趣,成为他们用中文写作的一种鼓励。任何以中文写成的书藉可以进入全国的 15 个省份。而且,日本人、朝鲜人、交趾支那的居民、琉球人以及甚至其他国家的人,都能阅读中文,也能看懂这些书。传教士把他们的思想以文字形式传达给别的国家的人民,尽管之间不能面对面讲话。传教士们在家庭教师的帮助下,用适合百姓水平的文体,写了一部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书。其中驳斥了偶像崇拜,所发挥的主要论点引自自然法则的例证,容易被人接受。王泮特别喜爱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印了许多册,在国内广为流传。因此,基督教的原则传播到各地,进入了多年努力尚未渗入的各个地方。用这个方法,基督教信仰的要义通过文字比通过口头更容易得到传播,因为中国人好读有任何新内容的书,也因为用象形文字所表达的中国著作具有特殊的力量而且表现力巨大。用中文写成的论友谊的短文《交友论》,为人们阅读和称羨,并受到读过它的人的推荐。就在它付印后不久,赣州有一位知县完全用中文把它加以重印,流传于各省,包括北京和浙江。它受到知识阶层的赞许,并被权威作家所引用。事实上,在一个短时期之内,这部书被当作标准读物为人们所接受。利玛窦就各种道德问题和控制灵魂的罪恶倾向的问题写过 25 篇短文——《二十五箴言》。这些都是中国人称为议论和箴言的小册子。他的一些中国朋友在发表以前就阅读过它并衷心表示赞许。传教士的第一本基督教教义概要《天主教要》是在他们还没有经验时依靠翻译人员的帮助而写成的。在他们更好地锻炼了心智和眼光之后,已觉这本书过于简略而不相宜,因此利玛窦就对它进行了修

订、补充和重新编辑。这个新版本(《天主实义》)更加充分地阐述了基督教的教义。这样就铺平并扫清了道路,使人们可以接受那些有赖于信仰天主的知识的奥秘了。利玛窦的另一本书,他称之为悖论即《畸人十篇》,书中包含的道德训诫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书的大部分是连续不断的评论,它采用的是一种以对死亡的反复沉思作为维持人生正当秩序的方法。这本书谈到很多不同的题目,例如:把生命看作是一个不断在死去的过程;赏善惩恶并不常常是在今生完全实现而必须等到来世;沉默寡言是难能的但又是有用的;每个人都应该检查自己的行为并约束自己不可行为不端。在不同的论辩中插进去的各种悖论,也使这本书增加了不少权威,因为它们谈到利玛窦和一些最显赫的大臣所曾详尽讨论过的各种问题。为了使它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传教士们到处散发这本书并且用它作为礼品。他们有些友人把刻印匠派到教会驻地来复制此书,以便他们分赠友人。第一次印行一年之内就发行一空,第二年又印了两版;一次是在南京皇都,另一次是在江西省会南昌。

许胥臣说他乐于仔细阅读一下基督教的戒律。然后又给了他最近刚刚补入教义问答的四篇论文:一篇论上帝,另一篇论灵魂不朽,第三篇论原罪,第四篇论基督。他的事例证明了传教士长期经验所得到的体会,即书籍比口头论证更容易说服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律法。

利用音乐知识 宫廷乐师请传教士教他们演奏古翼琴,这架古琴是由传教士进献给皇宫的礼物。庞迪我从一个偶然的学徒成为精通这种乐器的人,他每天去皇宫给他们上音乐课。庞迪我不仅会演奏,而且还会和弦。两个较年轻的学生在学习上颇有才能,他们很有兴趣为他们演奏的乐曲配上中文歌词,于是利玛窦利用这个机会编导了八支歌曲,他称之为“古琴之歌”即《西琴曲意》八章。这些歌曲都是涉及伦理题材,教导着道德品行的抒情诗,并引用基督教作家的话加以说明。这些歌曲非常受人欢迎,许多文人学士都要求传教士送给他们歌曲的抄本,并高度赞扬歌中所教导的内容。他们说,这些歌曲提醒皇帝应该以歌曲中提到的品德来治理国

家。为了满足对歌曲抄本的需求，传教士们把它们连同其它一些曲子用欧洲文学和汉字印刷成一本歌曲集。

利用地图 对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候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他们关心基督教。利玛窦应王洋之请，从事地图绘制工作。新图的比例比原图大，从而留有更多的地方去写中国字。还加上了新的注释，这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也更适合作者的意图。当描叙各国不同的宗教仪式时，他乘机加进有关中国人当时尚不知道的基督教的神迹的叙述。希望在短时期内用这种方法把基督教的名声传遍整个中国。这幅地图被经常加以校订、改进和重印，进入了总督衙门，进入皇宫，大受称赞。传教士们在短期内又将《坤輿万国全图》另制一版，而且他们乐于这样做，因为这提供一个他们一直在寻求的机会去宣扬基督教。关于在地图上刻印的违反偶像崇拜的东西，有人抱有怀疑，另一些人则受不了它们说的有关基督教信仰原则的话。传教士们则希望可能到时候皇帝或他的某一个继承人在观看地图和阅读上面的解说时，会有意询问一下基督教的信仰。

利用科学 王丰肃发现许胥臣对于宗教有一种轻视，不喜欢谈论永恒的得救，所以他就用他所喜欢的东西——数学来吸引他。王丰肃叫人替他做了一个天球仪和一个地球仪，在上面加上了适当的注释。这大大增进了他们的友谊和相互的尊敬。有一天，许胥臣很严肃地称赞科学研究，王丰肃就说：“先生，到目前为止你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比起信仰的奇迹来，全是微不足道的。信奉上帝是比观看星象更加崇高的科学；任何人都会同意，在天上建立一个永恒的家要比观看上天、谈论天上重要得多。”

不追求物质利益 传教士认为，聪明的作法是不要屈从于做官的权力而损害传教自由。他们拒绝接受赐予，不使基督教蒙受贪婪之嫌。从一开始就让百姓知道，传教者并不为他们的宗教追求物质利益。这也使他们可以方便进入官府，因为官员们知道，欧洲教士到来时，他们不是为了寻求恩赏，这和一般跟官吏拉关系的人情形不同。因此，无言表率的作法，以行代言，对传播基督教的名声更为灵验。在交换住所这件事上，利玛窦决定不接受总督的任何东

西；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所出的价钱，而为的是保留将来有一天可以恢复驻地的行动权。随后事态的发展证明，这个为保存或者不如说为恢复整个事业的决定是高明的。如果要求新入教的人捐献经费的话，预料要比向非教徒请求更容易得多。但是这样会使非教徒产生一种印象，教会的人在欧洲老家时都很穷，他们来到富饶的中国就是为了骗中国人的钱。所以，传教士不收新入教者任何钱财。

宽大为怀 传教士们认为：他们必须跟所有的人都友好而不冒犯任何人。他们必须不仅不威胁或埋怨，而且反倒要求大家的宽恕。传教士们尽量让百姓得知基督的宽仁的观念，它不仅不寻求报复，反而要加以避免。传教士们不因为受辱而寻报复，当那些袭击传教士的人已经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传教士却为他们请求减刑。

遵纪守法 如果传教士们很不明智地和别的外国人卷进违反帝国法律的事，那是很容易导致损害的。利玛窦的意见是，暂时必须按所颁发的命令行事，遵照总督之命，要么把他们的住所搬到指定的庙里去，要么搬到别的地方。这样他们就不会激怒总督，而如果他们还没有完全失去他的好感，那就仍有希望权且在别处获得一个适当的居留地。这至少可以提供机会再回来教诲新入教的人，并且也许还有希望往后再恢复自己的驻地。

隐藏意图 中国海军将领问罗明坚、利玛窦到来的原因。他们回答：他们是宗教团体的成员，为慕中华帝国之名，离开本土，远涉重洋。他们想留在这里度过余年，他们只需要有一小块地方，建筑房屋以及一座礼拜天主的教堂。他们不会成为别人的负担，将以本国人民的损献来养活自己。他俩认为：不论在申请书中，还是以别的方式，一开始传教时都不能提到基督教，不然可能妨碍他们留在中国之内。为了使一种新宗教的出现在中国人中间不致引起怀疑，传教士们开始在群众中出现时，并不公开谈论宗教的事。在表示敬意和问候并殷勤地接待访问者之余，他们就把时间用于研习中国语言、书法和人们的风俗习惯。他们努力用一种更直接的方法即以身作则，试图赢得人们的好感，并且逐步地不用装模作样而使他们的思想能接受不是用语言所能使他们相信的东西，但又不危及已

取得的成果。利玛窦向黄时雨说,他和他的同伴八年前远渡两万英里海洋,从欧洲前来。他本人是献身于宗教、发愿贫困守身的人,唯一职务是为至高无上的神明服务。在这整个时期内他都小心翼翼地不伤害任何人,严格遵守国家的法纪。

利玛窦在南京与人刚交往时,将有关到南京来传播基督教的事,或有关到中国其他地方去传播基督教的意图隐藏了起来。为了进入北京的事情顺利进行,传教士们向王忠铭保证,他们所希望于皇帝的没有别的,只不过是他的友好,并且他们愿付这笔旅费,遵守必须注意的事项,做出一切必要的准备。太监田尔耕以皇帝的名义庄重地接待了利玛窦一行。他想知道他们进呈礼物给皇帝的目的。传教士们告诉他说,他们是来自泰西的外国人,是崇拜天地主宰者的敬神者,对世俗货不感兴趣,既不要求也不期望回赠礼物,也不期待任何报酬。传教士们问太监们是否可以转告皇帝,他们自己的宏愿就是住在北京并死在北京,除此之外他们别无所求。

走上层路线 如果传教士们的居留得到皇帝认可,传教工作就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得不到,它就既没有把握也不能持久。对进行这件事的各种方法经过长期考虑之后,最可行的方法是由一位传教士安排一个教皇使节去见中国皇帝。用这种遣使的方法,有教皇的信件为凭,带着礼物,传教士们或许能够取得在中国永久居留的权利。传教士们已和中国官员发展了友谊,他们完全确信:除非他们能邀宠于皇帝,否则南京或其它地方取得的进展就会终归化为乌有。传教士要保证他们自己决不再被迫离开北京,甚至可能获得宣讲基督教的自由,他们必须征得礼部官员们的关怀。他们所花费劳动的成果要取决于搞好与当权者的关系,因为这些人有权批准启人疑窦的一桩事业。肇庆长官王泮采用送匾这种特别的方式来荣宠他给予保护和支援的那些人,他知道百姓会照他的榜样对待他的好友的。这两块匾大大提高了传教士们在各阶层百姓中的声望。第一块匾(仙花寺),进入外室时都要读到它,另一块(西来净土)则在进入内厅时读到。因此没有人在离开那里时会不注意到传教士极受当地高官礼敬的事实。官员们和知识分子的多次访

间,把传教士的名声传到肇庆境外,甚至传遍广东和广西两省的边界直到它开始名闻全国。全省做官的不断被召到肇庆这个中心点来商讨公务,当他们每三年改官时,那些对传教士有所认识的人,立刻把它传到他们任职的四面八方。这样就逐渐地而又不知不觉地为那些后来在中国其他地方传教的人开辟了道路。

南昌城里文坛的领袖常在文艺聚会中确解法律的原义。然而,这些通常是在轻视别人的宿儒们,却极谦恭地去拜访利玛窦,非常高兴倾听他娴熟地谈中国的典籍,然后并引用中国的权威来证明他所说的话。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利氏的声望。利玛窦经常出席有学问的阶层的各种集会,他们经常向他提一些有关欧洲的问题,他就把欧洲基督世界的各种风俗和宗教习惯……向他们介绍。皈依者不仅有来自下层的,也有来自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其中一个姓郭,和当今皇后的姊妹结了婚。皇帝御医的两个儿子也信了教,其中一个已进入了士大夫的最高层。有一名教师,他是刑部尚书肖大亨的亲戚,和他一起入教的还有这位尚书的侄子,是得到他叔父的同意才入教的。传教士们对他们未来寄予高度的希望。

利玛窦的朋友徐光启为《几何原本》写了一篇序和一篇跋,他的声望大大提高了这本书的权威。这样杰出人物的赞扬也有助于提高基督教的声誉。徐光启在其中颂扬基督教的原则说,他不仅赞同它们而且已经接受它们成为了教徒。纯粹由于缺乏信心,徐光启不想尝试升官考试,但他在传教士们和教徒们的请求之下让步了,他们提醒他,取得更高的荣誉将增进基督教的利益。他运气很好,成绩公布时他取得了第四名,因而提高了他个人的声誉,也使教会大为高兴。这一年是全国的主管长官三年一度来到北京向皇上致敬的年份,在他们被允许留在京城的期间,大街小巷拥挤不堪,以致难以通行。传教士们在这里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与来自其它他们没有居留点的城市的地方长官和无数的商人们进行接触,借以提高北京教会声望,像一棵树使各地教会在它那树荫下得到庇护。

为了使范礼安和郭居静到内地去旅行的保证加倍地可靠,传教士要求好几位大臣写证明信,这些信都是通过徐光启的及时帮

助而得到的。他们的朋友把整个路线安排得非常好，全部的旅行费用都由国家开支。他们走水路时有一艘官船供他们使用；走陆路时，则备有三匹马和六台轿。黄明沙修士最先使用了这些信，他到广东省去接回几位传教士，靠着这几封信不但不用花旅费，而且只要拿出信来，连吃饭都有供应，不必花钱。

名人效应 传教士们在瞿太素身上没有白费时间，欧洲的信仰和科学始终是他所谈论的和崇拜的对象。在韶州和他浪迹的任何地方，他无休无止地赞扬和评论欧洲的事物。传教士们对于接受一位特别的教徒或许要比增加任何一个别人更为高兴。这是一个做铜和别的金属生意的富商，他已经 82 岁了，当他决定入教时就和他的全部镀金的铜制神像和有关佛教教义的珍贵藏书都交给了神父。他受教诲，领了洗，取名为费边。不平常的人物许胥臣的皈依以及信徒李之藻的范例，对基督教团体中其余的人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们是激励着别的基督徒仿效他们自己的中国领袖，这两位领袖已成为道德和虔敬的典范。在圣诞节的晚上，李之藻和别的信徒们一起祈祷和反省，倾诉自己内心，忏悔过去，身上没有一点表示自己崇高地位的尊严的痕迹，对大家有十分明显的影响。

礼尚往来 每当中国儒生们前来拜访传教士时，他们总是按规矩行礼致敬，并且他们的访问因奉献礼物而使人印象加深。这些赠品一般都回报以欧洲礼物，儒生们很感谢地接受下来，认为比自己的更贵重，因为这类礼物新奇而增高其价值。中国人送礼是常情，不大好拒不接受，但传教士们总是用欧洲珍品作为回报，以免留下他们是为了报酬而传教的印象。一位医生有一份利玛窦送给他的欧洲珍礼，因为它稀奇，所以他拿它来招惹他朋友们的好奇心。江西巡抚陆万垓的医生非常感激利玛窦，因为收了他很多礼物，以致他总是向到他家来的官员们谈起利玛窦。这一切的结果是，当总督对利玛窦的友谊四下传开时，城里有声望的人都迫不及待地认为应当对利玛窦作友好的拜访。在南昌，一当房子买了下来，利玛窦马上去拜访城里所有的官员，送给他们一些薄礼，那些都是从澳门带给他的东西里挑出来的。分送这些礼物时，他小心

翼翼地不开这样的先例；即不适当地多送，或者超过他将来可能馈赠的力量。利玛窦正式回访时送给漕运总督刘心同一些欧洲饰物，这些东西制作新奇。

争取同情 当内地官员要将罗明坚等遣回澳门时，他们详述他们怎样远涉重洋到中国来，怎样花费巨资在这里住了若干年并没有损害任何人，他们申明他们不能定居在澳门，而且要他们跨海返回故里也是办不到的。然后他们向官员重提他们初到时官员如何对他们表示同情和支持。

委曲求全 当一些村民冲进驻地使用暴力时，利玛窦向他们抗议，请求他们把想要的东西都拿走，但不要把一切都捣毁。然而当他出面跟他们交谈时，他遭到一阵石头的袭击，真有生命的危险。他急中生智，捡起一捆围篱剩下来的竹杆，扛在肩上，挤进稠密的人群当中，请求他们收下这捆竹杆去修复破堤，如果他们高兴还可以再给，但不要再狂暴地破坏房屋。不信教者被他的姿态所感动，他们停止扔石头并走开了，没有拿走什么东西。

巧用中国官场规矩 当利玛窦等被逐出肇庆时，他问官员可否签署一份文件，证明他们不是因为犯了罪被驱逐出中国，而且在居留期间他们过的是宗教憩静的生活。这份文件的作用在于打消那些需要知道真相的人所产生的遭到驱逐的想法。

不激众怒 有一些天主教信徒偷偷到寺庙里去打烂佛像的手足，利玛窦听见这些，警告他们别这样干。他知道要是一旦被发现了，就会惹起一场真正的骚乱。

摸透中国官员心理 当他们为得到住宅而请求官员给予必要的许可之后，传教士们觉得最好就是再也不闻不问。他们认为这也许是正确的判断，采取这种办法比较稳当。他们推想，如果将来因教团而产生任何麻烦，那么颁发保险文件的人就会因为害怕而最迫切地要把教团送走。利玛窦担心的是由于容许产生麻烦的境况存在，祸乱会降临他的家门。此外，官员们不为此颁发文件，倒容易保护教团，这在肇庆曾屡见不鲜。再者，倘若传教士们过于坚持要得到文件，他们还会引起一种最终可能造成精神恐惧的疑虑。还

有另外的其他方面,在中国生活了若干年之后,看来老老实实像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那样行事,要比外国人更平安。在向中国皇帝致敬时,人们通常都要祝愿他“万岁”,皇后和皇子们的称呼要低一级,人们只祝愿他们“千岁”。利玛窦不想这样祝愿皇宫总管,因为他不想表现得尊重太监有胜于尊重最高的大臣,以免开罪于后者;利玛窦从经验中知道,在与中国人和其他东方异教徒打交道时,不可省去某些礼节。这一次,他小心翼翼地遵守了通常的晋见仪式。在最初晋见时,利玛窦按照习俗主动地祝愿主人千岁。老人听到这种祝愿,十分高兴,会见结束时就将一件厚礼送给利玛窦。

尽量不直接交锋 一次,利玛窦接到一位佛教徒的请帖,邀他去赴宴。中国人习惯于在宴席上辩论他们的分歧意见。为了不致危害传教事业的发展,利玛窦就推诿说他很忙,谢绝这次邀请。但是,邀请者却不接受这些借口,相反地,他在瞿太素的建议下,几次派人来,执意要请利玛窦前往,以至利玛窦认为不能再加以拒绝,否则就显得太失礼貌了。于是他去赴宴,充分准备进行一场辩论。

不失时机 传教士意识到,最好抓紧时机,免得官员们的善意会冷却下来,或者出现某种意外的阻挠。利玛窦的讲道和文章,对中国的信徒和许多异教徒起了作用,使他们认为教皇是个应该极受尊敬和崇拜的人物,是从世界范围内的一大批教士中选出来担任这个最崇高的职务的。他在解说表示罗马城的地图时,也常常乘机介绍宗教制度。皇帝希望知道欧洲帝王的穿戴,这就给了传教士们一个机会来解释耶稣基督是什么人;他的名字受到基督教王侯们的崇敬,他就是掌管天地以及地狱的那个人,中国皇帝对他的名字也应当毫不犹豫地表示崇敬。冯应京在城里的时间,几乎每一分钟都被来客占满了,可是利玛窦仍然追随他,向他讲授教义,最后送他离去,毫不担心也没有想到随后而来的不幸。

利用官场矛盾 当太监马堂的党羽得知利玛窦一行被礼部卫队关押这一情况后,马上赶到队长那里,拧断了锁,严辞威胁那些卫兵,把他们都给吓坏了,主要是害怕他告他们对外国人使用武力并抢了他们一些物品。他提到要领传教士们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

方去,告诉他们不要理睬管理使臣事务的官员。利玛窦拒绝接受这一邀请,尽管太监告诉他说他们还受到皇上权威的保护,而且正在被召进宫。然后,他们同意第二天到负责使臣事务的公堂去。后来,对利玛窦一行进行开庭审问,审问的范围包括严讯为什么利玛窦目无礼部法纪,竟然违法利用太监向皇上进呈礼物。利玛窦对这一指控是胸有成竹的,声称他比起太监来并没有更多的过错,他是在太监的压力之下这样作的。并说既然最高的官员都抵抗不住他们的威力,外国人顶不住它也就不足为怪了。他申述他至今一直都是按圣旨在皇宫中工作的,而且从他到达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想要到公庭来,但此事为太监们的监视所阻。

控制节奏 传教士们在北京小心谨慎,开始传教时有意地放慢,怕的是基督教这件新鲜事物会引起怀疑并妨碍他们眼前要建立一居留地的目标。这一目标一旦完成,他们已完全地定居下来,就再没有理由拖延了。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放在推进他们来此的最终目的上。

因势利导 一次特殊的迫害把基督教的名声传布到四面八方,大家都知道传教士们有意要传播迫害的消息。很多人因此好奇地想了解这个新宗教,他们来听布道,尽管他们并没有都接受它,绝大多数都表示了赞许。在新年开始时,中国人把神像放在家宅大门上,所以基督徒们也在他们的门上放一个写着耶稣和玛利亚名字的牌位作为信仰的一种宣告,表明他们家宅的守护神。这也向来访者标出他们的基督徒兄弟住在哪里,并使他们宽慰地知道在遵守民族习俗方面他们自己一点也不比别人差。

集中力量 因为传教士太少,无法在较小城市维持传教点。上海的传教中心。他们正准备在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开辟一个居留点,杭州离上海也只有三天路程,他们可以从那里照料新开辟的地区。传教士们的意见是,他们在国内较大的城市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减少误会 传教士把圣母像从圣坛上取下来换上救世主基督像的原因,一是中国人认为天主教把一个女人当作神来崇拜的;二

是他们可以更容易地接受成为圣体的耶稣的教义。中国人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无数的海陆地带,这就减轻了传教士到来所造成的恐惧。如果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这一距离遥远的地理事实,就会有助于排除在全国传布天主教的巨大障碍。传教士们认为没有什么比疑心更能妨碍他们工作的了。

多建据点 传教士曾奉教会视察员之命要尽可能开创新的教堂;这样,若是有更多的教士能进入中国,便不会引起那么多的猜疑。如果发生什么事可能迫使关闭一所教堂,也不会使整个布道事业都告结束。为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立足点已进行了长期努力,如果毁后重建,那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一段时间以后,传教士就计划要在另一地区开设一座教堂,以便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这会有助于更牢靠地在中国居留,整个传教事业的成功也就不会依赖单独的一个定居点。利玛窦尽快努力开辟另一个驻地。其理由如下:首先,韶州气候不良,短时间内使使教团付出了两个生命的代价;这会增强教团的安全,如果一处驻地遇到了灾难的话,整个传教事业的成功也会危险较小。

入乡随俗 总督坐在大堂的椅子上,他威风凛凛,使人生畏。按照谒见大官的规矩,利玛窦老远就叩了两次头,这时总督叫他靠近他的宝座。为避免指责,为了防止官员们在室内举行宴会,这所在韶州的房屋是按中国式样设计和建造的,只有一层楼。为了能应付各类人,使灵魂皈依基督,传教士们采用了取一个所谓尊名的习惯;如果他们要在一个不懂得基督教的、谦卑的、不信教的民族中维持威望,那么这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作法。从此以后,所有传教士到中国去之前都要取一个尊名,使它看来好像是传教士们早已有的名字。

利玛窦对视察员说,如果他们留胡子并蓄长发,会对基督教有好处的,那样他们就不会被误认为是和尚。他还说,经验告诉他,传教士们应该像高度有教养的中国人那样装束打扮,应该有一件在拜访官员时穿的绸袍,在中国人看来,没有它,一个人就不配和官员、甚至和一个有教养的阶层的人平起平坐。中国上层害怕跟那些

穿着不合本国风俗的人交往而有失礼仪和高尚风度,因而不能把传教士当作同侪来对待,这有一半也是传教士的过错,当教士到官员的衙门去时,他们遵守来访的知识分子的礼节而与老百姓的礼节不同,这本身又使得官员们在访问教团时也同样有礼。根据利玛窦对中国官员们的长期经验,他已经懂得,和他们交往,要是忽视了拜访习惯上所必需的外表,那就得不到什么。正是这个缘故,利玛窦进了城就决定采用适度的仪表,穿上在正式访问时已成习惯的绸袍,还戴上知识阶层所特有的帽子。正是这样,仪表一旦被用来当作习惯,便和它们只不过作为其代表的东西合而为一了。

因陋就简 在领洗的日子,习惯上要分发圣像和纪念章,但是由于这类东西必须远涉重洋经过许多国家才能运来,所以传教团供应的数量不多,很快就散发光了。为了满足需要,传教士们叫当地的刻工刻了一个木版用来印刷圣像,在像上印上一段说明,解释天上的上帝并没有物质的形象,所以在降临人世时就采取人的形象并赋有人性,并且从天上带来了律法。

对异教的态度

批判无神论 世界本来是无神的,中国当时的许多百姓不相信有神。但利玛窦为了宣传他的基督教神学,常常批判无神论。他说中国人大多数公开承认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在佯装相信宗教借以骗自己时,他们就大都陷入了整个无神论的深渊。正好像堕落的人类本性如果没有神恩的帮助还会更加堕落一样,原始的宗教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变得非常糊涂,以致在他们放弃对那些没有生命的神灵的迷信时,很少有人能不陷入无神论的更严重的错误之中。

偏袒儒教 利玛窦通过对儒学及其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的研究和观察,认为儒学是一种教派,即儒教,它有不少值得称誉的地方,故此,利氏对儒教多有偏袒,他说:中国人的自制行为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

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的确，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们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们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欧洲所知的所有异教徒教派中，我不知道有什么民族在早期是比中国人犯更少错误的了。从他们历史一开始，他们的书面上就记载着他们所承认和崇拜的一位最高的神，他们称之为天帝，或者加以其他尊号表明他既管天也管地。看来似乎古代中国人把天地看成是有生灵的东西，并把它们共同的灵魂当作一位最高的神来崇拜。他们还把山河的以及大地四方的各种神都当做这位至高无上的神的臣属而加以崇拜。他们还说理性之类来自上天，人的一切活动都须听从理性的命令。

人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由于上帝的慈悲，很多古代中国人借助于他们所必然有过的那种特别的帮助，已在自然法则中找到了得救，据神学家说，只要一个人根据自己良心的光芒，尽力去寻求得救，上帝就不会拒绝给他的帮助。他们已经努力这样做了，这一点是完全可以他们的历史中断定的，他们的历史就是他们代表国家谋公共福利所做的无数善行的记录。从他们古代哲学家的那些罕见的智慧的著作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些书仍然存在，上面满都是训导人们要有德行的最有益的忠告。在这个方面，他们似乎完全可以和我们自己最杰出的哲学家相匹敌。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

批评占星术和占卜术 利玛窦对占星术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注意到：中国官方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北京的天文学家掌握向全国发布日月食消息的特权。当他们发布日月食声明时，行政官和那些拜偶像的和尚们都奉令聚集在一个特定地点，穿上表示他们职务的长袍，声援他们认为还在受观察的行星。他们所做出的声援就是敲打无数的饶钹，有时是跪着，喧嚣一直继续到整个日月食历程结束。他们害怕日月食行星会被龙吞掉。民

间也有不少人相信占星术，如李应试，他深深沉溺在占星术里。传教士因此经常向他解释说：魔鬼经常用这种邪术骗人，当前途未经证实时，要人们相信这种巫术并非完全不可行。看来好像是他从酣睡之中被唤醒，被引向有关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真正知识。利玛窦还说过李应试有一收藏丰富的图书室，他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在神父们的帮助下，清除其中为教会规定禁止的书籍。这些书大多是谈占卜术的，其中很多是抄本。这些藏书全都付之一炬；有的是在他院子里烧的，剩下的是按他的意见在教堂烧的，好让大家知道他认真地下决心改信真正的和更完美的宗教了。

批判佛教 利玛窦对佛教的批判态度是异常坚决的。他说：不管他们的教义中可以有怎样的真理之光，但不幸却被有害的谎言所混淆了。他们对天和地的观念以及说天地是惩恶奖善的地方等，都是十分混乱的；他们无论在天上或地上，都从不寻求死者灵魂的永生。这些灵魂被认为过一些年之后就重新诞生在他们所假定的许多世界中的某一个世界里。在那里，如果他们想要弥补罪过的话，就可以为自己过去的罪恶赎罪。这只不过是他们所以影响这个不幸国家的许多荒谬的说法之一。

他们对形成神的观念的致命伤是认为神和一切物质的东西都属于同一个本质。这个大错是从偶像崇拜的教义中得来的，他们以为神就是物质宇宙的灵魂，就仿佛是一个伟大身躯的一颗心灵那样。

他们说晚上他们就把太阳藏在叫做须弥(Siumi)的山下，山的底部在海下两万四千英里。他们创造了一个想象的神叫作阿罗汉(Holochan)的，来解释日月食，他用右手把太阳遮起来就发生日食，他用左手把月亮盖起来就发生月食。

利玛窦还极为鄙视和尚，他认为：这种寺院中的奴仆是全国最低贱和最被轻视的阶层，他们来自最底层的群众，年幼时就被卖给和尚们为奴。他们由作奴仆而成为弟子，以后再接替师父的位置。人们采用这种继承的办法以便保持职位。但他们里面决没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为了过圣洁的生活而选择了参加这一修道士的卑贱

阶层的。他们也和师父一样既无知识又无经验，而且又不愿学习知识和良好的风范，所以他们天生向恶的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每况愈下。虽然这个阶级不结婚，但是他们放纵情欲，以致只有最严厉的惩罚才能防止他们的淫乱生活。

高僧达观死后，他的名字成了那些枉自吹嘘不怕肉体受苦的人的代号；但是他忘记了自己的吹嘘，当他挨打时他也像其他凡人一样地呼叫。官员有令，他的尸体不得收葬。他们怀疑他只是装死，他可能施展这样那样的诡计逃脱。他们简直不能相信他一挨鞭子就死掉了。

达观有一个自称独身者的同伴，被发现养活着一打以上的侍妾。另一些则通过他们的信徒的关系而犯有侵吞大量公款之罪。

利玛窦把佛教徒比作魔鬼撒旦，他从不礼拜佛像，当然也不会与他们住在一起，因为跟他们住在一起很不安全，他的教规和有关教规的书籍和他们的全然不同。

利玛窦不拜神像，有人劝他别忘了敬神，因为即使最高的大官也敬神。当他们看到他不听他们的劝告时，他们就拼命恐吓他，警告他说，如果他顽固不化，就要遇到邪魔。他们对他们的请求仍然充耳不闻。

利玛窦劝说百姓放弃佛教信仰，毁掉佛像。有一位妇女在教堂里把她全部可怜的偶像和她用来祷告伪神名字的念珠一起都在火炉里付之一炬。她还交给神父们一份文件，是偶像的祭司们卖给她的天主教徒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请求天主教王陛下在她死后宽恕她并免掉对她的过错所应给的惩罚。

还有一家人崇拜偶像时，对他们的木雕神是仔细照料的，后来他们代之以十字架像之后，便把一大箱精工雕刻的神像送给了教堂。利玛窦把全部的收藏送到澳门去，作为从南京的暴君即魔鬼那里夺得的第一批战利品。这批东西的到达成了一次欢乐的对上帝感恩的机会。

利玛窦还与佛教高僧进行公开正面交锋，沈真可是相当有学问的，奸诈狡猾，熟悉所有的宗教派别，视情况需要而充当反派的

辩护人。利玛窦说,他不想跟达观学任何东西,但是如果他达观想学点什么,那么欢迎他来学。利玛窦的意思是,最好避免和这个人的卑贱阶层有任何接触。这个大骗子的傲慢简直无法安息。他在撒旦的学校里还能学到别的什么呢?诚实的人是受不了这些的。但为了宣传基督教,他还是参加了一次与达观等人的大辩论。

同时被请来的智者雪浪大师黄洪恩和利玛窦坐在一起,身穿线织的法衣,掩饰着一种目空一切的态度,装作一副要辩论的样子。

在他们的第一次辩论中,利玛窦逼得他不得不承认,佛教崇拜就像是一个半好半烂的苹果一样,人们可以接受其中好的部分而抛弃其余部分。

六、利玛窦传入中国的西方科技与文化

虽然在利玛窦之前来华的传教士已开始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但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无法和利玛窦相比。他不仅大量地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还将大量的科技知识传入中国,包括地学、天文学和数学。他不仅亲自翻译西方的科技著作,还带出不少中国学生。他传入中国的科技知识,不仅影响教内人士,而且在中国学术界、文化界乃至朝廷和民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此,西方科技与文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一股潮流。利玛窦被称为西学东传第一师,是当之无愧的。

利玛窦传播西方科技与文化有案可查的方式是书籍与实物,但是不容否定,布道交谈和辩论是传播的另外三种重要方式。虽然那些口头表达的内容大都没有记录下来,但从《中国札记》中还是可见一斑的。

西方社会文化制度

婚姻法 禁止纳妾的法律以及约束国王和平民的婚姻法。这种法律只允许娶一个妻子,禁止离婚,哪怕没有子女也不得离婚。禁止为孩子订婚约而必须等到成年。

教皇制度 天主教会比皇帝更高的、在宗教事务上有最后决定权的权威。这一权威不由任何个人来继承,而是由有学识的、慎重的、虔诚的教士们共同开会选出一个从小出家侍奉上帝、宣誓守贞的人来担任,而且这个人治理教会十分持重而高尚。传教士们总是极为尊崇地对待教皇的崇高地位,并不容置疑地表明它纯粹是一种高贵风范的尊严。

出版法 城镇的大主教和教士为了保持教义的完整,要对出

版书籍进行审查,以防任何有害于宗教信仰的道德的东西得到传播。客人拿起一本书,神父告诉他说,那是有关机构的官员发给的出版许可证。这是欧洲的习惯,以防谬论以及违背良好德行的言论流传。

中文著作问世

《交友论》 用中文写成的论友谊的短文——《交友论》,是皇帝向利玛窦询问了欧洲人对友谊的看法后写成的。

《西国记法》 最令中国人满意的,莫过于利玛窦表演他的非凡记忆力,他是采用一些技巧和方法才做到这一点的。有时候,他们把很多中国字漫无秩序地写下来,而利玛窦读上一两遍,再通过记忆就把它们按书写的样子重复读出来。那是惊人的,但使他们简直莫明其妙的是,他马上又把整篇东西通过记忆倒背了出来。他们很多人渴望知道他是怎样做到这点的,于是他把这种办法教给他们当中的几个人,但是困难不小。利玛窦写了一份记忆训练法的说明——《西国记法》,用事物和地点作为提示,献给总督的子女,然后把它交给他们的父亲,这份说明后来传遍了全国,大家都在使用。

《天主实义》 利玛窦修订了他的教义问答——《天主实义》,把它增补、整理得好像是出自文人之手。它的读者不再像过去那样会憎厌可恶的和尚的名称,或者书中所谈论的宗教崇拜了。新版出现时,旧印本就被毁版和抛弃了。

二十五箴言 培养对基督教世界的友好态度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神父们所写的一切东西上都习惯加上一些简短的道德箴言。有些箴言是用他们本国文字写成的,然后再用中文来解释。中国人喜欢这个习惯,往往收集这些警句,写在自己的扇子上,或抄在纸上,从而可以贴在墙上阅读。

《西琴曲意》 传教士很有兴趣为中国学生演奏的乐曲配上中文歌词,利玛窦利用这个机会编写了八支歌曲,他称之为“西琴之

歌”(即《西琴曲意》八章)。这些歌曲都是涉及伦理题材、教导着良好的道德品行的抒情诗,并引用了基督教作家的话加以妥善的说明。这些歌曲非常受人欢迎,许多文人学士都要求神父送给他们歌曲的抄本,并高度赞扬歌中所教导的内容。他们说,这些歌曲提醒皇帝应该以歌曲中所提到的品德来治理国家。为了满足对歌曲抄本的需要,神父们把它们连同其他一些曲子用欧洲文字和汉字印刷成一本歌曲集。

《畸人十篇》 吏部尚书李戴是河南人,年事已高。他经常邀请利玛窦去他府中,并喜欢谈论来世的畏惧和希望的事情。几年之后,利玛窦把和他的谈话写一个提要,作为他的一部书中的两章。后来,他又写了关于这些资料的进一步评论,从而表明由于谈话人的高贵地位而增加了谈道的价值。这些评论被收入《畸人十篇》。

《四元行论》 利玛窦很少管或者根本不管中国人对古代权威的信仰。他告诉他们,只有四种元素,不多不少,它们具有相反的特性;他还告诉他们每种元素到哪里去找,他们并不反对其他较低级的三种元素,但是他们很难相信在天空之下发现的火要占有基本土地的一大部分。他们不认为彗星和流星也燃烧着他们在地上所看到的那种同样的火。他们把彗星也算作普通的星。利玛窦用中文写了一篇有关这个题目的评论——《四元行论》,文中他抛弃了他们五种原素的说法,确立了四种元素,他规定了它们的位置并以图加以表明。这个评论引起很大兴趣。他们把它印了许多份,它也像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到处获得很高的称赞。

《几何原本》 翻译的缘由——神父们承担了一项工作,那初看起来似乎与他们传教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但一旦着手进行,却证明是十分有益的。徐光启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已经印刷了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书籍,现在他们就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内容则要新奇而有证明。但中国人最喜欢的莫过于关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一书。翻译过程——徐光启有一位朋友与他同年中举,但不能合法地取得更高的学位,他被委派与利玛窦合作准备欧氏的这个中文版本。他每天给庞迪



CHRISTOPHORVS CLAVIVS BAMBERGENSIS E
 SOCIETATE IESVÆ ETATIS SVÆ ANNO L XIX
 P. Cristoforo Clavio S. I. (1538 - 1612).
 (Da un'antica stampa che lo riproduce sessantottenne); Gale.
 et Illustrate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 Alfred Hamy, Paris.

图7 利玛窦恩师克拉韦乌斯教授,利玛窦所译《几何原本》即根据他所整编欧几里德的名著前六卷

我上课教授中文,而且住在教堂里,以便和神父们密切接触并经常用中文谈话。这两位编者的结合并不理想。在这以前不久,利玛窦就告诉过徐光启,除非是有突出天分的学者,没有人能承担这项任务并坚持到底。因此,徐光启自己便担负起这项工作。经过日复一日的勤奋学习和长时间听利玛窦讲述,徐光启进步很大,他已用优美的中国文字写出来他所学到的一切东西;一年之内,他们就用清



图8 利玛窦与徐光启

晰而优美的中文体裁出版了一套很像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中文当中并不缺乏成语和词汇来恰当地表述书中所有的科学术语。徐光启还要继续翻译欧氏的其余部分，但利玛窦认为就适合他们的目的而言有这六卷已经足够了。影响——后来徐光启把《几何原本》的六卷印成一册出版，并为它写了两篇序言。第一篇是以利玛窦的名义撰写的，它介绍了原著的那位古代作家而且赞扬了由利玛窦的恩师丁先生对原作所作的阐叙以及他的说明和主要注释，

这些利玛窦已译成中文。这篇序言里还解释了对于各个问题和定理的应用并附录了其他的数学数据。在第二篇序言里，徐氏对欧洲的科学和学术文艺进行了真正出色的赞颂。这本书大受中国人的推崇而且对于他们修订历法起了重大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本书，有很多人都到利玛窦那里，也有很多人到徐光启那里求学，在老师的指导之下，他们和欧洲人一样很快就接受了欧洲的科学方法，对于较为精致的演证表现出一种心智的敏捷。李之藻已经了解到很多有关基督教的情况和许多数学知识，特别是从他研究欧几里德之中；而且他有点惊奇地发现，在利玛窦来到以前，中国人根本没有听说过欧几里德。

西方传入的科技

这里所论述的西方传入的科技大都是经过利玛窦之手，也有部分是经其他传教士之手。

星盘 在旅行过中国的那些地方，传教士利用天文学家使用的星盘和其他仪器亲自确定边界的位置。利玛窦送给总督一只瞄准北极的夜钟，一副星盘。李之藻对数学的其他部门感到兴趣，他全力以赴协助制作各种数学器具。他掌握了丁先生(Father Clavius)所写的几何学教科书的大部分内容，学会了使用星盘并为自己使用而制作了一具，它运转得极其精确。接着，他对这两门科学写出了一份正确而清晰的阐叙。他的数学图形可以和任何欧洲所绘的相匹敌。他论星盘的著作(《洋盖通宪图说》)分两卷出版，利玛窦把一份送给了罗马的耶稣会会长，作为中国人完成的第一部这类著作的一个样本，另一份送给丁先生，因为他本人曾一度从丁先生受教。

西洋建筑 肇庆的房子本身很小，但很中看。中国人一看它就感到很惬意；这是座欧洲式的建筑物，和他们自己的不同，因为它多出一层楼并有砖饰，也因为它的美丽的轮廓有整齐的窗户排列作为修饰。房屋的地点和安置也增添了它的美丽。传教士修饰房

屋和教堂,并且建立了两个祭坛,每所礼拜堂一个,头一个供奉救世主基督,另一个供奉圣母。在1609年的圣诞节,教堂里极其隆重地重新开放,大群信徒都来聚会,还有更多的异教徒。装饰都按欧洲格式布置,证明很能引起中国人的注目。

西书 在利玛窦赴京的行李中,有他以前在各地搜集的天文学的全部书籍,准备当皇帝可能要求他改正中国历书的错误时使用。郭居静除了从神学院院长那里所得到的礼品外,还收集了其他一些非常有用的物品,诸如两个圣餐杯、许多书籍和其他教堂所需的东西。传教士们带有一套八卷本精装的普兰丁(Plantin)版的《圣经》,它是红衣主教塞维里尼(Cardinal Severini)给中国传教团的礼物。在圣母升天节那天,神父们和教徒们以隆重的排场接受了这些书籍,还举行了庄严的大弥撒以示庆祝。书籍由神职助理人员捧着,前面有一个人擎着香炉,一直送进教堂。然后把书版放在教堂的一张桌子上,人们虔庆地跪着亲吻它,感谢上帝使它在远涉重洋经历千辛万苦以及终于从沉船的最后一分钟挽救出来而得以保存。

望远镜 鄂本笃去朝见国王穆哈默德(Mahamethin),他送给国王一只挂在脖子上的项链表、一副望远镜以及其他欧洲小玩意儿。鄂本笃拜访王子的母亲(阿克苏君主的母亲),他送她一些女人喜爱的东西,一副望远镜、印度的洋布以及几件小物品。

日晷 利玛窦的保护人要求两个日晷,一个他要送回他浙江省的老家,另一个则自己留用。它们很快制好并且送了来,回报的是一笔银子,大大超过了仪器价值。靠他的学生们的帮助,利玛窦制造了多种样式的日晷并分给了他们。随后,他又从模子里铸了许多座,放在各个官员的家里。中国人不懂得在平面上或者固定在墙上怎样能使用日晷,他们也不肯相信这些和无数的其他事情都是可能的。利玛窦一直期望拜访显贵沈一贯,他赠送一些西洋小礼物作见面礼,其中一件是乌木精制的凹形日晷仪,主人特别喜爱。张德明在大庭广众之间讲话,说了许多有关利玛窦和北京其他传教士的事,还说他接受了他们赠送的日晷,并且表示他很愿意学会怎

样调节它。最使中国人感到惊奇的莫过于看到他们记为24度的黄道带合适地刻画在一个日晷上,以至表影没有和用中国字说明的白昼指示线丝毫不合。马堂从利玛窦一行的箱子里挑了一件飘垂的长袍、一些印度棉布、几只玻璃瓶、日晷、砂漏以及其他的新奇玩意,他吩咐把这些都运到他家中妥善保存。

三棱镜 两位传教士来到肇庆的总督面前,他们献上表和几只三角形的玻璃镜,镜中的物品映出漂亮的五颜六色。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新鲜玩意儿,长期以来他们认为玻璃是一种极为贵重的宝石。百姓先看到准备送给原长官的玻璃三棱镜,惊得目瞪口呆,然后他们诧异地望着圣母的小像。仔细打量玻璃人,只有惊羨无言地站在那里。随同长官的官员们尤其如此,他们越称赞它,就越引起群众的好奇心。最后,他要求允许把这些珍奇带到他的官邸去,给他的家人看。为了修教堂,传教士把三棱镜卖了20个金币,以完成当时已动工的部分。这满可以支援他们直到海外送来他们所期待的接济的时候。为赢得总督的好感,新来者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拜访他,送他一份欧洲的珍贵礼物。最使他喜欢的是玻璃棱镜,他很久就想要一个。信徒马丁从教堂偷了三棱镜逃往广州,以为他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宝石。罗明坚两次赴广州,才发现了马丁在城里某地,而且他持有那面三棱镜。那消息对他的其他受害者来说是足够了。他们骗他把镜子交给他们,交给他一封假称是岭西道写的信,信中说假如他交回那件宝物,神父就会偿付他所欠他过去东道主的钱。几位官员到教堂来暂时访问消遣。在谈话中,他要借玻璃棱镜,来观看山河和港口内的船。从马丁那里接受镜子的另一信徒,听说马丁被拘,就主动把它交还给教团。他害怕官府得知玻璃镜在他家里,他也会被逮捕,被控以盗窃罪的。利玛窦把三角玻璃棱镜送给岭西道黄时雨,他很喜欢用它来观看,并很渴望据为己有。看来他对这份礼物感到高兴,当他打听到它在欧洲不值什么钱时,尤其高兴。他怀疑这种做法,疑心他们降低它的价值,好让他乐于接受它。他向他们保证,这样的珍奇在任何地方都卖得起高价,并且为了避免因接受任何礼物而可能受控告,他说他宁愿购买它,

而不愿当作礼物来接受。然后他吩咐给两枚金币作为镜子的价钱，在当时的情况下拒绝接受则是不礼貌的举动。神父听说就要发生的事，惶惑不安，就把官员的两个仆人找来，拿一副玻璃棱镜给他看，镜子以极为鲜明的色彩反照山河的两岸及城镇本身，使他们很欢喜。他说他打算把这镜子送给他的英雄将军，但他渴望预先知道将军是否要把他带往北京，因为他不愿回到韶州而又没有这面镜子。然后利玛窦去拜见将军，把玻璃棱镜送给他。他犹豫不受最后才勉强收下，对神父们为他所做的一切感谢不止。医生谈到玻璃三棱镜的奇妙，总督陆万垓要看看玻璃棱镜，也让他的家人看看；但后来当利玛窦把镜子送给他当作礼物时，他怎么都不肯接受。王弘海到达后，南昌府的神父们就去拜访他，并带给他一些欧洲礼品，他特别喜欢他曾在韶州见过的玻璃三棱镜，他认为这是一块具有巨大价值的宝石。利玛窦让他们看了自鸣钟、十字架像、一尊圣母雕像、一座八音琴，这类东西是中国人甚至于闻所未闻的，还有两个玻璃三棱镜。

为了回报他的好意，传教士送给瞿太素几件礼物，其中有一件就是著名的玻璃三棱镜。

瞿太素曾在广东省寻找一副三棱镜，愿出高价购买。既然现在他有了一个，所以高兴得不得了；为使它更加引人注目，他把它装在一个银盒子里，系以金链，结成现状。他甚至把银盒装饰以题辞，大意是这件珍宝是一块补天之物。后来，在皇帝接受了礼品之后，瞿太素才以比过去所出的更高的价钱卖掉了他的三棱镜。把十字架、圣像和玻璃三棱镜交托给皇帝的一位谏官祝世禄妥为保管。他对传教士所表现的好意，在某种程度上是报答传教士们所送给他的几件欧洲礼物。他最欣赏的是那个玻璃三棱镜，这是他们交给他保管的。他也认为这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李玛诺给中国传教团加上几个玻璃三棱镜、镜子、一些华丽的衣服、亚麻布、小砂漏时钟和许多玻璃器皿，这些东西都是社交所需，就像是给社会进步的齿轮里注润滑油那样。

天球仪 徐大任是个很有影响的人。此人还是一名低级官员

时,利玛窦有一次送给他一个天球仪和一只砂漏;即使是今天,中国人也还把这些东西看得很宝贵。利玛窦还送给建安王一个天球仪,标有天轨,另外还有地球仪、小塑像、玻璃器皿以及其他这类欧洲产品。它(浑天仪、玲珑仪)不是一个地理地球仪,但是用一根像枪筒那样的细管通过它的中央,它能向所有方向转动,可以置于任何高度或角度来观测任何星座,像使用天象瞄准的那样,它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装制。

地球仪 利玛窦用铜和铁制作天球仪和地球仪,用以表明天文并指出地球的形状,当把这些不同的器械展览出来,把它们的目的解说清楚,指出太阳的位置,星球的轨道和地球的中心位置,这时它们的设计者和制作者就被看成是世界上的大天文学家。利玛窦还制造了标明看天体的天球仪和表明整个地球表面的地球仪以及其他科学仪器。直到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从未见过有关地球整个表面的地理说明,不管是做成地球仪的形式还是画在一张地图的面上;他们也从未见过按子午线、纬线和度数来划分的地球表面,也一点都不知道赤道、热带、两极,或者说地球分为五个地带。这个球仪(铜球、浑天象)的表面上什么也没有刻,既没有星,也没有分区。因此它很像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或者是本来就想让它这样,从而它可以用作天体仪,又用作地球仪。王丰肃叫人替他做了一个天球仪和一个地球仪,他在上面加上了适当的注释。

钟表 直到当时为止,中国人从没有听说过钟表这种东西,那既新鲜又使他们感到神秘。印度教区主教曾给利玛窦一块很精致的表,作为给中国传教团的礼物。罗明坚送给总兵黄应甲一块表,这是一种用许多小金属齿轮安装成套的计时工具。葡萄牙人担心着他们的商船不平凡的拖延,因修道院当时还没有固定的岁入,钱少到买不起长官所要的钟。作为一种代替办法,他们就把制钟匠送到肇庆的长官那里去。这个人来自印度果阿省,是所谓加那利人(Canani),肤色深褐。当船只带着这名匠人返回并且作了解释时,长官表示很高兴他到来以及澳门修道院送给他的稀罕的欧洲贵重小礼品。他马上把城里两名最好的匠人找来,协助新来的钟表匠工

作,就在教堂里制钟。后因案件取消制钟的命令。就在地图绘完时,长官在大堂上曾拒绝接受的那只钟刚好也竣工;利玛窦就同时把两样东西都送给他。几个月后,他发现家里没有人能上和钟,就把它送回去,在教堂里用以供来客们取乐。

王洋听说澳门制造钟表,就要求罗明坚给他定做-一个,答应给以高价。他还送去一些对传教工作非常有用的礼物,其中一幅为罗马著名艺术家绘制的基督画像,四件制作精致、样式美观的计时器。第三件是表,可用带子系在项上,所以很容易看得见这些精巧的机械作品。这第四件要大些,是摆在桌上的一座钟。它比表贵重,因为它结构复杂,没有摆锤,也因为它不仅准确击时,还在每一刻钟和每半个钟点响三下。这只钟成为整个中国议论和羡慕的对象。

人们最称羨的是利玛窦为教堂和邻居所树立的那座钟。它靠一口大铃来报时,不仅把一天的时间告诉过客,而且告诉远处的人;他们始终弄不明白它怎么能不用人敲击就自己发声。利玛窦所献礼品有中国人所珍视的欧洲物品。其中有一座卧钟,是按他们的计时法制作的,在黑色中国大理石上刻出黄道带。这只钟还指示日出和日没的时刻,每日昼夜的长短。时辰还刻在每个月月开始和中间。他们提到开始和中间,因为中国人把黄道带计为二十四宫。这份礼物受到极大的赞美。以前在中国还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他们所知的唯一测时数学器械,还是根据赤道命名的,而且这种器械他们无法精确使用,除非是在纬线 36 度的高处。利玛窦送给总督一只瞄准北极的夜钟,一副星盘。有一位官员曾运用他的职权以图报复他认为是传教士对他的侮辱。侮辱的根源是他怨恨当他想要他们的天文钟时,传教士们没有把它留给他家。

为了促进他设想的目的,视察员搜集了他认为凡是有助于这个目标的所有物品,都送往南昌府,其中有一个大小适中、制作精巧用齿轮结构的自鸣钟,能报出一点钟、半点钟、一刻钟。这座钟是耶稣会阿瓜维瓦会长送给传教团的,希望传教团能以已经开始的同样方法继续得到进展。菲律宾主教也给中国传教团的视察员送来一个和前一座大致相同的钟。尚书建议,一座钟送给皇宫的主

管,另一座钟送给宫中的一个太监,尚书想他能帮助引见。利玛窦却不肯把一座钟送给任何人,除了给尚书本人。这似乎使他无比高兴,他们同意了这种办法。事情就这样商定了,一座钟送给了王尚书,他学会了开动和在必要时进行调整。大家都急于看到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它们以钟声报时特吸引人。他们有鉴于此,觉得最可取的还是由郭居静去的路上把钟带到南昌去。李玛诺送来了一座时钟,加入到献给皇帝的礼品之中。这座钟比他们原先的那座小一些,但由于饰有丰富的装饰,所以看起来很大。首先他们觉得应该把刚收到的那座大钟放进一个合适的柜子里。他们已在南昌给那座小钟找到一个雕花涂金的盒子。但是在装饰方面,他们不能次于南昌。这座钟放进了一座有四根柱子的罩子里。柜子四面都装有可折门。时刻在钟面上用中文大写字标出,有一只雄踞的鹰,鹰嘴对准时刻。钟顶形成美丽的拱形,有各种各样的花叶纹雕刻作装饰,还刻有十分精致的龙。皇帝第一次看见那座较大的钟时,钟没有调好,也不走,因此它既不守时,又不报点。于是他命令立刻召见神父们;神父们奉召,急速赶来。传教士告诉田尔耕这些钟是一些非常聪明的工匠创制的,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就能日夜指明时间,它们有铃铛自动报时,有一个指针指出不同的时间。他们还说明这些机器必须有人管理,而且这种操作并不难,仆人们两三天即可学会。这些情况都向皇帝陛下作了报告。皇帝指定了皇宫钦天监的四名太监,命令他们三天后带着这些机器到他的接待室来,并命令他们十分仔细地执行交给他们的事。由于努力学习,被指派管理这些钟的四名太监终于掌握了管理钟的充分知识。为了防止出差错,他们把所教的每个细节以及钟的机构都记录下来。他们首先留心的是问清所有这些齿轮发条和附件的中文名称,利玛窦把所有的名称都用汉字告诉他们,因为任何零件遗失了的话,它们的名称很容易就会被忘记的。安排的三天学习时间还没过去,皇帝要钟了。钟就被遵命搬到他那里去,他非常喜欢它,立刻给这些太监晋级加俸。太监们很高兴把此事报告给传教士们,特别是因为从那天起,他们之中有两个人被准许到皇帝面前给一个小钟上发条。皇帝一

直把这个小钟放在自己面前，他喜欢看它并听它鸣时。皇宫里没有
一个地方能安放那座大钟，使它的摆锤到可以控制齿轮的低度。于
是第二年皇帝把它送在工部那里，命他按照传教士们所画的图样
为它修建一个合适的木阁楼。这座木阁楼真配得上作为帝王的陈
设，其装饰品就超过了材料的价值。那上面刻满了人物和亭台，用
鸡冠石和黄金装饰得闪闪发光；工部花了 1300 金币建这座楼，遵
照圣谕，这座楼修建在第二道墙以外的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那里
有很多这类美丽的东西。据说，皇帝陛下以及其他显贵们有时到这
里来散心，观看引人入胜的景，其中也包括这项欧洲的纪念物。太
监讲述了皇帝怎样留下自鸣钟不被人取走的动人故事：皇太后听
说有人送给皇上一架自鸣钟，她要皇帝叫太监把它送来给她看。皇
帝想到她可能会喜欢它，到时就决定留下了，同时他又不想拒绝
她的要求，便把管钟的人叫了来，要他们把管报时的发条松开，使
它不能发声。皇太后不喜欢不能鸣时的钟，就把它还给了她儿子。
皇宫的钟出了毛病，或许是由于不够关心或许是管理钟的太监的
大意；皇帝就命令把它拿到神父家里去修理。钟一拿来，放了三天
的期间，好奇的群众都涌到这里来。皇帝知道后，就下令此后不得
把钟拿出皇宫。如果钟表需要修理，就召送钟人进宫修理。北京的
传教士们经常奉召入宫，有时他们自动到那里去和太监们商谈宫
里的业务。他们总是在钟表需要照料时奉召。

砂漏 李玛诺进入中国大陆时，还带着小砂漏作为礼品。利玛
窦曾送给徐大任一个砂漏。

地图 欧洲的图画和塑像、数学计算法、浮雕地图，也吸引很
大的注意。建安王接收的礼物中，最使他高兴的莫如两部按欧洲样
式装订、用日本纸张印刷的书籍，纸很薄，但极坚韧。其中一部书附
有几幅地图以及对所有图画的中文解说。瞿太素曾研习丁先生的
地球仪。由于使用投影，地图中每个国家是根据它在五个地带中的
某一个地带的位置而表明的，对每个国家都增添了适当的注释，给
读者提供了关于这个国家的简要描述。就在地图绘完时，利玛窦把
它送给王泮。他收到礼物，无比高兴，用最和蔼的词来表述他的满

意,并回赠了几样礼品。他自己出钱多制了几幅地图,分赠给他在当地的友人,并命令把其余的图送到各省去。在他们所携带呈给皇帝的礼品中,有一个大木板,上面刻着世界地图,附有利玛窦用中文写的简略说明。尚书非常高兴地观看了这幅世界地图,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能看到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表面上雕刻出广阔的世界,包括那么多新国家的名称和它们的习俗一览。他愿意非常仔细地反复观看它,力求记住这个世界的新概念。碰巧这位总督赵可怀从南京省某市市长王玉沙那里得来一幅世界地图,原是利玛窦在肇庆所作的。他非常喜欢这幅地图,便在苏州镌石,并加上一篇赞扬地图的雕刻美观的序文。序文是他亲自作的,但他没有提到图的作者。在他送给尚书的礼品中,有一幅这个地图的摹本是作为他自己的原作赠送的。中国最早的石刻方法和后来的制版方法曾在本书第一卷加以说明。当尚书看到他所得到的地图与他认为是利玛窦所摹的这一幅极为相似时,利玛窦一眼就显然看出,他是在看自己的作品。他说他第一次是在肇庆刊印这幅地图,把复本送给了他的朋友,它就流传到这里。他的主人听到这些非常高兴,因为这使他对礼品更为满意,原来像总督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人都如此高度评价它。尚书写信给总督感谢他的赠礼,并告诉他地图的作者正在他家中,将和他回去北京。总督立即派卫队长来信前往,请求尚书尽快将地图的作者送到他那里,他说由于他名声远扬,他已等待很久想要会见他了。

有一天,利玛窦和庞迪我到皇宫里去时,他们发现钦天监主管由于一道圣旨而有点不安。皇帝下令用丝织成12幅世界地图,安放在6对大屏风内。这幅地图是利玛窦的作品,由李之藻在不久之前刊印的。钦天监被告知要向利玛窦索取这些地图,因为他的名字作为绘制者出现在原图上。他只是最近才送了一幅地图给太监们,当他们把它呈现给皇帝时,皇帝非常喜欢它,所以要给皇子每人一张,还有其他住在宫里的亲属们,好让他们把地图作为欣赏的装饰品,挂在墙上。直到这时候,神父们始终因一种想象中的担心而克制自己不肯把他们的地图献一份给朝廷。他们害怕朝臣们会认为

自己对于中华帝国版图辽阔的想法受了轻视。这幅图有两个不同的刻本,但神父的住所内一个本子也没有。李之藻有一个刻版,另一个印刷者所用的刻版则在他们的房屋遭到洪水时已经毁掉。这幅修订的舆图在精工细作上和印行数量上都远超过原来广东的那个制品。它的样本从南京发行到中国其他各地复制。其中有一份送到贵州巡抚郭子章手中。他在广东省时就知道了利玛窦,并且出于对他的敬意,他把全部舆图复制成一本书的形式。冯应京也送给他们一些地图,后来他按他们的愿望重印了许多份。

李之藻青年时雄心勃勃要对整个中国作一番很好的描述,并绘制 15 省的精确地图,这对他就意味着全世界。当他看见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时,就十分惊叹自己作的局限。他知识纯诚,从地图中得到良好的启发。于是他马上跟利玛窦以及其他神父交上朋友,为的是学习地理,他把公余的时间都用来钻研它。他的第一项大工作是以尽可能大的比例尺重制世界地图,所制的图约为六平方英尺,很巧妙地把画面折卷在精制的木轴上。为完善这项工作,利玛窦增补另一些国家、更多的著名地方和各种说明。他还在边上绘制太阳和星星以及其他装饰,此外尚有对基督教风俗的叙述和对基督教义的解释。有几位士大夫也用优美的序文来点缀这部著作。在为这些地图刻板时,刻工不让神父们知道而刻了两种板,这样就同时出版了这部佳作的两个版本。甚至这还不能满足对它的需求,另一个新信徒刊布了一种新版本,用八幅大地图来表示整个世界,于是在北京就同时流行三种世界地图。皇帝传传教士进宫来制作第一版地图的新版,这幅图就保存在宫里。他们很高兴做这件事,并且这恰值对地图本身表现出有各种不同见解的时候。关于在地图上刻印的违反佛教崇拜的东西,有人抱有怀疑,还有有关基督教信仰原则。神父们则希望可能到时候皇帝或他的某一个继承人在观看地图和阅读上面的解说时,会有意询问一下基督教的信仰。同时,地图的出现减低了中国人认为他们帝国囊括全世界的观念;在这张地图上,它仅占地球上另一条而且并不是最大的地带。庞迪我就拜访了礼部两位官员,并且带了几本神父们刚刚出版的中文

书和一幅世界地图作为小小的礼物。这份地图,经常加以校订、改善和重印,进入了长官和总督的衙门,大受称赞,最后应皇上亲自请求而进入皇宫。

七、利玛窦传入西方的中国科技和地理知识

利玛窦通过书信、书籍与实物的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的科技、文化与地理知识。

介绍中国科技

自然观 中国人认为整个宇宙是由一种共同的物质所构成的，宇宙的创造者发现是有一个连续体的，与天地、人兽、树林以及四元素共存，而每桩个体事物都是这个连续体的一部分。他们根据物质的这种统一性而推论各个组成部分都应当团结友爱。

天文学 中国人把天空分成几个星座，其方式与欧洲所采用的有所不同。他们的星数比欧洲天文学家的计算整整多400个，因为他们把很多并非经常可以看到的弱星也包括在内。尽管如此，中国天文家却丝毫不费力气把天体现象归结为数学计算。他们花费很多时间来确定日、月食的时刻以及行星和别的星的运行，但他们的推论由于无数的错讹而失误。由西部进入中国的阿拉伯人曾带给中国人某些数学科学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很少是以确切的数学证明为基础的。阿拉伯人留给他们的大部分是一些规则的表格，中国人按表格归纳他们对行星以及一般天体运动的计算。在中国档案中对新月和满月都有精确的描述。在中国管理天文研究的这个家族的始祖，禁止除以世袭入选者之外的任何人从事这项科学研究。禁止的原因是害怕懂得了星象的人，能够破坏帝国的秩序或者是寻求这样做的机会。

南京钦天监安装了金属铸就的天文仪器或者器械，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超过曾在欧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

这些仪器虽经受了近 250 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不损于它原有的光采。这里有四件最大的仪器。

茶 中国有一种灌木，中国人、日本人叫做茶。在这里，他们在春天采集茶的叶子，放在荫凉处阴干，然后他们用干叶子调制饮料供吃饭时饮用或朋友来访时待客。

漆 中国有一种值得详细论述的东西是一种特殊的树脂，它是从某种树干挤出来的。它的外观和奶一样，但粘度和胶差不多。中国人用这种东西制备一种颜料，他们称之为漆，葡萄牙人则叫作 Ciaco。它通常用于建造房屋和船只以及制做家具时涂染木头。涂上这种涂料的木头可以有深浅不同的颜色，光泽如镜、华彩耀目，并且摸上去非常光滑。这种涂料还能耐久，长时间不磨损。应用这种涂料很容易仿造任何木器，颜色或纹理都很像。正是这种涂料，使得中国和日本的房屋外观富丽动人。

硝石与焰火 硝石这种东西相当多，但并不广泛用于制备黑色火药，因为中国人并不精于使用枪炮，很少用之于作战。然而，硝石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群众性娱乐或节日时燃放。中国人非常喜欢这类表演，并把它当作他们一切庆祝活动的主要节目。他们制作焰火的技术实在出色，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能用焰火巧妙地加以摹仿。他们尤其擅长再现战争场面以及制做转动的火球、火树、水果等等，在焰火上面，他们似乎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在南京时曾举行的焰火会，在这一场合估计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

印刷术 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日期比人们认定的欧洲印刷术开始的日期即大约 1405 年，要略早一些。可以十分肯定，中国人至少在五个世纪以前就懂得印刷术了，有些人断言他们在基督公元开始之前，大约公元前 50 年，就懂得印刷了。他们印书的方法十分巧妙。正文用很细的毛制成的笔沾墨写在纸上，然后反过来贴在一块木板上。纸干透之后，熟练迅速地把表面刮去，在木版上只留下一层带有字迹的薄薄的棉纸。然后工匠用一把钢刻刀按照字形把木版表面刻掉，最后只剩下字像薄浮雕似地凸起。用这样的木版，熟

练的印刷工人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印出复本，一天可以印出一种500份之多。传教士们从这种中文印刷方法中得益非浅，因为他们利用自己家中的设备印出了从各种原来写作的文字译成中文的有关宗教和科学题材的书籍。整个方法非常简单，只要看过一次这种印刷过程，人们都会想亲自试试。

丝绸技术 在中华帝国的编年史上，我发现早在基督诞生前2636年就提到织绸工艺，看来这种工艺知识从中华帝国传到亚洲其他各地、传到欧洲、甚至传到非洲。

屏风 带回欧洲的礼品中有一件描绘了整个中国的图画，嵌在特殊的东方框架中。这些框架是工艺极其精细的优美屏风，可以折叠，打开之后非常美观，不用支柱就能站立，有时可以摆满整间屋子。当地土话叫做围屏。

轿子、船 街上常挤满轿子，河上拥塞着小艇和官员们的大船，它的体积大、装饰华丽，引人注目，显得很有气派。

宝石 宝石可用来制作多种物件，诸如瓶子、披风和腰带的扣子以及别的这类装饰品；当他们经过人工设计被雕刻成花叶时，就成为极其动人的装饰品，喀什噶尔国现在大量的这类宝石，中国人称之为琥石。它有两个不同的种类。第一种，也是较好的一种，采自和闐河，那方式有点像是潜水者入水采珠那样，取出的块大小有如厚燧石。第二种较差，从山里采掘得来，大块的被破成大约四英尺见方的板状。然后再把它们切成易于运输的大小。产这种玉石的山离都城约有20天的旅程，叫做康桑吉-喀修，意思是“石山”。

长城 著名的长城终止于中国西部边疆的北端。这里是一片大约两百平方英里的开阔地面，被阻于长城脚下的蒙古人惯于从这里侵袭中国。

纺织 南直隶的上海地区盛产米和棉，棉可做多种布，据说此地织工有20万人。布匹出口到北京皇宫和其他省份。

介绍中国地理知识

纬度位置 中国南部以北纬 19 度为界,位于海南岛。由此伸展至北纬 42 度,直达北部长城,中国人修建长城作为与蒙古的分界,并用以防御这些民族的入侵。在西边,中国的疆界自福岛测定位于东经 112 度叫做云南的省份起,并由此向东伸延直到日出之海的东经 132 度为止。在传教士恰好旅行过帝国的那些地方,利用数学家使用的星盘和其他这类仪器曾亲自确定过这些边界的位置。中国的广阔的领域大部分位于温带,因此享有温和的气候。然而,作为一个整体,这个国家也有各种气候和级差,就像人们从梅罗伊岛向北直到罗马时所可能经历的那样。

南昌位于该省的北端,约在北纬 29 度。南京位于纬线 32 度,从数学上计算它的纬度,它几乎正在全国的中央。利玛窦晋京的旅行沿途经过的主要地点是:南京省的扬州,纬度 32 度;淮安,约 34 度;徐州,经充分测定为 $34\frac{1}{2}$ 度;山东省的济宁 $35\frac{2}{3}$ 度;临清 $37\frac{2}{3}$ 度;北京省的天津 $39\frac{1}{2}$ 度;北京整整 40 度。这纠正了那些只凭想象认为北京位于纬度 50 度的人的错误。

距离测量 传教士将以中国视距尺来测量从广东的首府到北京的路程,澳门到广东首府有两天路程;中国五视距尺是一意大利里或 15 视距尺是一里路。所以,他们的水路旅程如下:从广东到南雄为 1170 视距尺,从南雄到南昌为 1120 视距尺,从南昌到南京为 1440 视距尺,再从南京到北京为 3335 视距尺,总共为 7065 视距尺或者说 1413 英里。

历史地理 中华帝国就是某些作者所称为的大契丹,而北京就是中国皇帝的所在地。这些作者称这个城为汗八里。利玛窦认为:如果对他们的信念似乎还有任何怀疑,那么他们将非常确定地证明它。

军事地理 中国四周的防卫非常好,既有由自然也有由科学

所提供的防御，它在南方和东方临海，沿岸有很多小岛星罗棋布，使敌舰很难接近大陆。这个国家在北部则有崇山峻岭防御敌意的蒙古人的侵袭，山与山之间由一条 405 英里长的巨大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一道攻不破的防线。它在西北方面被一片多少天都走不尽的大沙漠的屏障，能够阻止敌军进攻边界，或则成为企图入犯的人的葬身之所。在王国的西部，群山围绕，山外只有几个穷国，中国人很少或根本不予理睬，因为他们既不怕它们也不认为值得吞并它们。

南京城 在整个中国及邻近各邦，南京被称作第一座城市。它为三座城墙所环绕。其中第一层和最里面的一座，也是最华丽的，包括皇宫。宫殿依次由三层拱门墙所围绕，四周是濠堑。其中灌满流水。这座宫墙长约四五意大利里。至于整个建筑，且不说它的个别特征，或许世上远没有一个国王能有超过它的宫殿。第二座墙包围着包括皇宫在内的内墙，囊括了该城的大部分重要区域。它有 12 座门，门包以铁皮，门内有大炮守卫。这重高墙四周差不多有 18 意大利里。第三重和最外层的墙是不连续的。有些被认为是危险的地点，中国人很科学地利用了天然防御。这座墙提供该城如何庞大的一些概念，同时城是圆形，所以比其他任何形状都看有更大的空间。这重墙内，有广阔的园林，山和树林，交叉着湖泊，然而城中居民区仍然占有它的绝大部分。

北京 中国王朝的所在地北京位于国上的最北部，距离为了抵御蒙古人入侵而修建的长城约 100 英里。城市的规模、房屋的规划、公共建筑物的结构以及防御都远不如南京，但人口、军队、政府官员的数目则超过南京。它在南面由两层高而厚的城墙所包围，城墙上面的宽度可供 12 匹马并行而不觉阻碍。这些城墙主要是砖建筑。墙屋全用巨石支撑，墙内填满调合好的泥土。它们不比在欧洲所见的城墙更高。在北面则只有一道城墙保护。皇宫建筑在南墙之内，像是城市的一个入口，它一直延伸到北墙，长度贯穿整个的城市并且一直穿过城市的中心。城市的其余部分则分布在皇宫的两侧，这个皇帝的居处不如南京皇宫宽阔，但它建筑的雅致和优美

却由于它的细长的线条而显得突出。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砖或石铺路的,也很难说一年之中哪个季节走起路来最令人讨厌。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尘同样使人厌烦和疲倦。由于这个地区很少下雨,地面上分离出一层灰尘,只要起一点微风,就会刮入室内,覆盖和弄脏几乎每样东西。为了克服这种讨厌的灰尘,他们就有了一种习惯,那或许是何其他地方都不知道的。这是在多灰尘的季节,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不管是步行或乘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条长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起面部。面纱的质料非常精细,可看见外面,但不透灰尘。它还有其他的好处,即一个人只有在他愿意被认出时才能被人认出。它避免了无数的招呼 and 问候,并可以根据他喜欢和任何方式和任何价钱出行。

澳门 澳门有一尊叫做阿妈(Ama)的偶像,在阿妈湾内。与其说它是个半岛,还不如说它是块突出的岩石;但它很快不仅有葡萄牙人居住,而且还有来自附近海岸的多种人聚集,都忙于跟从欧洲、印度和摩鹿加群岛运来的多色商品进行交易。迅速发财的展望引诱中国商人到这个岛上居住,于是在几年之中这个贸易点开始出现了城市规模。当葡萄牙人和中国人通婚时,修建了许多房屋,不久那块岩石地点就发展成了一个可观的港口和著名的市场。这个新的居留地位于那么多港口的中心,传教士在这里发现了一条途径,通向不应忽视的传教活动的新天地。在北面是中国,那比宽阔的摩鹿加群岛区要大得多。在东面是日本和菲律宾群岛,西面是交趾交那、柬埔寨、暹罗和其他几个国家。

广州 这些市集不再像从前那样在澳门港或在岛上举行,而是在省城广州之内举行。由于官员的特别允许,葡萄牙人获准溯河而上至广东省壮丽的省会作两天旅行。

肇庆 广东省的总督被认为是它的同级中极有势力的一个。他的省份位于中国的边境,远离都城北京,被漫长的海线所包围。它的地理位置所造成的结果是,道路上盗匪充斥,海道上也有海盗,大多是日本人。为了应付这两种局势,他还受命管辖邻省广西,这就使他在需要的时候能调动一支大军,他的政府所在地不是该

省的省会，像别的地区那样，而是在他所治理的两省交界处的肇庆。肇庆镇坐落在一条流过广西省的著名河流的岸旁，从省城到海有两三天航程。这条河曾经泛滥，洪水给城镇造成了极大灾害。肇庆地区所属的 11 个县城征收一笔常税修建一座塔，据古老的迷信说法，这座塔会给全省带来好运气。第一层已建好，上面还有九层。它座落在一处极优美的地方，在一条可通航的大河上，河流灌溉总督和长官在城外的产业。教堂刚好在西城外，坐落在一条大河（西江）的岸边，河水几乎冲刷到门前的石阶。河上经常有成队的船只，很便于传教士半年一度的广州之行，传教士必需一年两次到那里去领取澳门种子部发给教团的财政津贴。

韶州 韶州城座落在两条通航的河流之间，两河即在此处汇合。一条流经南雄城的东面，另一条来自湖广省，从它西面流过。筑有围墙的城镇，连同它的许多屋舍，建立在两河中间的平原上。地势如此，所以城镇本身无法扩展，于是他们向两方跨河扩大居民区。西岸人口更稠密，有舟桥把它和岛镇连接起来。镇上大约有五千户人家。它那肥沃的土地盛产稻米和肉鱼，新鲜蔬菜也很充足，但气候不良，天气总是很坏。每年，从八月中到十二月，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居民都染上热症，病势猛烈使很多人丧生。恢复过来的人也苍白憔悴，表明病情严重。

吉安 吉安城是一个著名的人口众多的枢纽。

绍兴 绍兴城尽管不是省城，始终算是浙江省的重要中心之一。它以商业贸易也以坐落在一湾清水湖中一座岛上的独特位置而闻名。在这方面它使人想起威尼斯。它也以学者辈出、并且是一大批知识阶层的荟萃之所而负有盛名。

南昌 江西省的省会是南昌。它并不是一座最大和最繁华的城市，但它因知识阶层的人数多而闻名全国，他们从这里出去担任政府的多种要职。它的幅员大致和广州一样大，不过商业贸易远不如广州。

临清 临清是一个大城市，很少有别的城市在商业上超过它。不仅本省的货物，而且还有大量来自全国的货物都在这里买卖。因

而经常有大量旅客经过这里。

苏州 苏州是中国成语说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两个城市中的一个。它是这个地区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以它的繁华富饶，以它的人口众多和以使一个城市变得壮丽所要的一切文物而闻名。它位于一条平静的清水河上，或者可以更恰当地说是位于一个湖上，吹拂着和风。这里人们在陆地上和水上来来往往，像威尼斯人那样；但是这里的水是淡水，清澈透明，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样又咸又涩。街市和桥都支撑在深深插入水中的独木柱子上，像欧洲的式样。经由澳门的大量葡萄牙商品及其他国家的商品都经过这个河港。商人一年到头和国内其他贸易中心在这里进行大量的贸易，结果是在这个市场上各样东西都没有买不到的。从陆路进城只有一个入口，但从水路进城则有好几个入口。城内到处是桥，虽很古老但建筑美丽，横跨狭窄运河上面的桥都是简单的拱形。在中国没有别的地方能找到更多的奶油和奶制品，也没有更好的酒了，它们都输往北京和全国。这个商业中心离海约有两天的路程，严加设防，是本地区八个城市中最主要的一个。

上海 徐光启的老家上海在南京省，是一个不很重要的城市，被称为县。它离南京皇城约为 144 意大利里，纬度 29 度，离东海不远，在朝鲜这一边，并且因距日本过近而使居民所不喜欢。顺风时乘船渡过海峡可在 14 小时之内到达日本。附近水域经常有海盗出没，因此维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保护城市。本城的名字是因位置靠海而得，“上海”的意思就是靠近海上。城的四周有两英里长的城墙，郊区的房屋和城内的一样多，共有四万家，通常都以炉灶数来计算。中国人的城市有这么大量的人数，听了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即使乡村也是人口过分拥挤，城市周围是一片平坦的高地，看起来与其说是农村，不如说是一座花园大城市，塔和农村小屋，农田一望无际。在这一片外围有两万多户人家。

洋子江 洋子江因为河身宽大，它就叫做扬(洋)子，意思是海洋之子。有的地方它有两三英里宽。在这些地方航行是危险的，这条河水是那样汹涌澎湃，即使一名善泳者也很难在这里存活下来。

中国人不大敢冒险尝试它，当他们胆敢冒险时，常常会遭没顶之灾。欧洲的大帆船(galleon)能从大海远航至此。再往前，因为有几条小河注入，它的河面加宽了。他们在这条河里夜晚不航行，而是停泊在港湾，要起风暴时也是如此。每逢荡月或新月，海水会沿河向上涌到这个湖里，其他时候则不明显。

黄河 黄河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重要性上，都是中国第二大河。它起源于中国边界之外，在西方的一座昆仑山，据说恒河也起源于这同一座山，或至少是靠近它。黄河的起源处有一个大湖，叫星宿海。从这里它流入中国陕西省西部边界。它从北边长城再折回蒙古人的地方。然后它在该省转向南方，再由此进入陕西，由陕西而入河南，自此向东流入海。

黄河毫不尊重中国的法律和秩序。它来自一个野蛮的地区，好像是对中国人敌视外族进行报复，它满载泥沙并任意改变流向而经常毁坏全国的许多地区。某些官吏试图用宗教礼信供奉河神来控制它。中国人认为万物都有统治它们的神头，并说黄河的水一千年才澄清一次。在这条河流上航行的人，一连好几天注视着河水，等着泥沙在河里沉淀。河水含量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淤泥。

运河 为了从南京由水路到达北京皇城，中国的皇帝从这条河到另一条由于它那汹涌流水的颜色而叫做黄河的河流，修建了一条长运河。运河是为运送货物的船只进入北京而建造的。有上万条船从事这种商业，他们全都来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和山东五省。这几个省每年都向皇帝进贡大米和谷物。其他 10 个省则以银子上税。除去这些进贡的船只外，还有更大量的船都属于分级官吏们，来往不绝，再有更多的船从事私人贸易。从扬子江来的私商是不允许进入这些运河的，但位居于这些运河之间的人们除外。通过这项法律是为了防止大量船只阻碍航运，以便运往皇城的货物不致糟蹋。然而船的数量是如此之多，经常由于互相拥挤而在运输中损失许多时日，特别是当运河水浅的时候。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在固定的地点设置木闸来节制水流，木闸还可以作为桥来使用。当河水在闸后达到最高度时，就开放木闸，船只就借所产生的流力

运行。从一个闸到另一个闸,对水手是个艰巨的任务,造成旅途中冗长乏味的耽搁。由于运河中很少有足够风力,行船更增加了负担,于是从岸上用绳纤拉船前进。官员和其他政府要人的船只则用岸上的木装置提着逆流而上,这种牵拉的费用都由政府偿付。维持这些运河,主要在于使它们能够通航的费用,如一位数学家说,每年达到一百万。在炎热的夏季,大部分食品途中要运输一两个月,来到北京以前就变质了;所以把它们放在冰里加以保存。冰块逐渐溶化,因而在途中的某些停泊点设有巨大的冰库,船只可以随意获得足够的冰块以便在到达之前保持货品的新鲜。航行在山东境内时,离开一条河而驶入另一条运河中去,在靠近一个叫作天津的地方,流经北京附近,这里有另一条来自北京的河流伴着它流驶,直到二者汇合在一起大约流一天的时间注入海洋,或者说注入朝鲜和中国之间的海湾。横渡扬子江后,经过长运河,到达当地的首府镇江,又经这条河可以航行到著名的苏州港和杭州港。运河远至南方,所以从不冻冰,但它太窄,船只过于拥挤,所以不管往哪个方向都不能行驶很快。

鄱阳湖 鄱阳湖因它的面积,也因别的原因,它很值得一提。环绕它的整个沿岸,极目瞭望,只见无穷无尽的层层城镇村寨。从这里可以由水路到福建省,再从那里东至大海。

梅岭 梅岭在两河之间,标志着两省的分界线。越过它要花一整天时间,翻山的道路也许是全国最有名的山路。从山的南麓起,南雄江开始可以通航,由此流经广东省城,南入于海。山的另一面,在南安城,有另一条大河流经江西和南京,途经很多其他城镇,东注于海。许多省份的大量商货抵达这里;同样地,也从另一侧越过山岭,运往相反的方向。运进广东的外国货物,也经由同一条道输往内地。旅客骑马或者乘轿越岭,商货则用驮兽或挑夫运送,队伍每天不绝于途。这种不断的交流的结果使山两侧的两座城市真正成为工业中心,而且秩序井然。

庐山 庐山上有很多隐士住在一间间的洞室中,从事严格的修炼。他们说,这些穴室数正如一年的天数一样多,而且奇怪的是,

尽管天空总是晴朗美丽的，此山却始终云雾缭绕，虽则它近在咫尺，但从湖上怎么都看不见它。

南华寺 南华寺坐落在一片美丽的高原上，青山四面环绕，山上除天然美景外，还有人工安排的果园，景色极其迷人。由于气候温和，寒暖适度，当地从来感觉不到冬季的严寒，山峦从不脱掉绿装。平原上盛产大米和其他蔬菜。格外有幸的是有一条常年不息的河流流过平地的中央，灌溉着该地区。

气候 一旦冬季来临，中国北方地区所有的河流都结厚冰。河上航行已不能，车子则可以在上面通过。河水有时反常地上涨，因为天气降雨异常，使皇城受到极大的损坏。

煤 中国经常缺乏薪火，但这种匮乏由一种沥青物质补充，它缺乏一个更好的名称，欧洲称它为沥青或矿物胶脂。这是一种从地下挖出来的化石焦，像列日(Liege)附近的比利时人所用的那种一样。中国人用它来烧饭和在几乎达到北极区域温度的冬季最寒冷时候室内取暖。这种物质的丰富很好地弥补了薪火的不足。

八、利玛窦对中国人的认识和对社会的批判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 28 年，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广泛的研究和理解，因而在他的书中向西方人介绍了他的分析和态度。

中国人的特征

崇尚知识 在传教士的书库中有许多西文书籍，有学识的中国人非常称赞它们印刷精美和封面制作优良。封面是烫金的。中国人既读不懂这些书，也不知道它们讲的是什么，然而他们根据这些书的装订，认为内容必定很重要。再者，他们断定，科学和文化在欧洲必定很受重视；在这方面欧洲人既有这些书，所以必定不仅超过别的国家，甚至也超过中国人自己。中国人敬佩有学识的人，在神父们的传道和楷模的影响下，这种敬佩更增长了。中国人好读有任何新内容的书，也因为用象形文字所表达的中国著作具有特殊的力量而且表现力巨大。任何可能认为伦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在教会工作中并不重要的人，都是不知道中国人的口味的，他们缓慢地服用有益的精神药物，除非它有知识的佐料增添味道。一旦这种新知识被少数人所知道，它就很快地进入知识阶层的学术领域。一位医生渴望学习，用了很多时间陪同神父一起讨论哲学和神学问题，交换有关各种问题的意见。有一天医生说“在你的面前，我实在感到惭愧”，当问到何以故时，他回答说“因为在我看来似乎你把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我本人，归之于从前我们中国人把不信宗教的鞑靼人和野蛮人所归入的那一类了。”当他的客人向他保证，是他弄错了时，他说“简直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在知识上停止的地方，你们却仅在开始。”

尊师 中国人比我们更尊敬老师，一个人受教育那怕只有一天，他也会终生都称他为老师的。不仅如此，他在公众集会时就坐在老师身旁，用对待官长的称呼和礼节来尊重他，以表示学生对老师应有的恭敬。

宗教自由 中国人对于宗教的事从不采用武力或强制，对外人尤其如此。他们容许有完全的自由，或者说，这种宗教自由来源于他们当中的宗教派别极其混乱。在场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愿意支持四下传播的谣言，他们极其平静地回答说，人人都应该允许信仰自己选择的宗教而不受别人干涉。

人民勤劳 中国的这类庄稼一年两收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

喜欢文字传播 中国人还有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那就是他们所有的宗教教派的发展以及宗教学说的传播都不是靠口头，而是靠文字书籍。他们很不喜欢人们聚集成群，所以消息主要是靠文字来传布。

南北差异 北方的中国人比南方的中国人更勇敢好战，但不如他们聪明机智。这就是人性的平衡，有些人在这方面优越，有些人则在那方面。

升官心理 王泮认为他和教团的友谊不仅对他无害，而且是将来飞黄腾达的可靠征兆。所以他很喜欢和神父们结识。

易受惊吓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容易受惊吓的人，他们一见黑人就感到害怕，好像他是个恶魔鬼或黑鬼。

虚伪性 中国人惯于用权宜的借口来掩饰虚假，因此为了促进所说的事，这位医生就假称他接到了北京侍郎的几封信大力推荐利玛窦，要他设法把神父安置在省城里，因为广东省不宜于神父的健康。

天生猜疑 百姓们天生猜疑外国人，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或说法；认为洋人必定在搞什么鬼名堂，危害公益。

男女之防 神父们到这里来作弥撒并给妇女们讲道，而中国

人对于妇女们是小心翼翼地看护着的。

对中国的批判

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宇宙观、社会心理、外交政策、皇权、科举制度、社会问题、术数、道教、哲学、科技、语言、艺术等方面进行了颇为中肯的批判。

天圆地方 中国人坚信一个古老的格言，即“天圆地方”。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地球吸引着有重量的物体，或引力把落体引向地球。他们不知道大地整个表面大都居住着人，或者人们可以住在地球相反的两面而不会跌下去；有些事情他们可以相信，但有些事情他们许多人却难以想象。他们不理解月食是由于地球走到太阳和月亮中间而发生。他们对月食的荒谬解释对于他们的心灵，比对于月亮半身，更增添了黑暗。他们的一些哲人说，月亮同太阳面对面时，由于月亮极端恐惧而失去了它的光辉。还有人说太阳里面有一个空洞，月亮走到那个空洞前面就得不到光。当他们知道太阳比整个地球大时，感到非常新奇；但有些人倾向于相信，因为在他们古代的数学书籍中记述说，他们曾用某种仪器测量过太阳，发现太阳有一千多英里宽。他们听说有些星球，人眼看来是那么小，却比整个地球还要大，感到这是悖论。他们原始的天文科学一点也不知道椭圆轨道和周转圆。他们不知道相对于地平线、极地的高度随着地球上地带的不同而高低变化不同，而且除赤道以外，昼夜的长短也变化不同。

中国人从未见过有关地球整个表面的地理说明，不管是做成地球仪的形式还是画在一张地图的面上；他们也从未见过按子午线、纬线和度数来划分的地球表面，也一点都不知道赤道、热带、两极，或者说地球分为五个地带。他们曾看到在他们的天文仪上标明了许多天体轨道，但他们从未看到把这些转绘到地球表面上。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一个星盘加上图版就能够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地区，他们也看不出地球是一个圆球，或者是一个悬在空中的球体。他们

没有对两极的知识，一个是固定的，一个是移动的，从这里他们就可能知道很多有关行星运动的知识，他们不懂得在平面上或者固定在墙上怎样能使用日晷，他们也不肯相信这些和无数的其他事情都是可能的。

“天下之中”思想 中国称为“中国”或“中华”，第一个词表示王国，另一个词表示花园。两个字放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于中央”。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由于有这个看法，所以当他们的第一次看到西文地图时，发现他们的帝国并不在地图的中央而在最东的边缘，不禁有点迷惑不解。在所有大国中，中国人的贸易最小；确实不妨说，他们跟外国实际上没有任何接触，结果他们对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他们确乎也有表示整个世界的地图，但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15个省，在它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当他们听说中国仅仅是大东方的一部分时，他们认为这种想法和他们的大不一样，简直是不可能的。

闭关自守 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任何交往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所有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百姓所共有的这种恶感，在广东省的居民中间来得特别明显，这里的文化不如别的省份先进。事实上，广东省是帝国的附庸，甚至今天还被其他省份当作蛮夷之邦，其他省份在文化教养方面比它强得多，授与的学位更多，提供的高官显宦也更多。这些百姓的不快心情只能因下面的事实而加深：他们的省份海陆两面都暴露在外国人面前，陆上强盗和海盗的抢劫使他们经常遭受重大的损失。近来他们又大受葡萄牙人到来的骚扰，特别因为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而变得格外严重，那是由于国库和某些有势力的商人从葡萄牙商人那里得到很大的好处所致。且不提国外或来自他省的商人，他们抱怨说对外

贸易抬高了所有商品的价钱，由此得利的只是洋人。为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这个名字在广东人中仍然在通用。

夜郎自大 因为中国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他们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羨。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中华民族是按它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所有其他人的，他们深信他们所不知道的，世上其余的人也都不知道。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外国人给他们的国度起过各样的名称，而且他们也完全没有察觉这些国家的存在。

外交政策 中国人不允许外国人在他们国境内自由居住，如果他还打算离开或者与外部世界有联系的话。不管什么情况，他们都不允许外国人深入到国家的腹地。这种习惯是许多世代以来对外国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不信任所形成的。他们不仅对住在海外或距离遥远的人以及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的人怀有猜疑；而且也猜疑友好的和敌意的异国人，甚至与他们有贸易关系的人，例如沿用中国法律的邻邦朝鲜人。如果一个外国人秘密进入中国，他不会被迫做奴隶，但他将不准离开中国，免得他在外面煽起损害中国政府的骚动。因此，对于未得皇上亲自批准而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将严加惩处。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认为外国人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词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人们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疑惧。虽然中国可能和派遣使节的邻国自古以来就友好相处，但这并不能使来访的贵臣免于在他们全部在国

内的行程中被当成俘虏或囚犯一样来对待，并不得在旅途中看任何东西。在中国全部逗留期间，他们被安顿在宫城范围里盖得像牛棚一样的房子里，而且是被锁在里边。他们从来不准见到皇上，他们的外交或其他事务都是钦定的大臣办理的。全国上下都不得与外国人打交道，除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例如澳门半岛，在那里从1557年起建立了一个与葡萄牙人通商的商场。凡是未得官方批准而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都将受到最严厉的刑罚。

四夷馆是一座宽敞的建筑，四周有围墙，重门紧闭。中国人是不允许进去的，除非有特别命令，而外国人也不得离开这里，除非是他们在中国的事已经办完要回国去，或者是前来出庭或奉特诏进宫。这座建筑里有许多小房间，有时候住在这里向中国皇帝进贡的外国人为数达千人以上。这些斗室简单就是羊圈，而不是能想象给人居住的房间。房间没有门，也没有陈设任何家具，连一张椅子、一张板凳或床都没有，这是因为所有的东方人，除中国人外，都是在地板上坐、吃和睡觉的。

当有必要派人出国时，即使给予适当的证书和委任状，也很难找到愿意接受这项任务的人。当这位使节出发时，他全家都痛哭惜别，就好像他是一去必死无疑一样。然而，他回来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他一般都要受奖，被委以法官之类的官职。

朝贡政策 按照中国和西方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入中国。这些商人诡称是向皇帝进贡的使节前来旅行。贡礼大多是玉石、小钻石、紫色石头以及其他各种来源不一的宝石。这些假使节都是以公费到朝廷去并且返回。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因为谁都没有比皇帝对宝石付出更大的价钱了，皇帝认为不大方地付钱就接受外国人的礼物，那就配不上他的尊严。他们受到皇帝的盛待，以致平均每人每天至少得到一块金子，远远超过他的费用。正是这个原因，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他们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以取得这些位子。时候一到，所谓的使臣便以据称是派遣他们来的各国国王的名义伪造文书，其中满是对中国皇帝的极度

奉承。中国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那些为数众多的来宾并不是以真正的使节资格到中国来的。他们来是为了赚钱，带来礼物并希望皇帝赏赐。为了不失伟大君王的尊严，这些赏赐远远超过他所收到的礼物的价值。他们把收到的钱用来购置中国商品，然后拿到他们本国出卖，获取大利。而且他们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的开支就都由公款报销。看来中国人想照顾这些使节，或者不如说这些商人，其唯一目的就是要控制邻国，因此他们向皇上进贡什么样的礼物倒似乎是无所谓的。

在进贡皇上的礼品中，神父们看到一把剑，那简直就是一块钢片，粗陋地从铁砧上打铸出来的，配了一个斧头手柄一样的木把。在同类礼物中，还有用皮条粗制滥造编成的胸甲，他们还带来马匹，但饲养得极差，一到北京就饿死了。然而这些蛮夷从老远带来这样一些琐细的东西却使国家为他们路上的开支花费了一大笔钱。好像中国人重视的倒不是这些自称使节的低下地位，而是炫耀他们君主的伟大。

运河 运河漕运对欧洲人来说似乎都是非常奇怪的，人们完全可以采取一条既近而花费又少的从海上到北京的路线。但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海盗，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他们认为从海路向朝廷运送供应品会更危险得多。

皇帝 矿税 万历皇帝迫于拮据，不顾祖先的命令，下令重新开采金银矿山，后来又对各行省销售的一切商品一律征收百分之二的新税，上交国库。他委派宦官，向每个行省都派出两三名宦官头子强征新税。与皇帝的那些不肖的奴仆不同，各级行政长官还是忠于皇帝和自己担任的职务的。他们频频上书禀告皇帝说，百姓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有公开起事的危险，而且还不止是危险，某些地方已经严重地爆发了。皇帝对他们的警告不加注意，他们就上

奏,以明确的措词指责他的行为;京城以外有些行政长官公开反抗宦官们的掠夺。皇帝陛下吃了他的心腹送到皇宫来的美味食物,养得肥肥的。因此决定不但要推广他的政策,而且还要重刑严惩皇宫的批评者和监察者以及一切胆敢妨碍宦官工作的人。结果,有几名御史被罢了官,还有一些被送入北京的监牢,带上镣铐长期服刑。由于皇帝的权威重振,所以掠夺者就变得更加骄横,他们的横征暴敛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严酷——一个太监在皇帝面前犯错误,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据说万历皇帝在这一方面对他们是如此严厉,甚至为了一点小过错有时就把可怜的不幸者打死。不上朝——皇帝对新奇的钟如此着迷,于是他不仅想看看其他的礼品,也想看看那些送来礼物的异国人。太监们向他讲述的情况一点也没有满足他的好奇心。然而他不肯破坏几年以前他所定下的规矩,那就是除了太监和妃子们以外,他决不在任何人之前露面。而且他不愿偏爱外国人有基于他的官员,所以他放弃了他的愿望,继续保持他那顽强的孤寂。皇帝的宝座在高拱着的圆顶的下面,按照皇帝的习惯,他几乎每天都要上宝座听取臣下的奏章,处理朝廷事务并接见使节和大臣们,他们是来感谢皇帝所赐的恩典的。从当今的皇帝决定隐退过孤独的生活那时起,所有这些无用的礼节就都在他那固定的宝座前照例举行,并且没有一天不是有许多人来自大帝国的远方以这种或那种原因向皇上致贺的。滥杀无辜——由于不顾法纪和正义,在追查真相时使很多人都受到酷刑;凡是看来像证据的,哪怕是些蛛丝马迹,都被当作确凿的事实而加以无情地追查。当寻找犯人毫无进展时,皇帝斥责官吏,骂他们玩忽职守。在那些日子里,全城陷于一片悲惨境地。很多无辜的人被抓进监狱。百姓害怕出门,没有人胆敢稍微议论国事,因为知道皇帝的密探无处不在。见识低下——皇帝派人向神父们询问他脑子里出现的有关欧洲的每一件事情:风俗、土地的肥沃、建筑、服装、宝石、婚丧,以及欧洲的帝王们。太监们也提出了各式各样有关神父们本身的问题,而那些在他们的住处当差的人则不断向皇帝报告所发生的最琐细而可笑的事情,甚至报告他们吃喝几次以及吃了多少食物。

这是好奇的人向一个比他们自己更加好奇的人在作报告。

贵族制度 号称皇家血统的人都由公费供奉。据统计这类人约在六万以上,而且由于他们在不断增长,所以不难想象他们构成多么大的公众负担。由于他们不担任一切公职和行政,他们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阶级,耽于逸乐的生活而且蛮横。皇亲阶层在挥霍完他们的钱财之后甚至于变得更加横蛮。一个所谓的皇亲,是属于因出身高贵而变得骄横的阶级,买下了传教士的房子;但在约定的时间之前,他就开始把他的家具堆进神父的房里,千方百计想把他们赶走。

文官制度 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文人来治理的。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兵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老师罚小学生那样。战争政策由文官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文官决定,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视。事实上,这类意见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是交给作战会议讨论的。因此,结果是凡希望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文官,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感和尊重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大于武官。更加令外国人惊异的是,在事关对皇上和国家的忠诚时,这些文官一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顾危险和视死如归,甚至要超过那些负有保卫祖国专职的人。

科举制度 在中国,有些人虽然运气不好,却不绝望,竟为了博得这项荣誉而应试 10 次之多,并且抱定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原则,甚至把他们整整一生都消耗于徒劳无功的尝试。在欧洲人看来,那似乎是一种颇为奇怪的并且或许有点无效的所有考试中,无论是军事科学、数学、医学以及特别是儒学的考试,主考或监考都总是从儒学元老中选出,从不增加一位军事专家或数学家和医生。擅长于伦理学的人,其智慧受到极高的尊敬,以致他们似乎能对任何问题做出正当的判断,尽管这些问题离他们自己的专长很远。

宦官 在北方各省有一种常见的野蛮行径,那就是阉割大批

的男孩,这样他们就可以给皇上做奴仆。要在皇宫里当差这一点是必需的,乃至皇上既没有别人而且他也不要咨询别人或和别人谈话。几乎全国的行政事务都操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的手中,单单在皇宫里这类人的数目就达万人之多。他们样子很瘦弱,未受过教育,在终身的奴役中长大,呆头呆脑,根本没有能力听懂一项重要的指示,也没有办法去执行。

在各国的宫廷里,能够经常在皇帝的身边效劳都被认为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这是所有的朝臣的愿望,而中国人甚至比别国人更加野心勃勃地要谋求这项职位。一个以一句话就能成全朋友或毁灭敌人的人,是被人人所尊敬的。宦官们作为一个等级,既无知识又残暴不堪,毫无羞耻与怜悯之心,骄横异常而且穷凶极恶。由于这些阴阳人当道,又由于他们的贪得无厌把他们变成了野蛮人,所以不到几个月的工夫整个帝国就陷入一片混乱,情况比朝鲜战争时期还要糟糕。太监收税官不是在山里寻找金矿,而是在富庶的城市中寻找。如果他们听说某某地方有一个富翁居住,他们就说他的住所里有银矿,并且马上决定抄家挖矿。这种收税方法,使不幸的受害者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不等收税官吏来临,就先献出巨额款项。有时,为了免于遭受掠夺,某些城市甚至某些行省都同宦官们进行交易,献给他们大宗白银,说是从银矿采来的,上交国库。这种非凡的掠夺结果是多种物价飞涨,随着是普遍贫困化的增长。皇帝派太监们出去收税,其实就是掠夺。其中一个名叫马堂,住在著名的临清港。当地的居民和驻军奋起反对他,烧毁了他的家,杀死他所有的家奴。他若不是化装逃跑,避开了愤怒的人群,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但是恐惧并没有结束他的贪婪,人们说他自从遭了那场灾难后,比以前更坏了。当他知道有一只船上有些外国人要向皇帝进呈礼物,那些都是极为新颖而且非常贵重的礼品。他就燃烧起贪欲之火,立刻传话说要求看看送给皇帝的礼品。利玛窦带有侥幸心理,他的朋友钟万禄则低沉地告诫说:“你别想不受损失就逃出他的手心。他那一类人现在正得皇帝的宠,皇帝只和他们商量。甚至最有权力的大臣也受他们的残害,所以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

逃脱他们的伤害呢。”要利玛窦心甘情愿地出示所有的物品，并感谢太监竟肯来访的恩情，至少这种做法也许还有点希望。“要想找个人能阻止他是徒劳的，而且这样做会带来很大的危险。”他有权力掠夺神父们，不仅掠夺他们的行李，而且还能夺取他们的生命。马堂真不愧是个强盗，他认为凡是没抢走的东西都是他捐给他的受害者了。一些时候以来，利玛窦一直在等待时机以逃脱贪心鬼马堂的魔掌。这个阴谋家长远的计划是让皇帝赐给神父们一笔钱来酬答他们的礼物，然后想方设法从中为自己侵吞一大部分，而把神父们转移到南方的一个省份去，这就会断送他们在北京的努力。

虐待军人 这个国家中大概没有别的阶层的人民比士兵更堕落和更懒惰了。军队的每个人必定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应召入伍并非出自爱国心，又不是出自对皇上的忠诚，也不是出自任何想获得声名荣誉的愿望，而仅仅是作为臣民不得不为雇主劳作而已。军队中大部分人是皇上的奴隶，他们服奴役，有的是因为自己犯过罪，有的是为其祖先赎罪。当他们不从事军事活动时，他们就被派去干最低贱的活计，例如抬轿、饲养牲畜以及其他这类的奴婢行业。只有高级官员和军事长官才在军队范围内有一定权威。

礼节繁缛 中国的礼仪那么多，实在浪费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熟悉他们的风俗的人实在感到遗憾，他们为什么不摒弃这种外在的表现，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所有的欧洲人。

厚葬 总的来说，中国人的丧礼过于铺张，常常超过了他们的力所能及。

裹脚 女人身材都很矮小，脚小被认为是一种美的标志。为了造成这种效果，她们从小把脚用布条紧紧地裹住以防止它长大，走路来会使人觉得她们的脚是被截去了一块。这种裹脚布整个一生都在裹着。她们认为人在街上走来走去很不雅观。可能她们有一位圣人想到了这个主意把他们关在家里。

作伪 假古玩很多，他们很精于欺骗粗心大意的人，利用买主对价值很不在行而把毫不值钱的东西卖给他们。有一学者，为了给

他儿子树立名声,想出了一个非凡的计划;他请一位精通数学的学者写了一本有关这方面的大书,然后将其出版,刻上他儿子的名字作为著者。

虐待儿童 中国有极大数目的年轻人从事戏曲表演这种活动。有些人组成旅行戏班,他们的旅程遍及全国各地,另有一些戏班则经常住在大城市,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毫无疑问这是这个帝国的一大祸害,为患之烈甚至难于找到任何另一种活动比它更加是罪恶的渊藪了。有时候戏班主买来小孩子,强迫他们几乎是从幼就参加合唱、跳舞以及参与表演和学戏。

溺女婴 中国有一种更为严重得多的罪恶是某些省份溺毙女婴的做法。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她们的父母无力养活她们。由于他们相信灵魂转生或者轮回,这种野蛮行径就可能变得不那么恶劣了。因为相信灵魂从死人的身上会转移到另一个初生的人的身上,他们就为这种骇人的暴行披上了善良的外衣,认为他们把孩子杀死是对孩子做了件好事。

自杀 一种也多少是相当普遍的风俗,就是因为无法糊口或者遭受灾祸而极度绝望或者更加愚蠢更加懦弱地只为了愤恨仇敌而自杀。据说一年当中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自杀,既有男人也有女人。在这里,对于那些无法克服严重失望的人来说,在绝境之中了结自己的生命并不是不常见的风俗。他们这样做是要使害得他们绝望的人受到的法律的严酷制裁;因为按照惯例,对于任何方式造成他人死亡者,和对于犯谋杀罪的人,惩罚几乎是一样的。

盗窃 中国各个城市都有千百名更夫在街上巡夜,按规定的间隔敲锣。尽管如此,而且街道都有铁栅并且上锁,宅院被夜贼抢劫一空的事还常常发生。这或许因为更夫本身就是盗贼,或者是和盗贼合伙,经常失盗的结果是再要用人来监视更夫。听说在欧洲人口稠密的城市里,警卫倒不是用来防止国内的盗窃,而更加是用来防卫公民以免侵略者的袭击,中国人着实感到很惊异。中国各地盛传在境内多个地方都有许多金矿和银矿,但是黄金对于人们的贪婪本性诱惑太大了,因而盗贼和匪徒已从矿中盗走了大批财

宝。据说盗窃之风如此流行,以致古代帝王封闭了金银矿,严禁重新开采。在会同馆里看房子的仆役抢劫房客,就像是贪鬼的一种娱乐。那的确太厉害了,以至使节们在这种特殊的时刻要带着武器,以便保护他们的财产。

道教 道教除了最高的神以外,还塑造出三位别的神,其中之一就是这一教派的创始人老子本人。因此,两个教派的每一派都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了神的三位一体,从而看来似乎是谬说的始祖或谎言之父还没有放下他冒充神圣的野心。这一派鼓励他的成员肉体 and 灵魂一起飞升天堂,在他们的庙里有很多肉身升天者的图像。为了成就这种景象,就规定要做某些修炼,例如固定的打坐,并念一种特定的祷文以及服药;他们许诺他们的信徒说,这样做就可以蒙神恩在天上得到永生,或者至少是在地上得享长寿。从这类胡说,人们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在他们的谰语里注入了多少欺骗。道士们的特殊职责是用符咒从家里驱妖。这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一种是家中墙上贴满用墨画在黄纸上的凶神恶煞的图像,另一种是在家中各处狂叫乱嚷,就这样把自己也变成了妖。道士们自称有能力在旱时求雨,在涝时止雨以及一般避灾禳祸。这些骗子所预言的事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都是错的,所以很难理解,那些在别的方面是足够聪明的人能提出什么借口和遁辞来相信他们。

择吉 整个国家最普遍的一种迷信莫过于认定某几天和某几个钟头是好或坏,是好运气或坏运气,哪些时日要做或不做某些事。因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结果如何都取决于时间的规定。这种骗局在人们中间弄得像是真事,因而皇家的占星术家每年要编撰两本黄历,由官方公开发行,人们在里面可以查到有关每一个具体的日子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指示,以及每一桩事件都应该在什么确切的时间去做。这样全年都被非常细致具体地给安排好了。营建监管人谭君谕把神父们召去,通知他们说他们不能进行施工计划,因为按照他们的历法,选择动工的那天是个不吉祥的日子。后来又得到通知,他们可以挑一个更吉利的日子开工。这明显地是在耍手腕,对此的答复是,哪个日子都是一样地吉利。

风水术 在选择修建公共建筑或私宅的地点以及埋葬死人的地点时，中国人是按照据说地下的特殊龙头或龙尾或龙爪来研究地址的。他们相信不仅本家而且全城、全省和全国的运气好坏全要看这些地域性的龙而定。他们很多最显赫的人士也对这种深奥的学问感兴趣，必要时甚至把他们从很远的地方邀来请教。把一个家庭的安全、荣誉或甚至整个的生存都想象为取决于诸如门要开在这一边或那一边，雨从左还是右边流入院子或窗子设在这里或那里，房顶哪一个要比另一个高等等细节；有什么能比这更加荒唐的呢？有人自称能预言未来，但不是观察天象，而是根据风水。

算命 中国城镇的街上、客店里以及所有其他的公共场所都充斥着算命算卦的，或者也可以把他们归之为为一类，即都是骗子。他们的业务就是收一定的费来空口许愿说以后的运气好。他们有些是瞎子，有些是社会底层的人，有时还有一些行迹可疑的妇女。按照福音书上的格言，他们可真是“瞎子领瞎子”，而且他们为数众多，以致可以说是构成为一种普遍的祸害。事实上，这个令人厌恶的阶级在各大城市或甚至在宫廷里都是名符其实的害人虫。

炼银术与长生不老 中国人有两种非常愚蠢的作法，这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有权势的人们当中是很普遍的。第一种习惯是努力要从别的金属中提取银子，第二种是企图延年益寿长生不死。第一种可以解释为贪得无厌的炼金术士的妄想。他们挥霍全部财产徒然想要达到一种愚蠢的野心。每天都可以公然看到他们当中最有钱的人为了证实这种骗术而挥金如土，最后沦为赤贫。在这种特殊的学问里，他们中间比较精明的则弄出一种假的或掺假的银子，固而引起了轻信不疑的人们的兴趣。他们完全不考虑教育程度和真理，日夜在实验室里操作不息，引导别人陷入新的错误，而且自己也陷入这类错误；他们进行试验，花很多钱抄写书籍，并且准备各种装置以供进一步的实验。有些人貌似文雅而有教养，其实是在骗人，另有些人则是欺骗自己并且直到沦为褴褛的乞丐也还在坚持错误。他们每个人全都在追求着，胸中燃烧着增加财富的希望，以他们空洞的许诺引诱别人也去探求这种骗人的技术。这群无赖

汉的狂热源出于一种先入之见,以为这种事真正可以做到。因此,他们把积蓄全部花光来购置必要的工作仪器并装配起供研究用的作坊。然而,不幸的是当成功似乎在望的时候,那个怪鸟却飞去而不复返,他们只落得囊空如洗,而且还欠高利贷者大量的债务要偿还。中国人认为,采用一种只有在外国找得到的草药,可以把水银变成银子。因为传教士是外国人,就有谣言说他们随身带有这种草药,而且知道使用它的秘密。他们极力要证明这一点,便指出葡萄牙人为例,据说葡萄牙人用高价从中国买进大量水银运往日本,从日本满载银币返回他们本国。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神父们也干同样的事,因为他们发现神父老老实实地生活,不求施舍,不事生计,故此必然是他们有用这种神秘的草药变出大量银子。他们认为,很难相信有那样老实的人把银子从老远带到中国来,他们也不能梦想有人大方到不取报酬地去教导别人。

长生不老的问题,就其本身性质而言,的确值得认真探讨,因而它抓住了很多读书人以及甚至某些身居高位的大臣。这些上层人物在取得很高的生活地位并积累了随之而来的荣誉和财富之后,就产生一种想法,觉得除了有办法使他们的现状永不休止以及使自己长生不老以外再也无法好上加好了。因此,他们竭尽全力要研究出达到这种枉然被垂涎的目的的必要手段。在北京城里,在大臣、宦官以及其他地位高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人不沉溺于这种愚蠢的研究。虽然长生不老的贩卖者每天都在受到死亡的惩罚,他们仍然不能听人劝阻而放弃这种荒诞的研究习惯,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交上好运,而对别人有害的却可能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有一人自称是 300 岁,为了掩盖他的谎言,他自称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境外度过的。中国文人学士们向往延年益寿已经发了狂,这个人便不顾事实真相,招集一批弟子,他们都渴望学习他的长寿秘诀。还有一人比较谦逊一点,自称只有 90 岁,看上去约有 60 岁左右。他自称他能治好各种所谓不治之症,而有些文人也确实谈到他在这方面所创造的奇迹。这两个人是亲密的朋友,他们的互相恭维大有助于建立他们的声望:一个以长寿闻名,一个以医术闻名。

他们两人都对利玛窦赞不绝口，奉承他是科学家。结果是有人疑心利玛窦本人大概也活了几百年，但却为了某种目的而隐瞒事实真相。没有知识的中国人很容易轻信这类说法，特别是对于外表和他们不同的外国人。

缺乏逻辑推理 中国所熟悉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多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由于中国人缺乏逻辑法则，又不懂得自然的善和道德的善的区别，他们就把人性中所固有的东西和人性所获得的东西混淆起来了。至于人性怎样在原罪之中堕落，上帝又怎样运用神恩，当然他们就更是绝对毫无所知了，因为他们连想都没想过这种事情。他们的哲学家们还在继续辩论人性问题，从来没有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

钦天监落后 北京有一座中国天文学家的学院——钦天监，南京也有一座，更多地倒是以建筑堂皇而不是天文学家的学术闻名，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知识，更没有学术。他们几乎不过是修订黄历上的节气和依照古代算法每日计算而已。如果计算错了，他们就说所发生的一切完全符合他们的计算并把错误归罪于陨星，称之为皇天对地球上将要发生某些事件的预警，他们捏造这些来掩盖自己的错误。

天文仪器不精 南京钦天监所有陈列的仪器都有一个错误，就是它们是根据经度 36 度安装的，而南京城却位于 $32\frac{1}{4}$ 度。看来这些仪器似乎是为别的某个地方制作的，由于缺乏天文学知识或者是并不考虑方位而放到这里的。中国只有少数几种测时的仪器，他们都是用水或火来进行测量的。用水的仪器，样子像是个巨大的水罐。用火操作的仪器则是用香灰来测时的，有点像仿制欧洲用以滤灰的可以翻转的炉格子。有几种仪器用轮子制成，用一种戽斗轮

来操作,里面用砂代替水。但是所有这些都远不如欧洲的仪器完美,常常出错,测时不准确。至于日晷,他们知道它以赤道而得名,但还没学会怎样依照纬度的变化摆正日晷。他们感到惊奇的是,传教士用象限仪就能够测出一个塔的高度,一条沟或者一个山谷的深度,或者一条路的长度;算数能够采用笔算,对他们说好像也是稀奇的。

数学缺陷 中国人在木框上计数,那上面有圆珠沿着棍条滑动并挪动位置以表示数目。这个方法尽管严密,但易发生错误,肯定在科学应用方面是有局限的。中国人最喜欢的莫过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一书。原因或许是没有比中国人更重视数学了,虽则他们的教学方法与欧洲的不同;他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命题,却都没有证明。这样一种体系的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数学上随意驰骋自己最狂诞的想象力而不必提供确切的证明。欧几里德则与之相反,其中承认某种不同的东西;亦即命题是依序提出的,而且如此确切地加以证明,即使最固执的人也无法否认它们。

轻视科技 中国没有教授医学的公立学校,每个想要学医的人都由一个精通此道的人传授。在两京(南京和北京)都可通过考试取得医学学位。然而,这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什么好处。有学位的人行医并不比没有学位的人更有权威或更受人尊敬,因为任何人都允许给病人治病,不管他是否精于医道。凡有希望在儒学领域成名的,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人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儒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

纸质差 纸的使用在中国要比别的地方更为普遍,制造方法也更多样化。但这里生产的最好的纸也远不如欧洲的许多产品。它不能在正反两面都印刷或书写,所以欧洲的一张纸就等于中国的两张。此外,它很容易撕坏,不能耐久。有时中国人把纸制成正方

形,边长一步或两步。他们用棉纤维制成的纸和西方所能有的最好的纸一样洁白。

工艺原始 中国人习惯于生活节俭,所以他们的手艺人并不为了获得更高的售价而在他创作的物品上精益求精。他们的劳作务必是被买主的需求所引导的,而买主通常满足于不很精致的东西。结果,他们常以牺牲产品的质量而满足于表面好看以便吸引买主注目。这在他们为官员们做活时似乎特别看得明显,因为官员们根本不管所买物件的实际价值而只凭一时好恶向工匠付钱。中国人在其他地方确实是很聪明,在天赋上一点也不低于世界上任何别的民族;但一些工艺的利用方面却是非常原始的,因为他们从不曾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而这类交往毫无疑问会极有助于使他们在这方面取得进步的。

语言文字复杂 和世界上别的国家不同,中国人不是用拼音字母来表达他们的思想。他们用字来表示事物的形象,有多少图像就有多少字。如果仅靠勤勉练习就能求得知识,那么人们或许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对研习中文取得显著的进展。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并不如此,因为听起来和读起来都是最困难最复杂的中国语言,由于缺乏教它的教师而格外加深了它的困难。中国语言含糊不清的性质,乃是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一直把较大的注意力放在书面语的发展上,而不太关心口语。他们的辩才也只见于他们的写作而不在于口语。人们不可能靠听写中文来笔录一部书,把一本书念给大众听,他们也无法听懂书的内容,除非人人眼前都有这样一本书。发音相同的多种不同书写符号不可能用耳朵听懂,但是可以用眼睛把符号的形状的及它们的意义分辨清楚。人们运用重音和声调来解决含意不清或模棱两可的困难问题。一共有五种不同的声调或变音,非常难于掌握,区别很小而不易领会。每个发音的字的确切意义是由它的声调质量决定的,这就当然增加了学习这种语言以及听懂别人的困难。没有一种语言是像中国话那样难于被外国人所分别的。在中国,人们从小到大都要埋头学习他们的那些符号。毫无疑问这种钻研要花去大量的时间,那本来是可以用来

获得更有用的知识的。

不懂透视原理 中国人广泛地使用图画,甚至于在工艺品上,但是在造这些东西时,特别是制造塑像和铸像时,他们一点也没有掌握欧洲人的技巧。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像是死的,而不像是活的。看起来他们在制造塑像方面也并不很成功,他们塑像仅仅遵循由眼睛所确定的对称规则。这当然常常造成错觉,使他们比例较大的作品出现明显的缺点。中国皇帝不能欣赏一个小人像的细腻特征和绘画阴影的变化手法,这种技巧在中国人是忽视的,于是皇帝命令宫廷画师绘制了一幅更大、色彩更浓的画。

九、利玛窦的影响

利玛窦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我们仅看看他在他那个时代的一些事例便可推知他整个的影响。

江西巡抚陆万垓第一次见到利玛窦就对他说：“我等着见你很久了。”“你的人未到而名先到。我曾听说你的德行和学识，现在我对这两者深信不疑，因为我从你的品貌和风度中看到了这点。言谈是不必要的，德行就在你的身上闪耀出来。”

利玛窦很快发现，关于他本人的谣传很多，但都是有利于他的。据说他的北京之行是由王尚书邀请的，他到北京向皇帝呈献了许多珍贵礼品。这次拜见没有结果，那是由于朝鲜战争而造成的干扰。如果他在别的时候求见，一定会受到恩许的。

祝世禄的敬仰激发了一种想见传教士的愿望，而利玛窦所写的论友谊的《交友论》成了把他们聚在一起的媒介。

在《山海舆地全图》这本舆图的序言中，郭子章插进一段对舆图及其作者利玛窦的大量赞词，声称利氏的声望得自他所著的书籍。

刘冠南说：外国人利玛窦也是儒家，很值得钦佩，因为他理解孔夫子，反对偶像的狂妄，那本来是外国人自己早已在他本国清除了的。

一位来自京城的官员曾经偶然听说过利玛窦，听说过他来到京城并且怎样地受到大臣们乃至皇上的欢迎。他在市政府人员的面前说，利玛窦被皇上留在北京，从皇库中得到一笔津贴支持，最高级的官员都着意交结他。

张德明在北京和传教士们关系很友好，特别是和利玛窦。他抵达韶州时，老朋友龙华民就去见他，受到了殷勤的接待。他在大庭广众之间讲话，说了许多有关利玛窦和北京其他神父的事，还说他

接受了他们赠送的日晷,并且表示他很愿意学会怎样调节它。

正在耶稣会士鄂本笃准备离开焉耆时,前次商队的商人已从北京回到了这里。在北京,他们和耶稣会传教士们共住在同一个使节的馆舍中,因此他们向鄂本笃提供有关利玛窦及其同伴的第一手消息。他们谈到传教士们怎样向皇帝进献钟表、乐琴、画以及其他的欧洲东西,他们还说起传教士们受到都城大员的礼遇。

恰巧卢廷选是利玛窦的一位朋友,几年前在北京相识。他收下儒生们对传教士的诉状,然后置之不理,呈递状子的讼师无法说服他给他们一个回答。和传教士们多少还算友好的市长,发现诉状中有许多诬陷,就问校长是否知道李玛诺其人,李玛诺是利玛窦的同伴,利玛窦在朝廷极受尊敬,因为他曾进献礼物给皇帝而从皇库中领取津贴。

法官王佐说:你们大概还不知道事实是利玛窦等人在北京受到人人的款待,还领皇库的津贴。住在皇城之外的官员,怎么胆敢驱逐获允住在宫廷里的人?

从中国各地给利玛窦寄来无数的信件,有些是他认识的,有很多他根本不认识,来信询问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各种问题、有关佛教的信仰以及他所刊行的著述里的一些章节。

由于利玛窦在首都定居的影响,传教团的地位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已十分稳定,基督教的信仰在全国各地滋长起来。

几个教堂的声誉,很快传播到中国的 15 个省份,而且越传名声越大,甚至超出了事实,就像很容易会发生的那样,不久它就传到中国境外,把人们非常希望着的事传说成仿佛是已经实现了似的。

利玛窦逝世的消息引来了一大群他的朋友、大臣和地位很高的人们,他们都按照中国的习惯吊唁他的逝世;而且他们眼含着热泪,用了“圣人”、“真正的圣人”这样的词句来表示他们对他的崇敬。悲伤和痛哭不仅限于北京。

福建人叶向高原是南京的官员,和传教士们十分熟悉。自从他晋升为显职以来,曾在北京的家里两次款待过利玛窦。他对利玛窦

的逝世深感悲痛,反复地回忆起他来,对利玛窦颂扬备至。他说这位伟大人物配得上享庙和立像。这在中国习惯上是对造福公众的人表示尊敬的作法。

北京城的长官还不满足他自己已经给予的恩惠,决定再向利玛窦的名字表示敬意,同时向利氏的同伴表示敬意。他送了一个刻着大字的匾额,放在利玛窦的墓上,送匾的仪式十分隆重。他的大队随从排队抬着匾敲鼓吹号,经过城中主要街道。匾上刻着四个字:“慕义立言。”下面写着较小的字:“献给大西利玛窦,北京少京兆黄吉上立。”

参 考 文 献

- [意]彼埃罗·科拉迪尼著,耿昇译.利玛窦与文艺复兴.见:国际汉学,第四辑.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 [意]加林著,李玉成译.意大利人文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李东日著.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利玛窦的研究评价.见:国际汉学,第二辑.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
- [意]利玛窦著,刘俊余等译.利玛窦全集.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
- [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3
- 林金水著.利玛窦交游人物表.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 林金水著.利玛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罗光著.利玛窦传.台北:学生书局,1979
- [法]马若安著,耿昇译.利玛窦著作中的科学和技术.见:国际汉学,第三辑.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 [美]马可·泰勒编,李云路等译.简明基督教全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评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日]平川祐弘著,刘岸伟等译.利玛窦传.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 [美]乔纳森·斯彭斯(史景迁)著,王改华译.利玛窦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 王余庆著.利玛窦携物考.见: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 [瑞士]雅各布·布史哈特著,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卓新平主编.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北京:宗教出版社,1999

丛书后记

《西学东传人物丛书》付梓在即。回顾本套丛书的产生过程，自策划至今已有七八个年头了。

我同当年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先后同窗的傅祚华、孔国平博士参与《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2）和《中华骄子》人物丛书（龙门书局，1995）的编撰工作中，曾多次商议以近代中外科技交流为主题组织一套丛书，后来确定以明末至清末中外科技交流中的重要人物为线索，展示四百年来自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的历史画卷。其时，祚华兄、国平兄分别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任副编审，祚华兄后又调任知识出版社总编辑（后又调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科技部主任），工作十分繁忙，国平兄则自告奋勇担任本套丛书责任编辑并报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于是主编的责任就落在了我的头上，但实际上的主编应是我们仨兄弟，其中组稿、审稿等工作国平兄出力尤多，这是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

1998年8月，在科学出版社汪继祥社长的关心下，《西学东传人物丛书》召开了编写工作会议，出席者有科学出版社卢祥之、姚平录，孔国平、傅祚华和我，清华大学汪广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陈亚兰副教授，徐州师范大学纪志刚副教授，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樊洪业研究员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王冰研究员、张柏春研究员、王扬宗研究员以及汪晓勤博士等。当时确定本丛书定位为学术性的普及著作，因“西学东渐”这个沿用已久的名词学术味较浓，故改为“西学东传”这个较为普及一些的名称。入选的人物有徐光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李善兰、伟烈亚力、傅兰雅、华蘅芳和徐寿，由部分会议参加者撰稿，后来参与撰稿的还有辽宁师范大学王青建教授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学史研究所汪前进研究员。在此我谨向本丛书参与策划者和撰稿者表示深切的谢意。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耄耋之年的国学大师季羨林老先生慨然应允为本套丛书作序。季老的人品学识在学术界有口皆碑，我对他老人家仰慕久矣。1996年在一次会上我发言谈到了中国传统科学的综合性思维方式和“天人合一”思想，得到了季老的称赞，会后他赐函给我，称“前不久在光明日报座谈会上，得闻高论，十分高兴。先生以自然科学家所论与鄙见相合，实出我意料”（1996年8月15日函）。后来，在他的《中外（东西）文论的根本差异》一文（载《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季羨林卷》，446~448页，华文出版社，1998）中又写道：“我听了王先生的发言后，石破天惊，空谷足音，我真有点‘喜欲狂’的劲头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在本行以外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嘴中听到完全相同的意见。”“这完全是‘英雄所见略同’。我窃自比为‘英雄’，有点不够谦虚，不过这是一句成语，我也无法改变。”这段话使我深感惭愧，这是前辈对后学的极大鞭策和鼓励。最近，季老主编了一套《东学西渐丛书》，其中有我的同事韩琦博士的一本《中国科学技术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于是我萌生了请季老为《西学东传人物丛书》作序的念头。新年伊始，我到北京大学朗润园拜望季老，带去了本丛书的两册校样，季老看后，欣然提笔写下了两千字的序言，以极为广阔的视野和人木三分的深度，对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作了精辟的论述。待我日前去取稿时，季老告我现因视力减退，已不能再着笔写字了。我真感到幸运！在本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特向季老表示由衷的谢忱和敬意，并恭颂九旬高龄的老人家健康长寿。

王渝生

2000年2月19日岁次庚辰元宵节
于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